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序跋编

第一辑

第　二　辑

第三辑

第 四 辑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

序 跋 编

《序跋编》，据一九八二年三月广州花城出版社版《序跋集》增删改订。分四辑：一，作者为自己的各种选集、文集或其他集子（包括他人代为编选者）所作序跋（已编入本《全集》者不再录入）；二，为所编刊物所作卷头语、告读者等；三，译文集序跋及散篇译文题记、附志等；四，为他人著译所作序跋。

第 一 辑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①]序

"有什么关于安那其主义的书可以读的吗?"我从各方面得到这同样的问题。

去过伦敦大英博物院或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人当然会惊奇安那其主义文献之丰富。然而在我们中国却找不出二三十部可读的书来。而且严格地说，我们所希望的一部极其浅明而有系统解释安那其主义之理论与实际的书，在中国简直是没有。

我在安那其主义的阵营中经历了十年以上的生活。运动的经验常常使我感觉得理论之不统一，行动之无组织，乃是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之致命伤。在中国安那其主义的宣传虽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然而至今能够明确地懂得安那其主义的理论体系的人，可说是很少很少，无论是赞成者或反对者。所以在中国就出现了关于安那其主义的种种奇怪的误解。甚至有人在安那其主义的名义之下宣传反安那其的理论。

在这多年的痛苦经验之后，我曾几次抑下了奔腾的血潮，以一个冷静的头脑来观察，来构思，来研究。其结果便有了写

①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署芾甘著。

一部正确地解释安那其主义的书之计画。我以为这是不可缓的工作，曾几次与高德曼通信讨论到这事。她告诉我说柏克曼有一部这类的书正在著述中，希望我将来把它译出。我会见柏克曼的时候，他因为病的缘故，还不曾写完他的书。我自己的书也因为忙的缘故，只写了大纲，并未起稿。直到从欧洲回国后的今年才读到了柏克曼的《安那其主义的ABC》一书。

诚然我说过安那其主义的文献极其丰富。可是其中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在欧洲大战与俄国革命之前写的，所以近十几年来的经验并未曾被利用，这是可惜的事。我们知道这些经验是极其重要的，它使得安那其主义在战略与方法方面都必须有新的改变，新的修正。欧洲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掘了资产阶级的坟墓，揭穿了社会党的黑幕，促进了民众的觉悟，使他们更明白自己信赖自己组织之必要。俄国革命指示了社会革命之可能，而且靠工农阶级的自己努力，解决了许多革命的改造与防卫的问题；换言之，未能达到目的的俄国革命却替安那其主义解决了许多问题。

柏克曼的著作确实是把这些经验充分地利用了的。而且他的书还有一种长处，就是浅明，诚如他自己寄我的信上所说，“这书的体裁是非常简明，非常通俗，对于那些完全不懂得社会问题的工人也很适宜。”

然而我并不曾翻译柏克曼的书，我却在写我自己的书。自然我的论据大部分是从他的书中抄袭来的（为了方便的缘故），但我却时常用我自己的言语，我的主张也不是和他的完全相同。在书的结构一方面，我虽然极力模仿他，但我也删了

几章又另加了几章。柏克曼的书大体是很好的，不过因为一则他的书是写给美国工人读的；二则在有些地方他也许是太idealist[①]了。而克鲁泡特金不是的。所以我只抄袭他的大部分的论据，而不翻译他的书。自然没有他的书则我的书决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写成的。

我们安那其主义者没有教主，也不是某一个人的信徒，因为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不过在大体上我愿意做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②]这就是说我信奉克鲁泡特金所阐明出来的安那其主义的原理。所以如果有人读了这书，觉得我的安那其主义是和大部分中国安那其主义书报所说不相同或者还相冲突的话，那么请他们原谅我，因为我只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

我现在并不是一个战士，所以这本书里面缺少煽动的热情，只有理论的解释。我可以公平地说这不是一本宣传的书，这是一本解释的书，它的目的只是在用极其浅明易解的话语给人们说明安那其主义是什么，安那其主义又不是什么。

---

① idealist(英文)：理想主义者。

② 自然，克鲁泡特金对于某一个特殊问题的意见，我有时也并不同意。

《巴金自传》[1]小序

这是我的自传的一部分。在这五个片断里我故意地用了不同的笔调和不同的纪年。我希望读者甚至能够从这上面也看出我的生活的进展来。

因了篇幅的限制，我只能够写出过去生活的一个这样简单的轮廓。

巴　金 1934年2月底，在上海。

① 《巴金自传》：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1]后记

我开始写文章，到现在也有好几年了。这几年中间究竟写了些什么东西，我自己有时候也算不清楚这一笔糊涂帐。想起来，我写的文章，有的随写随弃，有的发表后连自己也没注意就看不见了。其中流传到现在的，还是几篇小说。

这里用了"流传"两字，自己看来也觉得惭愧。但我并不是在夸耀我的小说写得好。因为能够"流传"的，不见得就是好东西。虽然在今天时髦的书店老板已经能够谈什么"文化的立场"了，然而文化是什么，那还是天知道的事情。做生意另有生意经，哪怕是不通的文章，也可以一版再版乃至四版五版的。所以我的书可以流传到现在，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我对于自己的作品并不满意。有时我固然也爱惜它们，但有时我也讨厌它们。而且有件事情却是永远不变的：我每次翻阅到自己写的东西，总不免要提笔胡乱地删改一番。似乎到处都有毛病，不改心里就不痛快。据一位批评家说，一篇好文章是不能够随意删改的。连增减一个字也不行。从这里也可以看见我的文章是不成东西的了。

---

[1]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话虽然是如此说，但我还没有勇气把我的不成东西的文章毁掉，也就糊里糊涂地让它们一版再版地印下去。我并不想赚钱，但也从不曾打过文化的招牌。我一生就充满了矛盾。譬如，我不满意自己的文章，但同时又不甘心那些更不成东西的读物老是在读者中间卖来卖去。所以我也高兴让我的作品跟它们抢抢生意。

以前我忙着写文章。近一年来我发明了（？）"搁笔"两字来敷衍各位编辑，所以有了读书的时间。有时候也读自己写的东西，便花了一点功夫把旧作整理一下，同时又借到一笔钱来把售出了版权的旧作收回。结果我编辑了两册短篇集，把我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收在里面。

现在先出第一集，收的是《复仇》、《光明》、《电椅》三个集子里面的各篇小说。每篇都有一点小的改动。各个集子的序文仍旧原样地保留着，因为那是我当时的心情的表白。另外附了一篇《写作生活的回顾》在前面，这是一篇旧作，但增加了新的材料。倘使有些读者读我的小说不能理解，《写作生活的回顾》也许可以给他帮忙。但是如果他读后仍然不了解，那么他就索性不要再读，或者劝人不要读。这是最好的办法。

1935年12月。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1]后记

费了将近半个月的功夫，我编好了我的短篇小说集的第二卷（或者叫做第二集）。我最初并不想这样地编排，我打算把一部分不像样的东西索性删掉。可是现在我却不加选择地把我近年来的短篇创作全收入了。是的，除了《神·鬼·人》和一篇《长生塔》(这是童话，将收在我的一本童话集里)外，我写过的短篇小说全收在这两本集子里面了。我这样做，也有我的理由。我既然写过那许多不像样的东西，我就不应该替自己遮丑。我最好把我的全个面目显露出来，让人们看得一清二楚。至于别人的笑骂，由它去罢！我准备承受一切。

收在这一集里面的共有二十三个短篇，这次都被我乱改了一通。为什么要改？理由很简单：不改不痛快。改得比较多的还是三篇所谓历史小说。自己原先就说过要大大地改动一下。但是改好一看，却又觉得改得太少了。将来有时间我也许会把它们重写一次。可是我又担心写出来的会是历史，会是传记，而不是小说了。我到现在才明白写文章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的甘苦连自己有时也不能完全知道！

---

①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有人说我写《后记》时爱发牢骚，好像我这个人就有满肚皮的怨气似的。(其实我的怨气只有鬼知道！)这一次我不发牢骚了，索性连话也不多说。自己省事，别人也省事。

1936年1月27日。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三集）[①]后记

这是我的短篇小说集的第三卷。我只花了三天功夫，就把它编成了。这工作做得十分草率，现在自己看看也不满意。况且收在集子里的十五篇小说都是不成功的作品，如果用某几位批评家或研究者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一定会被列入“条件不够”或“意识不正确”之林的。……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没有读过一本文艺理论的书。但是我写过一些小说，而且还在继续写小说。

我特别提醒读者：这是第三卷。第二卷的编成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算起来恰恰隔了六年，这六年中除了四部长篇外，我就只写了这十五个短篇，后面三篇还是最近三、四个月内写成的。然而某一位研究专家[②]却称我为“多产的作家”。我不明白这“多”的含义，或者专家以为这么些作品应该用六十年的功夫来写才不算“多”，也未可知。不过偏乎我生性愚钝，开笔太晚，前面没有六十年的长时间让我从容执笔，也只好趁这短促生命的界限未到临之前，这样糊里糊涂地“多产”起来。反正不是抄书，虽然也全是自己的话，写了和不写毕

---

①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三集：一九四二年六月重庆开明书店出版。

② “研究专家”：指的是谁，我完全忘记了。（一九八一年注）

竟不同，不算是完全浪费时间，而且即使话说错了，文章写得不好，我们这里还有那位以"文艺批评者"自命的研究专家在，他会来一个正确的批判的。他不是说过吗？"早就应该有正确的批判了"。那还是一年以前的话。

在这里恐怕会有人发问："既然早就应该有，为什么还没有呢？"我想原因之一一定是不多产。我似乎应该等待。现在我不等着正确的批判出来，又把一本新书交给书店付印，我只得向研究专家告罪了。

1942年1月4日桂林。

春明版《巴金文集》[1]前记

春明书店要求"文协"转约几位文艺界朋友为他编选一套文集，我也是被约者之一。我不知别的几位意见怎样，我自己略加考虑，便答应下来。

我写过几十篇短篇小说，也曾刊印过十一个集子，但大半已经绝版。除了三四本较后的作品外，目前流传的就只有几本翻版本。虽然翻版者、编选者的人喜欢在书面上，用极大的字堂皇地印出我的笔名，并且宣传地用"代表作""杰作集"等等漂亮名称来引诱读者。可是文章被割裂，字句被删节，别字、错字、漏字充满全篇，常常使我不敢读我自己写的东西。我的著作遭受编选、翻版诸专家的摧残，不知道有若干次。现在我手边就有八本所谓《巴金选集》之类的东西。更奇怪的是三四年前，我在桂林买到一本叫作《驴》的短篇集，和一本薄薄的英汉对照的短篇小说《爱》(都是上海报纸本)。封面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巴金著"三个字。然而倘使我的记忆不错，我相信我没有写过那几篇小说，我更没有编印过那样的书。

但我是爱惜自己的文章的。我不高兴看见它们被人们糟

---

① 春明版《巴金文集》，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海春明书店出版。

蹋。现在我自己来编选《巴金文集》，也无非想保存我的文章的真面目。而且我说句老实话：我选的也并不是我的"短篇杰作"，因为我从没有写出过一篇可以称为"杰作"的东西。不过我的文章中没有骗人的谎话，至少不会使读的人受毒害。所以我毫不惭愧地从过去一堆作品中选出二十三篇来介绍给读者。

巴　金　9月1日。

开明版《巴金选集》[1]自序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的春天。那时我和一个朋友同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公寓五层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面。我后来在一篇《回忆》里描写那个房间说：

> 屋子是窄小的。窗户整天开着，下面是一条静寂的小街，那里通常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从窗户里也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但是我却没有听到酗酒或赌博的闹声。正对面是一所大楼，这古老的建筑不仅阻拦了我的视线，也遮住了阳光，使我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显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我在同一篇文章里描写我那时的生活道：

>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我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Alliance Française 附设的夜校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旅馆里让破旧的书本蚕食我的年轻的生命。我在屋子里翻阅那些别

---

① 开明版《巴金选集》：辑入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第一辑，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开明书店出版。

人不要读的书。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我简直忘了我这个身子在什么地方，周围好像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变动。渐渐地闹声消失了。经验告诉我：一辆载重的卡车在下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不久一切又复归于静寂。我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前，伸出头去看这条似乎受了伤的街；我又看街角的咖啡店，那里也是冷静的，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于是我的心又被一阵难堪的孤寂压倒了。

晚上十一点钟以后我和朋友卫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的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景。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的铜像的脚下，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太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法国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忘了一切的痛苦，直到警察的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稍微休息了一下我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又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

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

于是：

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天晚上我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

这样，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地我就成为一个"作家"了。我一直写了二十三年，在书桌上面消耗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我曾经写过多少次，嚷过多少次，说我要抛弃艺术，要舍弃文学生活。可是我始终没有办到。

我的写作生活是痛苦的，因为我承认过：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和我在生活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种种的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同时惨痛的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

我只有拿起笔写，不顾一切地写下去。

所以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忧郁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我的作品的缺点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说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现在抽空把过去二十三年中写的东西翻看一遍，我也只有感到惭愧。

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新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地软弱，失色！有时候我真想把它们藏起来。

然而我还是把"新文学选集"中我的一本集子编选出来了。使我还有点勇气做这编选工作的唯一原因，是我对于工作并未失去信心。不管我的作品有着种种或大或小的缺点，但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谎话。在十五年前（一九三五）我曾说过：

> 我是不会绝望的。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那贯串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着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

这本集子里面的二十二篇文章可以给我的这番话作证。

现在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新中国的建设开始了。看见我的敌人的崩溃灭亡，我感到极大的喜悦，虽然我的作品没有

为这伟大的工作尽过一点力量，我也没有权利分享这工作的欢乐。收在这集子的卷末的《一封未寄的信》便是我的喜悦和我的感动的表白。我的一枝无力的笔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了欢迎这伟大的新时代的来临，我献出我这一颗渺小的心。

巴　金 1950年5月。

《巴金散文选》[1]前记

这本《散文选》所收短文三十六篇，是从我的十二个散文集子里选出来的。我在编选它们的时候，附带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订工作。每篇文章后面原有的写作日期和地点仍然保留，我还注明了它们的出处。这些对读者或许有用处，至少可以告诉读者，文章是在怎样的环境里写成的。因此我用不着按照写作年代的先后排列它们。我觉得把同样性质的文章放在一起更合式些。

其他的话应当让读者来说。

1954年11月17日。

---

① 《巴金散文选》，一九五五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巴金文集》[1]前记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的春天。那时我和一个朋友同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我后来在一篇《回忆》里描写那个房间说：

> 屋子是窄小的。窗户整天开着，下面是一条静寂的街，那里通常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从窗户里也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但是我却没有听到酗酒或赌博的闹声。正对面是一所大楼，这古老的建筑不仅阻拦了我的视线，也遮住了阳光，使我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显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我在同一篇文章里描写我那个时候的生活道：

>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我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Alliance Française附设的夜校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旅馆里让破旧的书本蚕食我的年轻的生命。我在屋子里翻阅那些别

① 《巴金文集》：共十四卷。一九五八年二月至一九六二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人不要读的书。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我简直忘了我这个身子在什么地方，周围好像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变动。渐渐地闹声消失了。经验告诉我：一辆载重的卡车在下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不久一切又复归于静寂。我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前，伸出头去看这条似乎受了伤的街；我又看街角的咖啡店，那里也是冷静的，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于是我的心又被一阵难堪的孤寂压倒了。

晚上十一点钟以后我和朋友卫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的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景。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的铜像的脚下，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太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法国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忘了一切的痛苦，直到警察的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稍微休息了一下我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又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

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

于是：

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天晚上我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

这样，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地我就成为一个"作家"了。我一直写了三十年，在书桌上面消耗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我曾经写过多少次，嚷过多少次，说我要"抛弃艺术"，"结束写作生活"。可是我始终没有办到。

我的主要的作品都是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六年这二十年中间写成的。在解放以前那一段长时间中，我的写作生活是痛苦的。我自己承认过："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的时候，我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什么不可。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种种的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生活，全作品。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同时惨痛的、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

那样在后面鞭打我。"我只有拿起笔写，不顾一切地写下去。

所以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忧郁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不用说，我过去那些作品中的缺点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说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现在抽空把过去写的东西翻看一遍，我只有感到惭愧。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我的作品显得多么地软弱，无色！

然而，为了这四五百万字的作品，我也曾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作为我三十年的文学工作的一点成绩，我保留了它们。我对我的工作并未失去信心。不管我的作品有多少缺点，或者我犯过多少错误，可是我从没有睁起眼睛说谎话。我在一九三五年说过：

> 我是不会绝望的。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贯串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

我的作品可以给我的话作证。我在每部作品的前面都注明它们写成的日期，也保留了我从前写的"序文"或"后记"。我还加了一些注释。它们会告诉读者，这些作品是在怎样的环境里写成的。

现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开始了。看见人民的敌人

的灭亡，看见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的成长，我感到极大的喜悦。虽然我的作品并没有为这个伟大的工作尽过多少力量，虽然我这一枝笔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是为了欢迎这伟大的新时代的来临，我献出我的心，我的笔和我的全部力量。

巴　金 1957年5月。

《巴金文集》后记*

《文集》编到这一卷，算是告了一个段落，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写的作品全收在这十四册书里面了。我在一九五七年写的《文集》的《前记》里说这是"我三十年文学工作的一点成绩"，其实从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写《灭亡》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写完《寒夜》的《尾声》为止，不过整整二十年。一九四七年以后我的时间大半花在翻译、编辑、校对的工作上，当然也读了一些书。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跑了不少地方，也曾写过一些文章，出过几本集子。但是拿质和量两方面说，连我自己也不能满意。我想写新社会，写新人和新事，这一切对我有多么大的引力，这一切在我的眼睛里显得多么有光彩！然而我的笔好像有点生疏，我常常因为它不能充分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而感到苦恼。不用说，我不会灰心，我仍然在学，也仍然在写。我还要继续努力。《文集》虽然到第十四卷结束，可是我的笔绝不会放下。我在《前记》中说过：为了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献出我的心，我的笔和我的全部力量。我不愿意做失言的人，我还

* 本篇收入《巴金文集》末卷(第十四卷)。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版。

有这样的雄心：准备在建国二十周年大欢乐的节日里编印《文集》的《续篇》，用我的文学工作第二个二十年的成绩来表示我对于新时代、新社会、新中国的热爱。

收在这一卷中的《谈自己的创作》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中间的作品。我写这本小书，也只是想对一些来信索复的读者谈谈自己的旧著。十篇长短文章都非说理论道的宏文，不过是些东拉西扯的漫谈，其中一部分还是不曾发表的新作。我现在将这些漫谈附印在《文集》的后面，我觉得把它们当作《文集》的注解，倒是最适当的看法。

巴　金 1961年11月30日。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序*

南国出版社要编印我的早年短篇小说选集，一位不曾见过面的友人愿意替我做编选的工作，我感谢他的好意。《选集》出版，我通过它可能结交更多的朋友，我的心可能接触到更多的年轻的心灵，我过去那一点点光和热可能换回来更多的、更大的光和热。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

在这里，我还想提醒读者，我的小说都不是可以传世的佳作。它们有不少的缺点，我今天更无法为它们掩饰。我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年纪轻，见识浅，了解生活不深，而且容易看到一些表面。但是我的小说里有我的真挚的感情和鲜明的爱憎。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我有满肚皮的话要说，有满腔的热情待发散，我必须写出我的感受才能够使我的心有片刻的安宁。我的确是把创作看成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是严肃地从事这个工作的。

我得向读者告罪：我没有写出旧中国的全貌。然而我写出了二三十年前一部分年轻人的感情和渴望：旧的必须死亡，新的一定成长。我虽然不曾给当时的读者指出一条光明大

* 本篇及下篇系分别为香港南国出版社所编短篇小说及散文选集作。二书后均未出版。

道，可是我相信：往前进，就不会灭亡，一直往前进，就会找到出路，见到光明；我相信：青春是美丽的，春天是属于年轻人的。我曾经不断地叫嚷："我不怕，我有信仰。"这就是我当时的信仰。

我今天要告诉海外读者的也就是这个信仰。在我们祖国春天已经来了。我的园子里牡丹开得正繁，樱花树上挂满了粉白的小朵，深红色丝绒一样的月季含苞待放。我真爱这明媚的春光。希望春风把我的问候带给海外的青年同胞，愿他们的青春开出更美的花朵，祝他们的青春发出更大的光辉！

巴　金 1962年4月在上海。

《巴金散文选集》序

《散文选集》二册和《短篇小说选集》一样，也是那位不曾见过面的朋友替我编选的。我感谢他的热心，同时还向他提出建议，把我的一篇谈自己散文的文章附印在正文后面。

关于我的散文，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讲得很多，我想对读者讲的话似乎都讲过了。不用说，对海外的读者我不会讲另外一套话。虽然我没有机会见到你们，虽然我和你们处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感情，我们的心也不会是两样。我们同样热爱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我们同样愿意为一切美好的事物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信任我的读者，你们也一定信任我。尽管我过去有多少缺点，我幼稚、浅薄、粗心、任性，然而我从未说过假话，我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里也没有虚假的感情。我说过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今天我仍然是这样。

我的散文的确写得很“散”。但是海外的读者一定会原谅我的唠叨。我希望我那点真挚的感情能打动读者们的心。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阻碍不了我们之间情感的交流。让我们携手、心连心，向着无限美丽、无限光明的前程飞奔！

巴　金 1962年4月在上海。

《巴金选集》(上下卷)[①]后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编一部新的《选集》，我照办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选集》里本来有一篇《后记》，我把校样送给几个朋友看，他们都觉得很像检讨，而且写的时候作者不是心平气和，总之他们认为不大妥当，劝我把它抽去。我听从了朋友的意见，因此那本《选集》里并没有作者的《后记》。但是过了一年我还是从那篇未用的《后记》中摘出一部分作为一篇散文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里面了。今天我准备为新的《选集》写后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只用过一小半的旧东西，它给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来，没有丢失，没有撕毁，这是我的幸运。这十一年中间我给毁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类的东西。家里却多了一个骨灰盒，那是我爱人萧珊的骨灰。在"四害"横行、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她给过我多少安慰和鼓励。但是她终于来不及看见我走出"牛棚"就永闭了眼睛。她活着的时候，常常对我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又拿起了笔。

---

① 《巴金选集》上下卷：一九八〇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今天我心平气和地重读十九年前"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旧作，我决定把它用在这里，当然也作了一些删改。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辈作家晚年回顾过去的时候，也写过类似"与过去告别"的自白。我今年七十四岁，能够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在这里回顾一下过去，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谈错了，也可以供读者参考，给那些想证明我"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的人提供一点旁证。

那么我就从下面开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说《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

托尔斯泰的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我终于离开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并没有去到人民中间。我从一个小圈子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到上海，再过两年半，成都的那个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产而自杀。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让自己关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不能够突围出去。我不断地嚷着要突围，我不断地嚷着要改变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实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并非铜墙铁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没有决心，没有勇气。革命的道路是宽广的。而我自己却视而不见，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艰苦地追求。从前我们

在成都办刊物《半月》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①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有时还把他当作导师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继舜。在我离开成都以后，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终于参加了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毙了，他死得很勇敢。……说实话，我当初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指导人让他给我带路，我愿意听他的话甚至赴汤蹈火。可是后来我却渐渐地安于这种自由而充满矛盾的个人奋斗的生活了。自然这种生活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换句话说，我并不曾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好像一个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却习惯了病中的生活，倒颇有以病为安慰、以痛苦为骄傲的意思，懒得去找医生，或者甚至有过欣赏这种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寻一条道路，我读过好些外国书报，也译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尔这类人的回忆录，可是结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人们责备我没有在作品中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实我自己就还没有找

① 指袁诗荛烈士。

到一条这样的路。当时我明知道有马克思主义，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药，我却依然没有勇气和决心冲出自己并不满意的小圈子，总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教。固然我有时也连声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话骗人。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但是提到我个人如何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尽一份力量时，我就感到空虚了。我自己不去参加实际的、具体的斗争，却只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所以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战略、战术和个人应当如何参加战斗。我始终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对旧社会和黑暗的势力，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感觉到我个人的力量就像蚍蜉一样撼不了大树（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树），我起了类似疯狂的愤激。我恨旧社会恨到快要发狂了，我真愿意用尽一切力量给它一个打击。好心的读者责备我宣传个人主义。我憎恨旧社会、憎恨黑暗势力到极点的时候，我的确希望每个人都不同它合作，每个人都不让它动他一丝一毫。……这种想法不用说是脱离群众、孤独奋斗的结果。其实所谓"孤独奋斗"也只是一句漂亮话。"孤独"则有之，"奋斗"就应当打若干折扣。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我甚至在"孤独奋斗"的时候，也常常枪法很乱，纵然使出全身本领，也打不中敌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敌人身旁。而且我还有更多的冷静的或者软弱的时候，我为了向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们表示让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作品无法跟读者见面，或-

者连累发表我文章的刊物。① 有时我也想尽方法刺老爷们一两下，要他们感到不舒服却又没法删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费力气，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软弱无力。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我借用这个旧典故，却给了它一个新解释，我关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望着整个社会的光明的前途。我隐隐约约地看得见前途的光明，这光明是属于人民的。至于我个人，尽管我不断地高呼"光明"，尽管我相信光明一定会普照中国，但是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么希望。我的作品中会有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从井里出来，我就没有前途，我就只有在孤独中死亡。我也在挣扎，我也想从井里跳出来，我也想走新的路。但是我的勇气和决心都不够。

然而解放带给我力量和勇气。我不再安于坐井观天了。我下了决心跟过去告别。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当然改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斗争也需要长期苦战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顾"能够帮助《选集》的读者了解我过去的作品。今天在新的《选集》付印的时候，我还要重复十九年前想说而未说出来的几句话：

---

① 例如《选集》中那篇《窗下》，我在小说里连"日本"两个字也用"异邦"、"友邦"、"那边"等等字眼代替，并非我发神经，其实是我害怕得罪了国民党官老爷，一怒而封禁刊物。然而过了两个月，这份刊物(《作家》)终于毫无理由地被查封了。

我的这些作品中描写的那个社会(旧社会)，要是拿它来跟我們的新社会比，谁都会觉得旧社会太可恨了。不用说，我并没有写出本质的东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绘出了旧社会的可憎的面目。读者倘使能够拿过去跟今天比较，或者可以得到一点点并非消极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

巴　金 1978年9月7日。

文联版《巴金散文选》前记*

今年四月我在日本东京发表了一篇讲话谈我的所谓“文学生活”。我在讲话里又一次重复了我在三十年代中说过的几句话：“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矛盾、思想与行为的矛盾、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又说：“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

今天回顾过去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我仍然保持着这种想法。固然有一个时期我彻底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我所有的作品，但这绝不是欺骗什么人，我说是做了一场噩梦，或者是中了催眠术。总之，现在我醒了。我又有机会翻看旧作，我认为它们一不是废品，二不是毒草，当然，它们都不是完美的作品，我也不是经常正确的人，不过我的旧作中还有不少可读的东西，对读者并非毫无益处，它们有权利存在。结果，我编

* 本篇原系作者为香港时代图书公司编选的《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巴金散文选集》所作，后均未出版。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后者时，易名为《巴金散文选》并刊入本篇。

选了两本集子：一本《小说选集》和一本《散文选集》。

收在这两本集子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我过去探索中的收获，也是我一生中追求光明的呼声。说是探索，我不一定得到了珍宝；说是追求光明，我不一定满目阳光。甚至到了今天，我虽然是八旬在望，生活中、写作上仍然充满矛盾，仍然解决不了矛盾，而且现在发生了一个更大的矛盾。我心里有一团火在熊熊地燃烧；我脑子里不停地响着一个声音："写吧，快写吧！"我觉得满身波涛般奔腾的感情等待着倾吐，我对祖国对人民有多么深的爱！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我的眼睛昏花，我的手动作迟缓，坐久了我腰痠背痛。在过去那些矛盾之外又加上这个新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它似乎比所有其他的更可怕，但是我不怕它。我要奋斗下去。我的火是烧不尽的，我的感情是倾吐不完的，我的爱是永不消失的。一位侨居美国的年轻作家想称我为"与死神赛跑的人"，我不知道她是在开玩笑还是严肃地考虑问题，不过我喜欢这个称号，即使它带点讽刺味道。我真愿意同"死神"赛跑，而且我相信我可以胜过它，因为正如我在散文《生》① 中所说："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亦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

这就是生的法则，我要遵守这个法则。只要把笔捏在手里，我就能胜过"死神"。这样的集子我以后还要继续编选下去。

1980年5月15日，上海。

---

① 《生》，作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收入《全集》第十三卷《梦与醉》。

昭明版《巴金选集》[1]后记

昭明出版社要我为我的"选集"写一篇序，当时我正准备出国，便说，序不想写了，等我回来写一篇后记吧。现在是践诺的时候了。

本来我是不想讲话的。我连编选、出版自己旧作的事情也感到厌倦。两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找我编辑两卷本的《巴金选集》，我勉强地照办了，但是我写了一篇类似"自我批评"的《后记》，即使不彻底吧，我总算解剖了自己。一个人应当严格要求自己，至于做得怎样，当然以他的言行为根据。我的《后记》是为读者写的。我向读者打开门，让他们看见我的房间里有什么陈设，给他们时间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以后有机会，我还要作这一类的自我批评，因为我认为自我批评比自我吹嘘好，对自己、对读者都是这样。但有时我觉得"彻底"解剖自己很难办到，与其反复地自我批评，不如让人完全忘记痛快，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种"自行消亡"的把戏吧。说实话，有时候我也真想"自行消亡"，为了安静，为了听不见那些吱吱喳喳。今年我为两家香港的出版社编了《选集》，都是违心之

[1] 昭明版《巴金选集》，一九八〇年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

举，却不过朋友的情面。既然做了，就得等待后果。我常常说我这一生挨的骂可谓多矣，多少次的围攻、甚至“四人帮”时代无数次的批斗都不曾把我骂死，那么我还要活下去听没完没了的识咒，编印两三本选集有何不可！

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也重视谦虚。谁当面对我说读过我的小说，我总回答：自己乱写一通。但是我读到黄河先生的文章，我才发现世界上真有“乱写一通”的人。黄河先生说我“通过杜大心得出一条荒谬的逻辑：‘凡是最先起来反抗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的一身。’”他的文章印在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第三卷《小说二集》的前面，是“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写于斗室”的。我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写的、后来收在《文集》第十四卷中的《谈〈灭亡〉》里就说过：“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来的。……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这不是讲得清清楚楚了吗？古往今来为革命甘愿献出生命的先烈何止千千万万。请问三十一岁就结束他的创作生活的大诗人雷列叶夫的诗句究竟是什么样的“荒谬的逻辑”！可能有些成天关在“斗室”里的人认为革命是“冒一次险、捞一把”，因此把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看作“荒谬的逻辑”。但我想，《新文学大系续编》的编者的头

脑总是清醒的吧。究竟谁“荒谬”，我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

棍子打死人或作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作者有权利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对打棍子的人我只提出一个要求：你们下棍子之前，请先把作品看懂。

我的作品有种种的缺点，但我看不出“荒谬的逻辑”在什么地方。我虽然重视谦虚，也不愿在棍子下面低头。我还能保护自己，用不着在这里饶舌了。

巴　金 1980年8月19日，上海。

《巴金选集》(十卷本)[1]后记

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

---

① 《巴金选集》十卷本：一九八二年七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开地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想重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十卷本的选集。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的，而且像我这样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习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

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页的书，[1]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脚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十九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

[1] 见尼可拉·莫斯卡尔德里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一九七六年米兰版。

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硃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三

这两年我一直在探索文学艺术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些意见。

四个多月前在瑞士苏黎世我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看了不少的绘画和雕塑，其中有一部分我听了讲解员的解说以后仍然不懂。即使是一幅名画，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始终毫无所得。回到旅馆，坐在窗前躺椅上反复思索，我想可能是自己修养不够，文化水平低，知识缺乏，理解力差。我偶尔也读过一两篇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我不了解作者的用意，有人

告诉我要靠读者自己动脑筋去想，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

我并不为这些感到苦恼。我苦苦思索的是这一件事情，是这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我是在沙滩上建造象牙的楼台、用美丽的辞藻装饰自己？难道我们有权用个人的才智和艺术的技巧玩弄读者、考读者、让读者猜谜？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文学艺术究竟是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娱乐品、消遣品或者“益智图”？究竟是不是让人顺着台阶往上爬的敲门砖？

岂止两年！我一生都在想这样的问题。通过创作实践，我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我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巴　金 1982年2月15日。

《巴金论创作》①序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作家论创作》丛书，希望得到我的一部稿子。我虽然常说自己不懂文学艺术，但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我经常发表有关创作的议论，有时甚至信口开河，夸夸其谈。那些长短文章倘使给搜集起来，也可以编成一大本。但是里面有多少发光的东西，我自己也说不出。我更不能保证它们句句正确。同样的话说得太多，便成了老生常谈，而且有时候议论前后矛盾，自己会跟自己打架。这说明我一直在探索，在追求，也在改变。我不想替自己掩盖。我也不想编这么一本集子给自己背上一个包袱。（一九六二年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那篇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不是把我整整压了十四年吗?!）何况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也没有精力做这种编辑工作，我决定放弃它。我正在考虑，正在推辞，正在拖延，出版社看出了我的弱点，就把编辑工作委托给我的女儿小林和她的堂妹国煣，她们很快地把编好的集子送到了我的手边。出版社只要求我写几百字的前言后记。

我翻看了小林她们编选的集子，感到轻松。我写文章从

---

① 《巴金论创作》：李小林、李国煣编，一九八三年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来不够客观，议论创作总是畅谈自己的经验。由别人来整理我那些言论，即使是我的女儿和侄女吧，也可以减少一点它们的片面性。

对文学艺术我当然有我的看法。我的思想有时也会有改变，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我始终认为文学艺术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它属于全体读者（和观众）。任何人有权走上文学的道路，但是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感受和经验。我并不轻视这些自己的东西。我不断地把它们带到创作实践中去接受考验。我活着，不是为了自己。我写作，也不是为了自己。若干年前我决定继续走文学道路的时候，我曾在我心灵的祭坛前立下这样的誓言：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年轻的心把人间万事都看得十分容易。只有在数十年后带着遍体伤痕回顾过去，我才怀疑自己两手空空究竟有什么东西分给别人。我并没有好好地利用我这一生。现在要从零做起已经不可能了。但是笔还捏在我的手里，红灯还亮在我的前面，我还有未尽的职责，我还有未偿还的欠债，我没有权利撒手而去，我仍然要向着红灯前进。

红灯是什么？不就是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中勇士丹柯那颗燃烧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高尔基的名言：

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还有老托尔斯泰写给罗曼·罗兰的一句话：

凡是使人类联合的东西都是善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

我忽然想起了六十年前的事情。我还不满十九岁，同长我一岁的三哥乘木船从成都去重庆、转赴上海。在离家的第一天，夜幕下降，江面一片黑，船缓缓地前进，只听见有节奏的橹声，不知道船在什么地方停泊。在寂寞难堪、想念亲人的时候，我看见远方一盏红灯闪闪发光，我不知道灯在哪里，但是它牵引着我的心，仿佛有人在前面指路。我想着，等着……，我想好了一首小诗。后来我写出它，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发表在那里。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啊，
请挨近一些儿吧。

诗不是好诗，但说明了我当时的心情。今天翻看自己论创作的集子，我又有了这样一种心情。我的生命之船将停靠在什么地方呢？……我不能想着、等着了！我真想向着红灯奔去。

巴　金 1982年2月18日。

《愿化泥土》[1]前记

这本小小的散文集是吴泰昌同志替我编选的，用《愿化泥土》作书名倒是我的想法。我喜欢这篇短文，它写出了我的心愿。我活了八十年，也许还要活下去，但估计也不会太久了。我空着两手来到人间，不能白白地撒手而去。我的心燃烧了几十年，即使有一天它同骨头一道化为灰烬，灰堆中的火星也不会给倾盆大雨浇灭。这热灰将同泥土掺和在一起，让前进者的脚带到我不曾到过的地方。我说"温暖的脚印"，因为烧成灰的心还在喷火，化成泥土它也可能为前进者"暖脚"。

奋勇前进吧，我把心献给你们。

巴　金 1984年3月16日。

---

[1] 《愿化泥土》：一九八五年九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巴金六十年文选》[1]代跋

——致李济生

济生：

你要我为《六十年文选》写几句话，我不知道怎样写才好，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哪些话是空话、假话，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对我，最好的办法是沉默，让读者忘记，这是上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编好文选，送了目录来，我不好意思当头泼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便同意了。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说了多少假话。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无法避免。

我近年常说我写《随想录》是偿还欠债，我记在心上的当然只是几笔大数。它们是压在我背上的沉重的包袱。写作时我感到压力。好不容易还清了一笔债，我却并不感到背上轻松多少，因为负债太多，过去从未想到，仿佛有人承担，不用自

---

① 《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篇用于该书时题作《给李济生的信（代跋）》。李济生，作者的小弟。

己负责。从前当惯了听差，一切由老爷差遣，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倒好办事。现在发觉自己还有一个脑子，这脑子又不安分，一定要东想西想，因此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给找了回来，堆在一处，这里刚刚还清一笔，那里又记上一个数目。有时觉得债越还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由于这种想法，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路。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多说也没有用，你既然把其他不少文章都选入了，那么就让它去吧。我精力不够，因此只在这里讲一件事，讲一篇文章，那就是《法斯特的悲剧》。我希望收入这篇文章和接着发表的那封简短的"检讨复信"，我当时不曾对你说明我的想法。你可能也不明白。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一九五八年三月《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悚然，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又来信通知，读

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些论点！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加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别的话一年后再说。现在我只想躺下来休息。

巴　金 198 年12月5日。

《怀念集》[1]代跋

——复采臣信

采臣：

来信和布鲁南同志的信都收到了。你们要重印《怀念集》并出版增订本，我当然同意。你们增补了七篇文章，我又找到了第八篇，我看大概不会有遗漏了。可是把发表过的怀念文章重读一遍，我才明白不但有遗漏，而且遗漏太多！我还记得近两三年间常有人来信建议我为某某亡友讲几句话，或者谈谈我对某些故人的怀念。我又写了一些。我愿意写，我也应当写。不过我写得很吃力，这是由于我的病。我写得很慢，因为我蘸着自己的心血在写作。好不容易写完一篇，我叹一口气，仿佛偿还了一笔债。我下了决心：一笔一笔地还，一篇一篇地写，欠账再多，也要还清。我一直这样地相信。

但是现在坐在书桌前，望着玻璃板上一些乱堆着的信件、稿纸和报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无法搬动这座"纸山"，也很难在桌上摊开一张稿纸顺利地写几行字。静静地坐着，默默地思考，不过一刻钟，我就感到十分疲倦。原来我是一个病

[1] 这里指的是《怀念集》增订本。一九八九年六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采臣，作者的大弟。

人，我明白我不得不搁笔了。

搁笔，这不是空话。我并不想搁笔，但是笔不服从我的指挥，手不听我的话，我越是着急，心越是跳得厉害，手也越抖得厉害。这说明必须到此为止了。所有未写完的话，一切不曾倾吐的感情，今后都只好给咽在肚里，它们将作为灯油让我心里这盏长明灯燃下去，长久地燃下去。那么即使我无法再写一个字，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有限的时光。印在纸上的字是不能让人随意揩掉的。我的思想还是要和我对朋友们的深切怀念紧紧地贴在一起，我的心也绝不会远离朋友们的心。即使不能用文字，我也可以用行为表示我的忠诚。

三十年代我就说过我靠感情生活，而且正是友情使我几十年的生活有了光彩。从这方面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也可以说，对我的许多朋友(不论是亡故的或者健在的，不论是年长的或者年轻的)我欠下了还不清的债。"还债"的话我讲了几十年，只有在没有精力继续动笔的今天，我才明白，反复讲来讲去的空话有什么用，倘使我不能做一件事说明我的忠诚?!

最近我常常想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两篇童话《忠实的朋友》和《快乐王子》。我绝不做那个自吹自擂、专说漂亮话的磨面师大修，我宁愿作冻死在快乐王子铜像脚下的小燕子!

巴　金 1987年3月20日。

《巴金书信集》①序

——致刘麟同志

我没有能按时交出序文，由于我意外地摔倒，不能起床，三个月内无法工作。我并不为这件事着急。当初我主动地提出自己编辑书信集的时候，我的打算倒是推迟书信集出版的日子。

多少年前我就说过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上次写那封信的时候，我还在心里跟自己打架。一方面我赞成发表作家信件让读者有充分研究的资料，理解作家的心灵。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掏出自己的心，扔在"案板"上给读者仔细解剖。因为我还活着，我有权不让别人知道我的一切私事。我同意发表私人书信之后，我又坚持保留一部分书信的权利，不让读者随意接触它们。

公民通信自由受到宪法保护，似乎人人皆知。但多数国家、多数人民的这种自由并未得到真正的保障。这种自由常常遭到侵害，我们自己也不能、或不敢尽全力来保卫。

私人信件可以随意公开，断章取义，任意定罪。给我印象

---

① 《巴金书信集》：一九九一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最深的是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我学习过多次，也发过不少批判谬论，但是我至今还不明白一些文人写给朋友的信件会变为"毒品"，流着一滴滴的血，残害人的生命。

这以后谁还敢写一封信？

现在我们应当采取保护自己的行动了。大家都不放弃权利，即使为了研究我们的作品需要多少资料，多少文字，要发表任何信函都必须得到原作者的许可。

我想说的就是这几句话。

作为这本书信集的主编我就只做了这件工作。其余全靠您帮忙了。

巴　金 1989年5月11日病院中。

致刘麟同志(二)

一、书信虽是一种文体，但我的信函却缺乏文采，至多只能作为一点供研究用的资料而已。

二、书信集的编辑工作是您代做的，因此请您写一篇编辑说明。

巴　金

《回忆》[1]后记

大约在公元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间，上海第一出版社一位林先生向我约稿，他们要出版一套《自传丛书》，已经收到了郁达夫和沈从文的稿子，还有别的作家的著作。他们看见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杨嫂——自传之一》，希望我也为他们写一本那样的自传。我想，写回忆很简单，有多少写多少，反正我的书不用"自传"的名字，我就答应了他。

我靠回忆写作，笔仿佛长了翅膀，不用我苦思冥想，到期稿子交了出去。我题的书名是《回忆》，印出来却变成了《巴金自传》。不承认吧，林先生已经不在第一出版社，我也无法给这本书"正名"。好在书的印数不多，又未再版，而且不久连第一出版社也不存在了。

一九三六年我编辑散文集《忆》，手边还有《自传》的样书，翻看一遍作了些改动之后，就根据需要收进新的集子。只有《写作的生活》一篇我已编入了《短篇小说第一集》，就不用再为它操心了。收在《忆》里的文章，重版一次，我总要作一些修改，而编《文集》，出《选集》，改动更大。

---

① 《回忆》：一九九〇年五月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这样地改来改去，并不是我喜欢精雕细琢，正相反，我不擅长驾驭文字。可能有这样的事：七改八改，我又回到原处。但是我仍然主张作家有修改旧作的权利。越改越差，那就是对自己的惩罚。

最近有人建议重印初版《自传》，我破例地同意了。我想，就让读者见见五十五、六年前"我"的面目吧，连那些毛病都给保留起来，一字不改。可是我并没有能办到，我不得不在《最初的回忆》结尾的部分中加上一行：

"我们家添了两个妹妹：九妹和十妹。"

这说明五十几年中我一直不曾发现在广元生活的回忆里我漏掉了我的九妹。当时我六岁，她只有一岁。她后面还有一个比她小一岁多的十妹。十妹早死，连名字我也说不上来了。三十几年来九妹一直和我住在一起，还帮助我经历了"文革"。她活得健康。

因为增加了前面那一行，我就不得不在别处改动一两个字，但增删的地方很少。说句实话，我的手抖得厉害，写一个字好不容易。

巴　金 1989年10月9日。

《巴金短篇小说集》[1]小序

日本友人山口守先生编译我的短篇小说集，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年轻时候是个爱唠叨的人，过去出版的大小开本的图书，前前后后都有作者的说明，或译者的解释。初版有小序，重版又加后记，唯恐读者不理解我的心思，反反复复，一说再说，经常拿自己的主张填满别人的脑子。却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否定了自己，完全否定自己，脑子里装满别人的东西，反而扬扬得意，仿佛不用自己脑子思考，倒更省事，倒更聪明。

我的书橱里还有几十本小开本的笔记本，全是我亲笔写下的报告记录，那些年别人就用它们来填我的脑子。一本一本，填啊填啊！还加上不眠的长夜，加上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我写的这些小说都被当作"毒草"，看成"邪书"，我因为写了它们而受到惩罚，而被别人否定，甚至被自己否定。十年梦醒，我才明白这是一场打不完的官司。究竟是不是毒草，是不是邪书，有资格说话的还是我自己。

我说过我不是文学家。今天我还是这样地认识自己。我写作，因为我要用文学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

---

① 《巴金短篇小说集》，〔日〕山口守编译，东京Jiee出版局出版。

的精神世界。我并不曾玩弄人生，我也不曾美化人生。我在作品中生活，我在作品中奋斗。

就是这几句话。我用不着啰唆了。

1990年11月26日。

《巴金谈人生》[①]前言

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六十二年，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八十七岁的老人回顾过去，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生，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写作上，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1991年2月14日。

① 《巴金谈人生》：李存光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第 二 辑



我们的宣言*(《平等》发刊词)

“平等，平等！”一个何等美妙的名词呵！你是几千年来平民的脑筋里唯一的理想，你是许多人渴慕仰望的福音，为了你，为了要求你的实现，我们无数的同胞已牺牲了他们的幸福，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一切了。美国的独立，法俄的革命，这几次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哪一次不是为的是你，血战场中河一般流着的腥血，山一般堆积的尸骨，断头台上，绞绳和利刀下殷殷的血斑，监狱内囚犯的眼泪以及陋巷茅屋中妇人小孩啼饥号寒的哭声，哪一样不是为了你。这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已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了！

然而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却是一个多末不平等的社会啊！一条大的沟把人类分成了两个大的阶级，掠夺者和被掠夺者，有产者和无产者。一些人个人每天的浪费足以养活一千多家的人还有余，另外一些人连每天必需的饮食也难得到。一方面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住的高楼大厦，另一方面吃的残汤剩饭，穿的破衣烂鞋，住的茅屋陋巷。一方面穷奢极欲，一方面贫困惨苦。一方面许多的富人全不作工，毫无出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平等》第一卷第一期。未署名。

产，只靠着他人的劳力而生活，他们享受各种娱乐，花费许多金钱，雇用许多仆人，占据许多房屋，垄断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许多的贫民去寻找工作却找不到，他们的家族受着饿，受着冻，受着极大的困苦。有工作的，每天挥着汗来养活家族，因为工作过度，饮食恶劣，到了三四十岁便死去了，留下他的妻子儿女受苦。这是何等的可怕啊！然而还不只此，一阶级的人握着另一阶级的人的生杀之权，可以任意的加以杀戮囚辱，而别一阶级只有匍匐去就死。

"饿死了，冻死了，平民什么权利都被剥尽了，到后来你们只有含泪吞声的哀悼你们自己的命运，然而那些靠着你们的恩惠而生活着的无耻的富人们却公然在举酒狂饮呢！"我们一读十八世纪末期流行于法国的这首歌曲，谁能不为他们流一掬眼泪呢？然而可痛的是，这正是为我们自己的写照！

翻开一部历史来看罢，那光荣灿烂的记载未尝不冠冕堂皇，然而字里行间，哪一处不是世世代代流离辛苦的平民的血迹。好血腥呀！难道我们竟不能闻着么？我们的祖先的血也已流够了，我们自己的血也已流够了，难道我们儿孙的血还应该继续的流下去么？

我们一样的是血肉的身躯，一样的有天赋的智慧。我们辛辛苦苦地造成了现社会的财富，为什么我们还应该匍匐在一阶级的势力下面，沉沦在贫穷的苦海之中？

"平等！平等！"，从这被苦痛贫穷悲惨等所包围着的穷人的世界中，洪亮的钟声响起来了。

我们不愿意再做被压迫的奴隶，我们不愿意再做那在命

运之神势力下过活的弱者。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权力。我们要来要求"平等"。这不平等的社会应该消灭，不平等的阶级应该铲除，人治人的机关，资产阶级用来压迫我们的工具，政府法律军警等等应该打倒。

我们要求的是经济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人人都能享同样的幸福，尽同等之义务。没有主人，没有奴隶，没有政府，没有平民，没有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我们要持着大旗向着这自由平等的社会猛进。我们的旗帜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它的方法便是"革命"。

有了"革命"，我们的"平等"才不是空想，有了"革命"，我们才能打碎奴隶的镣铐而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们都是革命党。

白纸上印了黑字的这每月一张的小小刊物，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我们的唯一武器，这不过是我们的呐喊，我们的旗帜，唤起我们同胞的一片钟声。在这里有我们主张的说明，在这里有我们运动的记载。有的是如火如荼的激烈风潮，有的是点点滴滴的血泪结晶。沉沦与黑暗世界中的未觉醒的同胞以及一切同情于我们的人请快来团结在平等的旗帜下罢！我们愿推起二十四生的大炮为你们的前驱！

说几句开场话*（《自由月刊》）

一个刊物出版的时候照例篇首总有几句开场话，即所谓“发刊词”是也。话自然说得冠冕堂皇，可是以后能否照样做去，就是问题了。我们也未能免俗，想学学时髦来玩这一套把戏，不过我们究竟小家子气太重，不会吹牛，所以我们的“开场白”就太不冠冕堂皇了。

第一，我们声明，这刊物是模仿的，不是独创的。老实说一句，我们是看了开明书店的《开明月刊》后，才起了出版这个刊物的心思。

第二，我们声明，这刊物是广告，不是宣传。老实说，我们是为了替自由书店的书籍发广告的缘故，才要出版这个刊物。不过登广告，就并不是一定要替自由书店的书籍吹牛，骗人去买；我们只是想把这刊物弄得有趣味一点，使得大家愿意读，然后由此引起大家去买自由书店的书。所以这只是一个半文艺半广告的刊物而已，并无其他的野心。

第三，我们声明，这刊物是公开的，不是私有的，是书店和主顾（读者）的通讯机关，读者对于本店有什么意见和批评，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未署名。

们当尽量的发表。就是骂，只要不是谩骂，我们也很欢迎的。

总之，有了这小小的刊物后，自由书店的主顾们大概不致于大呼“上当”了。

在退场之前，我们还要向主顾们说一句话，请诸君多多投稿。

编者的话*（《自由月刊》）

老了十年　本刊第一期出版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算到如今恰恰满十年了。然而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稿子是由我在今年一月初编好送到印局去的，怎么会倒退在十年前出版呢？十年前不要说这个"编者"还是黄口孺子，不要说自由书店没有开张，连替我们印刷的印局也不曾出世咧。一个孩儿纵然能够如童话里所说"见风长"，但总不能先母亲而出世的，自由书店好比《自由月刊》的母亲，没有母亲当然没有孩子。这样一说，《自由月刊》无论如何决不能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了。可见第一期封面底所印的出版期是错的。更正罢，自然写上"手民排误"几字就可以把我的责任卸掉了。然而如果印局的经理先生拿出初校、二校的样子来看呢？我自己看了一遍，二遍，都没有把"一"字之差看出来，这又好怪谁呢？只得叹了一口气说道："老了十年"。

一个与其他一个　马拉与巴金当然是两个人，一个姓"马"，一个姓"巴"；一个是本刊的编者，一个是编者的朋友。一个向其他一个索稿，其他一个便送了几篇译诗来，一个把这些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未署名。

诗在本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一首，又在预告里登了一首的题目出来，不幸署的名字错了，乃是一个的而不是其他一个的，其他一个看见了，自然是不大高兴，觉得一个有冒名之嫌，一个赶快在这期上声明一句，《普希金……诗》是巴金译的，与马拉无关。

偷得不像 《自由月刊》刚刚出版，我便亲自送了一册给《开明月刊》的"主宰"先生。主宰先生接到了这本书，先用他锋利的眼光从宽边的眼镜把这本薄薄的小书检查了一遍，然后微笑地用他的纯粹的国语说道："完全偷开明的，但偷得不像。"我连忙恭而且敬地答道："主宰先生哟，你要鉴谅小子的这点苦衷，如果偷得太像了，岂不是要发生版权问题而吃官司么？唯其偷得不像，所以被偷者虽明知被偷，而无法证明偷者的偷窃行为，真是苦在心头，说不出口了。这一点你主宰先生不免上了小子的大当了。"主宰先生笑而不答。小子亦得意而退，退而草《编者的话》也。

告别的话*（《文学季刊》）

季刊出到这期，刚刚满两周年。自然两年并不是长时期。但是这两年中间我们也曾遇到一些风波。有几次意外的困难几乎使这刊物夭折了。然而靠了几个人的苦心和多数投稿者与读者的大量的帮助，它终于支持到了现在。这其间我们除了看清楚我们这文坛的真面目外，还明白了人情世故，感到了爱憎，最可宝贵的是我们认识了一个整代的向上的青年的心，而跟着他们叫出他们的苦痛与渴望了。

单就这两年的短促的存在来说，季刊也并不曾浪费地消耗过它的生命。然而环境却不许它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在这里只用了简单的“环境”两个字，其实要把这详细解说出来，也可以耗费不少的篇页。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投稿者、读者告别。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会哀悼这刊物的消灭；我们知道有一部分青年的呼声会因此而被窒息。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没有遗憾。然而在这时代，在整个民族的命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未署名。

运陷在泥淖里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刊物的存亡似乎是极其渺小的事情了。

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东西。在太平的时候我们似乎也需要一些教授和博士，学者和文豪来粉饰我们这民族的光荣。那时我们也许可以安安稳稳地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然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种余裕。我们的眼睛虽然近视，但我们并不是盲人。我们不必故意作吓人听闻的危言；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我们就知道这民族目前是站在怎样可怕的一个深渊的边沿上，一举脚便会投到无底的黑洞里去。在这时候我们把全部力量用来挽救这危机还嫌不够，我们更没有多余的精力和生命来消耗在文字上面。每个向上的青年倘若能够抛弃他们的笔去做一点更实际的事情，对于这民族的绝望的挣扎也许还更有益处。否则虽有更多的教授和博士，学者和文豪，也决不能够挽回我们这民族的劫运。

在《发刊词》里面我们曾经发过一番冠冕堂皇的议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我们举出了下列的五种艰巨的工作：

一、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

二、文艺创作的努力；

三、文艺批评的理论的介绍与建立；

四、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

五、国内文艺书报的批评与介绍。

现在我们把这八厚册的季刊仔细地翻阅一遍，我们可以坦白地承认在这方面我们的收获是极其贫弱。但我们并不为

这个感到惭愧。我们知道，在跟着一个整代的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这一点上，我们是尽了不小的责任了。在这八厚册中有许多篇创作是会跟着这一代的青年活下去的。我们知道文学不是没有生命的活骸，离了时代就没有文学。所以当一代青年的渴望应该用行为来表现的时候，我们也就毅然地牺牲了季刊的两年的可以说是光荣的存在而毫不顾惜了。

别了，我们的真挚而大量的朋友们，这两年来承你们不断地给了我们种种的帮助和鼓舞，使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有勇气挣扎下去。倘使没有你们，我们连这一点成绩也不会得到。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力量的结果。这八厚册刊物摆在我们的眼前，闪耀着，就像一颗光亮的星。星光虽然有时也会隐匿，但它却决不会消灭。倘使有一天环境使我们有余裕重提起笔，那时候这颗星会发出灿烂的光辉，而我们这季刊也会像从火里出来的凤凰那样，以新生的姿态和你们相见了。我们这次的分别不会是永久的。别了，我们的真挚而大量的朋友们。

复 刊 词*（《文学季刊》）

四个月以前我们怀着苦痛的心告别了读者，在《告别的话》里面我们解说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曾痛切地说：

> 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楣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告了别。①

然而连这样软弱的话句也遭受了藏在“王道”精神后面的刀斧。当我们的呼声被窒息的时候别人甚至不许我们发出一

---

* 本篇即《文季月刊》的“创刊词”，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文学季刊社。

① 这一段话在《文学季刊》二卷四期中不见了，《季刊》的另一位主编郑振铎删改了它。我发现这个改动已经晚了。我记得曾经在新创刊的《作家》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杂感。（一九八九年注）

声呻吟，申辩一下是非。于是各种各样的流言就在外面散布了，据说，我们这季刊的休刊，原因是读者的不需要。我们自然没法替自己辩护，但同时却有不少的读者用了笔和舌给我们送来安慰和鼓舞。

这安慰和鼓舞始终没有间断过，到后来就离了语言文字而被用行动来表现了。这一次是真实的读者出来表示了他们的需要。这事实使我们得以从被强迫的沉默中翻了身。我们这季刊是复活了，而且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是以新生的姿态复活了。

但我们并不是忘恩的、背信的。我们在《告别的话》中所允许过朋友们的一些约言，我们要尽力去实践。以前的季刊是我们和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的月刊也应该是的。

我们不是盲人，我们看得见我们这民族正站在一个可怕的深渊的边沿上，所以我们依旧没有余裕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这民族的光荣。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意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季刊曾尽过一点责任，我们的月刊也会沿着这路线进行的。至于我们这一次能否完成这工作，那全靠朋友们的大量的支持了。

复刊献词*（《烽火》）

《烽火》继《呐喊》之后于二十六年九月五日创刊，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想贡献个人的微薄的力量为前方的忠勇的将士和后方的义愤的民众尽一点“呐喊助威”的职责。创刊以来我们曾经遭遇到种种意外的阻挠和困难，但我们始终不忍使这个小小的刊物夭折。这其间不断地给了我们以援助和鼓舞的是许多作者和读者的稿件与信函。从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我们的弟兄们伸了手过来帮助我们擎起我们的“烽火”。在我们的力量上添加了无数弟兄们的力量。最后胜利的信念把全中国儿女团结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这事实增加了我们的勇气。甚至在东战场形势改变，国军退出淞沪，大上海完全沦陷以后，我们还竭力使我们的“烽火”燃烧在敌人的阵地，但我们的发行处却已经成为灰烬了，接着来的禁止和封锁，断绝了我们和许多作者、读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在中立区域里自由地扬起我们的呼声。但我们也不愿让敌人永远窒息了它。现在经了一些时日努力的结果，我们又在自己的土地上重燃起我们的“烽火”。我们诚挚地希望那无数与我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烽火》第十三期。未署名。

暂别了数月的弟兄们再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个事业，使“烽火”永远燃烧一直到最后胜利的日子。所以在《烽火》复刊的时候我们再把《呐喊》(《烽火》的前身)的《创刊献词》刊登在这里，作为一件信物，读者可以根据它来不时督责我们忠实地从事我们的工作，实践我们的约言。

写给读者*《烽火》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的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这些日子里我们的救护队含着眼泪埋葬了成千的死者，无辜者的血染赤了广州的街市。但是在这里依旧充满着愤怒的呼喊和坚定的信念，却听不见一声乞怜的哀号，犹如在东西北线各战场上默默地贡献了最后一滴血的千百万的士兵，他们的脸上也不带一点畏怯的表情，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目标会把中国拯救的。

巴　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烽火》第十八期。

给读者*（《烽火》）

《烽火》十九期又和读者见面了。关于这刊物的脱期，作为编辑人的我，是不能卸除责任的。我不想辩解，我只转载我前一个月写的一篇文章（在香港《大公报》文艺栏发表），说明我们在轰炸中怎样地过着日子。此外我还应该叙说一件事实，我最近带了编好的三期《烽火》的稿子走过许多地方，甚至在汉口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承印处。我们既没有雄厚的资本来付高昂的印价，又没有充裕的时间精力和印局负责人不断地交涉，在这陌生的环境里两三个人的有限的努力常常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因此《烽火》的脱期便成了不可免的事情。我很惭愧，竟这样地辜负了许多读者的期望。但我们以后还是要尽力克服种种困难把这刊物维持下去的。

关于“自我救亡”，作者石锋先生后来写信说：“因为那样的东西是这次我在前方所感到的。的确要是这样的‘自我救亡’，前途实在太危险了。最近茅盾先生来信说：‘我也愿看一些揭露抗战中种种丑事的报告文学……因为他到底看到了一点，而且说出来了。’但好是好的，恐怕能发表出来的‘揭露丑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烽火》第十九期，署名编者。

事’的东西还很少。因为最容易引起误会……悲观主义呀，破坏统一战线呀。我曾听见‘批评家’这样说过。……”

写给读者(一)*(《文丛》)

本期《文丛》①付排的时候，编者②已经动身"入川"了。大部分的稿子还是他在寂寞的旅途中整理后寄来的。我不忍辜负编者的苦心，自动地担负起校对的工作，准备让刊物按时与读者见面。但是刊物还不曾付型，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地响了。我每天去印局几次催送校样，回"家"连夜批改，结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取到全部纸型。那时敌骑已经越过增城，警察也沿街高呼过"疏散人口"了。第二天的黄昏我们就仓皇地离开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外，还带着本期《文丛》的纸型。二十一期《烽火》半月刊虽已全部排竣，可是它没有被制成纸型的幸运，便在二十一日广州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居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意外的事。现在

---

* 本篇为《文丛》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卷头语，未署名。

① 《文丛》：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的文艺刊物，由靳以担任编辑，一九三七年三月在上海创刊，每月一册，第一卷共出六期。一九三八年在广州续刊第二卷，改为半月刊。

② 编者：指靳以。

我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在我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当然高兴。

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①，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

1938年11月25日在桂林。

① 见白居易的五言律诗《草》。

写给读者（二）*（《文丛》）

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还不曾忘记你们。

请不要惊讶我们在这里用了“倘使”两个字。编印这一本薄薄的刊物，我们也经历了不少的艰辛。不用说，这是一个不值得提说的小小工作，但我们也愿意尽我们的微力酬答诸君对刊物的爱护和对我们的期望。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交通阻塞”和“物资缺乏”的限制外，我们的工作还不断地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用一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地尽力做去了。

然而甚至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断定我们的努力将有什么样的成绩。说不定两个钟点以后，便有几十架敌机闯进这个城市的天空来毁坏我们的一切。这不是我的过虑。七年前在上海闸北的土地上，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原稿① 被侵略者的

---

* 本篇为《文丛》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卷头语，未署名。

① 指《新生》。

燃烧弹烧成灰烬，最近在广州市区的大火中又埋葬了我们几个人大半年来的心血。[1] 前几天这个市区还遭到敌机第四次的残酷轰炸。谁能说在过去四次的大屠杀以外，敌人不会再来作第五次的暴行！谁又能断定这些纸张和铅字可以扑灭燃烧弹的火焰，不致成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中一件小小的牺牲品！

我压下愤怒的火几次走过灾区。我看见那些残破的房屋，看见头发和衣服还粘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看见排列在郊外街巷里的无辜者的尸体。有一次我踏过还在冒烟的瓦砾堆，陪一位朋友去探望他那被包围在火海中的故居，我们无法在火堆中找出任何的遗物。我们又走过已经燃烧了六个钟头的街市。我望着一家旅馆的高门楼烧断，让砖石和焦木带着千百点细小的火星塌了下来。在山洪暴发似的巨响之后，我听见一个男人在废墟上发出"救命"的尖声呼号。

这些景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而且我相信每个身经目击的人也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燃烧的城市的苦难，激起了诸君的愤慨和关心。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神，正如刊物的停刊与撰稿人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的信念消灭。倘使这本小小的刊物能够送到诸君的手中，还希望你们牢牢记住弟兄们的这样的嘱咐。

1939年1月5日在桂林。

---

[1] 指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



第　三　辑



《妇女解放的悲剧》译后记*

高德曼要我把她的著作译成中文供献与中国的青年。特别是在她赴中国的计划失败后(暂时)她这个希望更是热烈。她希望由此她的理想可以感动中国青年如像她感动欧美青年那样。虽然她自己谦虚说她的力量很薄弱，而实际上她的言语，她的著作的力量是没有人能够抗拒的。梭谷士(Czogosz)听了她的讲演便去刺杀麦金利(Mckinley)，这便是绝好的证据。我自己便是一个受了她感动的青年，自然我也希望她的作品能感动别人，如像感动我那样。因此我便一口承担下来。关于社会问题著作的译文，已陆续在其他刊物发表；关于妇女问题的一部份译文，假若《新女性》肯允许我，当继续在《新女性》上发表。至于译文是采用意译法的，间有增减的地方，好在高德曼允许这样做的。

译　者 1926年3月30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新女性》第一卷第七号。

《面包略取》[1]译者序

这次费了三四个月的功夫，译完了这部《面包略取》后，所感觉到的只是惭愧。我之所以敢于把这拙劣的译文，献之读者诸君，并非因为我的译文是值得读的，而是因为原著的伟大，便是极拙劣的译文也能表示出它的好处来。至于我自己，学识既浅薄，对于主义的研究也不深刻，虽想尽力向好的方面做去，但为力量所限，只能产出这样拙劣的译文来。

这次翻译所根据的本子，有三种：（1）一九一三年增订的英文本，仅有克氏的自序；（2）一九二一年重印法文本，这大概是照一八九二年的原文重印的，仅有邵可侣的序；（3）一九〇九年平民社翻译的日文本，据说是幸德秋水的译笔。不过大概以英文本为主，有时英文本所没有的地方，也根据法文本补入，有些地方也采用日文本的名词或语句。同时我手边还有一部人人会同志翻译的中文全译本，（未出版，我们最初本想将此书略加修改即付印，但一方面因人人会中某同志不愿将此书出版，一方面我的意见与此书译者不同，若加以修改，恐反将原译者的意思失掉，故决定另起炉灶。）翻译时采取

[1] 《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署芾甘译。

的地方也不少。至于第一章，则以《自由人》月刊第三期上信爱同志的译文为根据，略加修改而已。此外同志自性君的第四章和第十三章的译文(未发表)，冰弦君前四章的译文，浚霜君《工钱制度》，和《自序》的译文，以及全部的节译，对于我都有很大的帮助，特别在这里声明一句，表示不敢掠美，总之，这部译本，若有一点好处，都应归功于原著者和以上的诸人，若有坏处，则应完全归咎于我。

我自己所很感觉不安的，就是译这书的时间太短促。我今年差不多没有过着一刻安定的生活，有时一提起笔，又因为其他的事不得不立刻把笔放下。虽说从第一页翻译起译到末页，中间经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然而计算起来，真正安心翻译的时间还不过一月呢。译文如有疏漏和错误，这也许是一种原因吧。但我不敢以此自护其短，我只希望读者加以合理的指正。

原书凡表示主要意义，或当做固有名词用的普通名词，第一字母都用大写，译文于字傍加"●"。原书为给读者以特别印象用大写的语句，译文于字傍加"○"，原书用斜体字的字句，译文于字句傍也加"○"。

本书的注分四种：一，著者自注；二，英文本注；三，日译本注；四，译者注。

本书是在十九世纪所著；所谓世纪是指十九世纪，译者一仍其旧。

以上三节是信爱同志翻译第一章时立的译例，因为我仍

循此译例做去，故把它录在此。关于本书的译名也应当说一说：《面包略取》是日文本的译名。有人以为用"面包之战胜"好些，有人又把"略取"改为"掠取"，不过我觉得"略取"要好一点，"略"是"攻城略地"之"略"，而非"掠夺"之"掠"，面包本是人人应该有的，不幸一般贫民的面包被人掠夺去了，现在应该略取回来，这个意思是容易明白的。假若读者还觉得不好，那么还有一个名称：《面包与自由》，这是克氏替俄文译本所改的名称。我想，《面包与自由》倒要好一点，不过因为《面包略取》知道的太多了，不如照旧用去罢！

本想请贾维同志用俄文本替我校对一遍，因时间来不及，甚觉歉然，不过俄文本的两序已由贾维君译出，这也可为读者告慰的。

1926年12月1日于上海。

《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译者附记*

本篇原文为意大利文，载《思想与意志》(Pensiero e Volanta) 杂志中。我是从西班牙文和法文转译出的。西班牙文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阿根廷出版的《火炬报》(La Antorcha)第五年第一百七十四号；法文译文载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在巴黎出版的《自由人周报》(Le Libertaire)第三十一年第十九号。马拉铁司达是著名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的老将。这不是一篇论文，是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克氏的话时所加的脚注。

---

* 本篇原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署名芾甘。

《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运动略史》译后记*

本文为柏林的俄国亡命者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司太恩堡为本报①特著，原文为世界语。我们虽非他的同志，但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主张也相当的赞成。并且他能把左派社会党的运动源源本本地告诉我们，使我们对于这个在俄国农民中有过绝大势力，而且永远得着农民的支持之一大运动有了明确的观念，所以我们敢把此文当作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章介绍与读者。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平等》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芾甘。

① 指《平等》月刊。

《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译者附志*

本篇原稿为法文，但印成小册子的，只有德文本一种。我是根据世界语和日语两种译文重译出来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平等》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黑浪。

《斯特林堡底三本妇女问题剧》译者附言*

一九一七年高德曼因反对美国实行征兵制被捕，《母地》杂志出版所被政府查封，所有书籍悉被没收，本书因而绝版。现在在美国本书是无法买到的了，我得到了它，而且能够把它翻译出来，我很觉荣幸。

1928年1月2日于法国。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新女性》第三卷第四号，署名李芾甘。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①]译者序

克鲁泡特金底遗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人生哲学》之第一卷)底上编，现在以这样的形式和中国的读者相见了。这一册书整整费了我两个月的光阴。这两个月来我底全部的精力差不多完全耗费在这上面，每天一字一字地写，尤其在黄昏及深夜的时候，日间的功课已不来缠绕我了，我一个人可以安安静静做我底工作，往往写到十二点钟以后，学校附近的鸡声已叫了两三次了，我才从书本中惊醒起来，知道时间已迟了，于是放下笔，结束了这一天的生活。这两个月的时间就是这样的过去了，好像刻好了的木版似的，很少有什么变化。我底三哥在一封信里曾问及我底近来生活状况，我底回信中曾有这样的话："近来我在拚命地译《人生哲学》，我底全副力量都用在这上面了。……自然要这样地度过一个人底青春，也许是可怜的事，然而现在我也找不到更美丽的方法。"

虽然，这样的工作并未使我厌倦，反而它是我底唯一的安

①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克鲁泡特金著，芾甘译。一九二八年九月上海自由书店出版。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海平明书店重版时，改书名为《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译者署名改为巴金。

慰，唯一的快乐；它坚强了我底信仰，鼓舞了我底勇气。实在，克鲁泡特金本人与他在本书中所述的思想，便是鼓励之泉源。

有岛武郎从前在《访克鲁泡特金》一文里曾说过："谈话之时我质问他底《互助论》，他因为回答我底质问，带我到楼上的书斋。……他让我坐在长椅上，他坐在旁边，细细给我说明，我忘记了是在英国，也忘了是日本人，更不知道这书斋是在何处，恰如柔顺的小儿在老亲的膝下静听慈爱的训言。"

"恰如柔顺的小儿在老亲的膝下静听慈爱的训言。"我读《人生哲学》时倒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我每一念及这一个人，我每想到这一本书，我便感觉到我有了屹立不动的精神，我可以在这一个浊流滔滔的大海中做一个坚定的岩石。就是这种思想，它鼓励我放下了一切事务，像克鲁泡特金在俄国革命横被摧残之际拚命地著述《人生哲学》时那样的心情，在这中国人大开杀戒之时期中，来拚命地翻译《人生哲学》。

克鲁泡特金说，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不能创造出一种基础于自由与正义底原理上面的新社会制度，大概是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所致。中国革命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在我看来，也是因为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因此《人生哲学》之翻译在现今却也是一件必要的工作了。克鲁泡特金是拿这部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底正义之信仰深植于他们底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理的自己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

这种思想对于克氏并不算是新鲜的；它在一八九一年克氏底一本极优美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中已经出现过了。而且《人生哲学》在一个意义上说，还是克氏底名著《互助论》之续篇。上编的前四章完全是《互助论》中主要思想之重述，或者更恰当一点说，是《互助论》中主要思想之发展而已。如著者自己所说，《互助论》是偏于博物学一方面，而本书则偏于伦理哲学一方面。再把这两部书合看，克氏学说之精义就不难明瞭了。

不仅此也，这种思想，著述《人生哲学》的思想，巴枯宁已经有了。克鲁泡特金在寄与老友的一封信里，曾说过："巴枯宁在巴黎公社失败，避居洛加诺时，也感到创造新人生哲学的必要……。"我只找到一个证据：巴枯宁在临死前十天在瑞士柏尔勒和奈赫尔 (A. Reichel) 的谈话中曾说："现在各国人民都失掉了革命底'本能'，他们深以现状为满足，而且那个恐怕连现在已有的东西还会失掉之恐惧，使他们不敢多事，深染着惰性了。假若我底身体稍微好一点，我要来写一部《人生哲学》，这个《人生哲学》是基础在集产主义（即无强权共产主义——居乐美注）底原理上面，完全没有哲学的或宗教的语句。"（J. Guillaume: L'internationale 第四卷）

巴枯宁底《人生哲学》，和他底肉体一同死去了，自然我们不能够批评他底未写出的《人生哲学》底内容。然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巴枯宁底学说略为研究一下，我们也可大胆地断言，巴枯宁未写出的《人生哲学》不会和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不同。我且从巴枯宁底著作中引出一段话来证实这种说法：

"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他底同胞底价值，不与他们合作，不在他们之中去实现他自身底发展，那么他便不能够认识他自身底人的价值，也就不能够实现他底完全的发展了。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使他底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底自由就是我底自由——因为如果我的自由与我的权利不在与我同等的万人底自由与权利中，去找寻它们底证实与认可，则我不仅在思想中，而且在行为中，都不是真正自由的。"

由此我们也可断言：巴枯宁所欲写成的《人生哲学》底任务也是在鼓舞人去为真理与正义奋斗，这种奋斗不是个人的，而是与同胞联合在一起的协同行动。

这样的《人生哲学》在各时代中，特别在现在，都是必要的。克鲁泡特金以他毕生所积蓄的一切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以他底广博的学识，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筑了《人生哲学》底大厦，虽然生命的界限阻止了他，没有把这所大厦造完，然而栋梁及主要的部分却已建成了，因此这所《人生哲学》的大厦也得以确定地立在科学的宫殿之中。在这一点，身为克鲁泡特金底信从者及同志之我们也可引以自豪了。

最奇怪的是，有一些自称"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青年（大半都是我从前的友人）居然奉几本小册子为圣经（如阿利滋底《科学的无政府主义》之类），就把克鲁泡特金底半生研究之结果——《人生哲学》大著一笔抹杀了。因此在《民锋》上便出现了两篇奇怪的论文——《取消人生哲学》及《无政府共产主义与伦理》。在前一篇文章里，那位著者把克氏底《人生哲学》认为是玄学的。把"玄学的"一个形容词加在这样一部以

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人生哲学》上面，未免太厚诬科学，厚诬克氏了。著者既承认这是“有科学的方法的研究之结果”，又是“比较的可信”，如何又突然达到“我也认为是玄学”这一个结论呢？因为他先有了一个大前提：“在我个人的意见，总以为人生哲学是不能成立的。”实则他底大前提就已经错了。因为那位著者把人生哲学就没有弄的清楚，最滑稽的，他把人生哲学误认作与法律有同样性质的东西。于是“桑间濮上”之行为，“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之事实，那位著者也要请人生哲学去解答了，“明知故犯”本是法律下冤鬼的呼声，那位著者也要借用来作取消人生哲学的武器了。（还有许多可笑的话，在这里因为篇幅关系不能引出。）

对于这一位把人生哲学认作法律的人，克鲁泡特金底答复是：“最好不要把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混为一谈。……事实上有多数伦理的著作家否定任何立法之必要，而直接愬于人类的良心。……人生哲学要求决定，而且说明几个根本原理，没有了此等原理，则无论动物或人都不能够在社会中生活。……人生哲学说，只有树立起个人与其他万人间之某种和谐，才有接近这样完满的生活之可能。人生哲学更说道：‘去看自然本身罢！去研究人类底过去罢！它们会告诉你，实际上这是如此的。’”人生哲学丝毫不含有强迫的性质。德国哲学家包尔生说得好：“人生哲学并不来告诉他：‘你应这样做’；它不过来讯问他：‘你所实际地，明确地愿望的东西是什么？’”克鲁泡特金更说得好：“当个人依此种或彼种理由踌躇着，不知道在某种特别的情形中应采取的最好的道路时，人生哲学

便来帮助他，而且向他指明，他希望在同样的一个情形中，别人对于他应如何行为才好。然而就在这时候，真正人生哲学也不来指出一个严格的行为准则，因为这应该由个人自己来评定那些影响着他的种种动机之比较的价值。"克氏又明明白白地说："本来对于不能承受灾祸的人，是不必去劝他冒险的；对于充满了精力的青年，向他说老年人底谨慎也是没有用的。"(均见本书第二章)如此则"立定人生信条要人怎样的服从遵守"之话直等梦呓了。由这个梦呓，那位著者就得结论："有了人生哲学，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不能自由。"果然吗？

那位著者又否认了自达尔文到克鲁泡特金所说的社会本能"互助"，并且否认了克氏所说的道德之三要素：互助，正义，自己牺牲。他底理由是："因为我们一个在某种生活的情形之下，完全是漠不相关，而且还如仇敌，总是要将我的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上面。"这样的话出自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之口，不能不使人感到愤怒了。谁都知道一阶级把它底快乐建筑在其他一阶级底痛苦上面，这并不是生活的常态，这种情形是应该去掉，而且完完全全可以去掉，无政府的革命第一就要去掉这个。那位著者甚至承认个人斗争，以为一个人总是将他底快乐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面。而且拿这个"事实"来否认像互助，同情，爱，正义，自己牺牲……等等社会本能与社会感情，那么他显然承认这种情形，是必然的，正常的了。而一切人生哲学体系都是反对"将我的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上面"这种情形的。其实据一般人生哲学家说，美满的幸福生活是不能够由损人利己的道路达到的。而克鲁泡特金还说："它(人生哲

学）又告诉人说，如果他希望过一个美满的生活，在其中他能够完全发挥所有他底身体的，智的和情操的力量，则他必须永久抛弃‘此种生活可以由不顾他人之道路来达到’之概念。”

可见人生哲学并不来解决那位著者所提出的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为，什么“自由恋爱”，什么“私下淫奔”，什么“劳动为跑入工厂”等等问题了。“然而人生哲学底主要目的还不是在个别地去劝告人们。而且与其说是劝告，不如说它是放一个更高的目标，一个理想在全体的人类之前，此种目标，此种理想会引导他，而且使他本能地依着正当的方向而行为。……人生哲学底目的也是要在社会中创造出一种空气，使得人类中大多数都全然依着冲动地，即毫不踌躇地，去完成那些最能产生万人底福利及每个单独的个人底完全幸福之行动。”（本书第二章）

如此，则人生哲学不但不如那位著者所说，去束缚个人底自由，或“使一般勇猛有为的青年不能自由的活动去创造理想的社会”，反而人生哲学正是去鼓舞人们为真理与正义奋斗，创造理想社会的。实则没有崇高的理想，则理想社会之创造实是不可能的事。并且“近代人生哲学体系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乃是它不应该拘束一切的‘个人的创意性’，而且甚至为着像共同社会之福利或种之福利那样崇高的目的，来拘束‘个人的创意性’也是不应该的”。

这样，人生哲学便不是人们所畏惧的，而是人们所愿望的了。“事实上如果道德的生活会使人得着不幸，那么，世间一切道德便早已消灭了。”（本书第七章）而且“无论我们如何地行

为，或是第一寻求快乐与个人的满足也好，或是甘愿为着某种更好的东西而抛弃即时的欢乐也好，我们都是向着在一定的时间会使我们得着最大满足之方向而行为的”（英译本一二三页）。不过克氏更进一步说：“这样的概括是不够的。”亚里斯多德说，我们追求欢乐，名誉，尊敬等等，不只是为着它们自身的缘故，而且是主要地为着它们所给与我们底理性的满足之感觉的缘故（本书第七章）。于是克氏便说：“如果理性底职务在这个形式中被人承认了，那么，又生出了下面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理性中有什么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中会得着满足的呢？’”克氏底答复必然是：“‘正义之需要’，即公平之需要。”克氏又更进而自问道：“为什么一个更发达的精神却在那些最有利于万人底利益之解决中，找到了最大的满足呢？这个事实难道还有某种根深的生理学的原因么？”

克氏先举出了培根与达尔文二人底答案：在人类中与在一切群居动物中一样，社会性之本能是发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以致变成了一个比较那些类集在“自己保存之本能”这一个名称下面的其他本能更为强固，更为恒久的本能了（本书第三章及第七章）。

达尔文底结论：“社会本能是一切道德所从出的共同的泉源”，是不错的。他又给社会本能下了一个定义道，社会本能是一种特殊的本能，与其他的本能是不同的。自然淘汰为其自身之故，而使此种本能得以发达，因为此种本能对于种之安乐与种之保存都是有利的。他还说，此种本能“恐即亲子间感情之扩大”（《人类由来》）。克氏更附加道：“在许多下等动物

中……此种本能倒不如说是兄弟或姊妹的关系或友伴底感情之扩大。"达尔文说"丝毫没有此种本能的人，便是怪物"（本书第三章及《人类由来》）。

达尔文在日常生活中举出一个实例来：譬如有一个人顺从了自己保存之意识，不曾冒着危险去救一个同胞底性命；或者因迫于饥饿而偷窃食物。在这两种情形中，这个人是服从着一个十分自然的本能。然而为什么他过后又感着不安呢？为什么他现在又觉得他应该服从其他一种本能，不当这样做呢？达尔文回答道，因为在人类天性中，"更能永续的社会本能战胜了较不能持久的本能"（《人类由来》及本书第三章）。

在另一个方面，人底欲望（如饱满饥饿，发泄愤怒，逃避危险，或占有他人底东西等），就其本性讲，只是暂时的。此欲望之满足常较欲望本身为弱……因此假使一个人为着要想满足这样的欲望，曾违反了他底社会本能而行为，过后他对于此行为又加以反省（我们常这样做），他就会不得不"拿过去了的饥饿，满足了的复仇，牺牲了他人来逃避自己底危险等等印象来和那差不多永在的'同情之本能'及自己关于别人所视为可赞赏或可责备的事物之最初的知识等比较一番"。这时他便会觉得"好像他误从了一种眼前的本能或习惯，这在一切动物便会生出不满足，而于人甚至会生出不幸来"（本书第三章及《人类由来》）。

既证实了社会本能之存在，而且此种本能是更永续恒久的。培根与达尔文对前述问题之答案又继续下去道：而且在人类中，如在数万年以来，就营着社会的生活之一个合理的生

物中一样，理性助长了此等风俗、习惯及生活规则之发达与遵守，而导引到社会生活之一个更完全的发达，——其结果，各个别的个人底发达就生出来了（本书第七章）。

然而"从我们底个人的经验，我们知道如何在互相冲突的冲动间的斗争之中，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感情屡屡占着上风，而把带有一个社会的本性的感情克服了。这样的事不仅发生于个人中，而且也同样发生于全社会中"，因此，克鲁泡特金便说，"这个答案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了。"克氏便达到了下面一个结论："如果人类理性没有把一个矫正的社会的要因采纳入它底一切决定中之一个固有的倾向时，则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决定，一定会永远支配着带有一个社会的性质之判断。"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矫正的要因，果真是被应用了的。……一方面，它从我们底根深的'社会性之本能'中，以及从对于那些与我们同其运命的人之同情中发生出来；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来自我们底理性中所固有的正义之概念"（第七章）。在本书下编（即第八章以下）中所讨论的道德学说之发达史把这个结论完全证实了。

这样看来，克氏底结论怎么会是"玄学的"呢？"取消人生哲学者"底武器在以上的叙述之有力的打击之下，已片片地破碎了。最后我还要来下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位著者并不曾读过克氏底《人生哲学》这一部书。①

① 你看他在《无政府共产主义与伦理》一文中说："克氏晚年所作的《伦理学》完全是批评政府，宗教，康德，尼采，司提耐儿（我译作"斯丁纳"——节注）之谬误的伦理观念……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之原理的根据"；在《取消人生哲学》

第二个厚诬克氏底《人生哲学》的人是在日本，就是那位拿列宁底《国家与革命》来补足《人生哲学》，希望"这两个伟大

中也说"克氏在《无政府党道德》和他晚年所著的《伦理学》二书中所研究和讨论关于人生的道德问题，无论他如何的反对和说明宗教与政府道德之伪善，批评各哲学家道德学说之失当：从生物方面的观察，知道有互助；从社会方面的观察，知道有休戚相关，平等与正义；从人生行为的方面观察，知道有爱，同情，与自己牺牲，并以之来解释道德的起源，说明人生应当如何的顺着伦理而生存。"这是那位著者所见到的克氏《人生哲学》孤本底内容，然而现今通行于全世界的克氏《人生哲学》，即我现在把上半部献于中国读者的《人生哲学》底内容却完全不是这样。

其实读者若只就《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这个名称上想，也就只知道本书底内容决非如那位著者所说的那样了。克氏在本书（即《人生哲学》第一卷）中，并不曾批评什么道德之伪善，而且对于各学派之伦理观念也不是认为完全是谬误的。他先在社会本能（互助）中找到道德之起源，然后再从自然界中的道德原理，述到原始人之道德观念，又从古希腊思想家之道德学说述到居友之道德学说，以证实《人生哲学》之发展。而且在各时代各学派之道德学说中，发见了一个共同的趋向即正义平等，这以下面的一个形式表现出来："尔所不欲人之加诸尔者，亦勿加诸人"——这是一切道德学说之基本规则。然而克氏底道德学说不能以此为满足，他又找出了第三个道德底基本要素——大量或自己否认自己牺牲。

互助——正义——自己牺牲构成了道德底发展之三个连续的阶段，而那位著者却把这三个阶段平列，硬分成生物、社会、人生行为三方面，不知何所见而云然。

关于论述斯丁纳、尼采等底道德学说之一章，因为死的缘故，克氏并不曾写出来，而那位著者却硬说《人生哲学》这部书"完全是批评……尼采同斯丁纳之谬误的伦理观念……"等，我实在不能同意。（至于说"政府之伦理观念"、"政府道德"，不但克氏在本书不曾批评到，而且政府居然也有伦理观念，也有道德，这真是著者底创见了。）

根据上面的叙述，我们便可断言：若不是世间另有一种原版的克氏《人生哲学》，那么"取消人生哲学者"便不曾读过克氏底这本书。然而我们都知道克氏底《人生哲学》只有一种，因此"取消人生哲学者"便不曾读过克氏底《人生哲学》了。

的灵魂互相握手"的森户辰男君。

森户君在大正十四年发行的《我等杂志》第七卷一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克鲁泡特金之人生哲学》。他在本文第一节中曾说："……我会见无政府主义的博学的学者奈特罗(Max Nettlau)时，曾听到可注意的一段话。……我以下面的问题质问他：'依克鲁泡特金特别用英文写的著作看来，他乃是一个所谓"天生的平和主义者"，暴力的革命好像是与他不相调和的；请你根据你平日与克氏之个人的交际下一个判断。'奈特罗对于我底质问，大体以下面的话来回答：第一，克鲁泡特金用英文著的书，特别如《俄国文学》与《自叙传》，是为极其保守的美国一般教养阶级写的，为了不致使他们恐惧起见，便完全避开一切露骨的描写，因此，仅仅靠着这些书，到底难窥见克鲁泡特金底全人格，全思想。第二，奈特罗和克鲁泡特金在伦敦相会之际(大概是在现世纪之初年代)，克氏每周出外练习射击。某一天他抚着枪欢喜地向奈特罗说：'一旦俄国革命爆发，我得马上回去参加。'……"

我对于奈特罗底回答之第一点，甚觉奇怪，故在某一次寄他的信中，曾将此事质问过他，我并引证了许多事实，证明森户君所转述的他的话是错误的，——如果这真是他底意见。

奈特罗给我的回信证明森户君所转述的话，完全与奈氏底本意不合。如果森户君不是误听了奈氏底话意，那么，他便是有心颠倒是非了。

奈特罗底信对于了解克氏思想一层颇有帮助，故把它译载于下：

（上略）我看见你对于克氏感到深的兴趣，而且那样热心地想完全了解他，这使得我很欢喜。

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难道不该一生一世都做一个好人么？一个人能够接受或抛弃一种学说，然而道德性却是生了根的，不能随时抛弃的。因此我们在克氏底任何著作中所看见的道德性，必定是属于同样性质的。

然而克氏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过着各种不同性质之公众的，一般的生活，这必然地影响了他底悠长生涯的各时代中之见解。

当他还是一个哥萨克军官旅行西伯利亚时，他把他底全副精力与热诚完全用在考察上面，为的是谋俄国与西伯利亚之利益——恰与后来他把他底全副精力用在《反抗者》上面；用在“互助”与法国革命研究上面；或者用在观察合作、集约农业上面；或者更后用在他所理解的欧战之主张上面。……他每做一件事，便专心一意地，极其忠实地做去。然而这种环境之变迁便免不掉使得他在悠长生涯之各时代中生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评价，进化等等。

我在我底用德文写的《从蒲鲁东到克鲁泡特金之无政府主义》（1859—1880）（三一二页，一九二七年出版）中，曾将克氏底著作，从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八〇年的，详细地讨论过，在以后的一册中还要继续讨论下去。① 我在我写的

① 奈氏所著《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凡三大册，已出版二册，第三册还在著述中。——芾甘注

德文《邵可侣传》(在印刷中，约三百页)中，也曾将克氏底生涯之一部分详细讨论过——这使我看见他的生活之"节奏"——环境，人格，事实对于他底影响，而且这个又如何反映在他底著作之中。

我相信，以这样的方法，我便发见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二年之间的各种影响使得克氏在那些年代中看见革命的事实、一个民众的革命快要到来了，而且就近在目前了——这个见解便产生了克氏写出《一个革命者之言》当时的精神。

过后，监狱的生活便开始了，这是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五年；在那时期中，他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存在着的，但至今尚未刊行。在我未考察过这著作之前，我不能够断言：这些年代是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二年之收场，或是一八八六年起到九十年代或较后一点之英国时代之开幕。接着"俄国革命"及"法国革命研究"时期就开始了。一九〇五年以前，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及较后一些年代中，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左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时期，以及欧战时期(战前及战争当时)及其后的时代。

我确实觉得他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三年之间所抱的，在法国及拉丁诸国，一个新的革命，一个新的公社之一切希望都消失了，后来在英国看见了英国之巨大工业组织之奇观，以及关系着战争与海之霸权时在英国常讨论的粮食问题；又看见英国工人之真正广大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在那里分配合作社之普及，并且克氏又看见英

国的社会党与急进党的人物和环境，在其中(至少在当时)讨论，辩驳，宽容都是极平常的，决没有暴力，激情，狂信等等——上述的这一切免不掉使得他大大地注意到创造的努力及进步之一切形式(只是在自愿的，而非在强迫的路线上)，那么对于单纯的破坏与一个对于自发的改造之多少带点狂信的信仰，便不十分注意了。

因此这时代的克氏底著作，便有了一个不同的性质。他底英国底读者与听众希望被事实与论证所说服，并不愿为热情的话语激动了感情。而且在著作或讲演俄国政治犯底惨苦生活，俄国政府对于革命党人的迫害时，可以多用热情的语句来激励人，然而在讨论无政府主义搜集材料证明互助小工业等等时，他便不得不用教育的而非用感情的方法了。

当森户君和我会面的时候(我想是在一九二二年)，我还不曾作上述的，特别的研究，然而大部分的事实我是早知道了的。因此我告诉他的话决不能和我现在所告诉你的不同。

如果克鲁泡特金在他底一生底任何时期中，果真遇着一个革命的情形，他一定会是一个极其活动的，非常完全的革命党人。他不会在著作上那样努力了。然而这样的革命情形是不曾发生的，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俄国革命发生时，他远在伦敦；在一九一七年他又老了，而且被欧战问题扰乱了，他虽然回到俄国去想为革命尽一点力，可惜太迟了，因为他所极讨厌的马克思派革命党人

已得势了。

意大利同志波尔基最近在美国出版的意大利报纸上说过，他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在莫斯科会着克氏时，克氏告诉他，克氏去见了列宁，劝他不要摧残俄国合作社，但要利用这个分配的器具——然而没有用，列宁是不听人劝的，于是合作社便横被摧残了。

至于你说你读过的关于"射击之练习"的文章，一定是我在一九二四年替美国出版的一本书①写的那篇东西。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森户君了，我底话一定会是这样：

在一九〇五年十月，或十一月，或十二月（不会早，也不会迟，因为只有在这几个月内，我才在伦敦，到了一九〇六年十月我又到伦敦，那时，俄国的革命已完全告终了），克氏在英国博物院附近住了一两个星期，因为他在博物院中研究。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曾在射击场中练习过一两次来服枪之射击，因为他急欲知道在长久的荒废以后，看他还能不能打中鹄的，他居然打中了，他因此甚为满意，他说如果他回到俄国（已在一九〇五年大赦之后），革命起了，需要巷战时，他虽然老了，也有一点用处。……

读了奈特罗底信，则森户君不了解克氏思想之事实，便

① 即易细尔编印的《克鲁泡特金：思想家，革命党，人道主义者》。——芾甘注

是明如白日了。"两大灵魂握手"之梦且由他做去，然而真正克氏学说之信从者是不会为他底"厚诬"所欺骗的。那么这厚诬克氏学说的第二个人底武器又被我们打碎了。

中译本《人生哲学》之出版，既以打倒这两个小的障碍还原克氏底学说为开始，则他底发展便可以畅行无阻了。

对于那般愿意用他底力量来做一点有利于他底同胞们的事业，而又找不到适当的道路的人，我便把这部《人生哲学》介绍与他。实在这一部书会给他开辟一条新道路的。同时我还希望他记着邵可侣底一段话，把克氏本书中底主要思想之一表现得如此诗化者没有能胜过这一段话的了：

> 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我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我自己底国土里一样，在我底同胞，我底弟兄中间一样。我从不曾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只有那对于在一个大的祖国内所有居民的尊重与同情之感情，才可以支配了我。我们底地球如此迅速的旋转于空间之中，好似大无穷中之一颗砂粒，难道在这个圆球之上，我们还值得费时间来彼此相恨么？（见邵氏底《大地理》第十九卷之序言）

芾　甘 1928年4月12日，序于法国。

《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译者志[*]

据说近来在中国有所谓"革命文豪"从日本贩到了一句名言："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好一句漂亮的话！其实昆仑山之高，本用不着矮子来赞美，托尔斯泰的价值也用不着"革命文豪"来估定。日本的大学教授(?)在高楼大厦(?)中，吃过了精美的晚饭(?)后，利用他的余暇，偶尔随随便便地说道："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倒也无足怪，而中国的"革命文豪"居然把他当作金言似的连忙贩卖过来，就未免有点"出人意表之外了"。

这几天法国各报为托尔斯泰百年纪念大做文章大出特号，大吹大擂，倒也热闹。我近来恰读完了托氏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很受感动，现在读到脱洛斯基的文章，觉得有些地方"实获我心"，所以抽出一点时间翻译出来，一则作为我个人对于托氏百年纪念之一点表示，二则让那般"革命文豪"知道他们祖师之艺术的见解，看看托尔斯泰究竟是否"卑污的说人"！

脱洛斯基的原文作于二十年前，是当托氏八十寿辰时期为法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新时代》(Neue Zeit)一九〇八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九号。

九月十五日而作。最近巴比塞主办的法文世界报(Monde)托氏百年纪念号中曾译载此文，我就是根据法译文重译的。然而脱洛斯基现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1928年9月9日，在法国。

《易卜生底四大社会剧》译后*

本篇从高德曼底《近代戏剧底社会的意义》一书中译出。《娜拉》、《群鬼》、《社会公敌》三剧底人名译音悉照潘家洵君所译的《易卜生集》。惟从原剧中所引来的语句，我仍据英文本另译，并没有采用潘君底译文。我底译文并不是按字直译的，我把原文稍微改动了一点，增加了几节进去，但对于原意并无妨害，因为我与本文作者高德曼共鸣。我对于易卜生的意见是和她底完全一样的。而且严格地说，在许多地方（不仅对于近代戏剧的意见而已）高德曼还是“吾师”呢！

---

* 本篇原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般》第四卷第三号，署名李芾甘。

《茶房也是一个人》译者附识*

高尔恰克这个名字在中国人的耳里听来，眼里看来，自然是很陌生的，高尔基很时髦了，高尔础老夫子的大名也是一般人所熟知的，惟独这位高尔恰克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不过幸而他也是高家的子孙，沾了他的哥哥弟弟的光，所以今天才有我这个无名小卒来给他吹牛。

高尔恰克(J.Korczak)是一个医生，他的本姓叫什么高尔斯密特(Goldszmit)，用蟹行文字写来虽然不同，但译成中文总是"高尔"一系的，所以他的真姓是什么，假姓又是什么，对于我们并没有大关系。这位高先生是在一八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出世的。他的父亲是他的故乡华沙(波兰京城)中的一个有名律师，他平素对于儿女的教育是非常留心的，所以高尔恰克先生从小就受着良好的教育，由中学、而大学医科以至于毕业。他挂了医生的招牌，不到几个月功夫就得着许多主顾，一般人都知道他是给儿童医病的能手，因为他非常懂得儿童的心理。

不久他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后来他居然抛弃了医生这职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开明》第一卷第八号，署名一切。

业去做儿童教师，他决定专门教养那般贫穷的无家孤儿。他后来居然设立了一所很大的“孤儿的家庭”，他自己和儿童们同住在这“孤儿的家庭”里，一心一意地教养他们。已经有千百人学得了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从这“孤儿的家庭”出来，到社会中服务，谋个人的独立生活了。他们一提起高尔恰克先生便表示莫大的感激。

高尔恰克不仅是儿童教育家，还是儿童文学家，他的作品大半是描写儿童，而且写给儿童看的。其中如《客厅的儿童》是责备那些雇有保姆，而自己不与儿女发生密切关系的父母们。这样的父母，在中国是不少的，所以父母与儿女间的感情很冷淡，儿童在自己家里，反如在生人家中一样了。还有《怎样爱儿童》、《儿童在家里与在学校中》、《孤儿的家庭中的儿童》都是很有名的著作。在这一切著作中都有一个相同的思想贯串着，人们应该如何了解儿童的教育和儿童的内心生活。

他的童话《皇帝马基第一》是一篇很好的童话，写一个小孩子做皇帝时的情形和心理，非常动人。虽然著者在这篇童话的开端便说：“成人最好不要读我的故事，因为这里面有几节对于他们不大方便，他们是不会懂得，而且反会因此非笑的。”然而我却喜欢这篇童话，并且深受它的感动。后来他又写了一篇《马基在无人岛上》，是前篇的续稿，也是很好的。还有《小遮的破产》和《当我再做儿童的时候》两篇，也是很受人欢迎的佳作。对于后一篇，有人在华沙的《晨报》上批评道：

“高尔恰克乃是自然的现象：他好像有两个心灵 ——

个是成人的；另一个是儿童的。高尔恰克主张儿童的权利，犹之乎法国大革命主张人权一样。这部书好像是一篇非常有趣的童话；其实还是哲学的、法律的、心理的和道德的研究。

“有了这一个儿童心灵之考究者和认识者，所有最丰富的欧洲文学也更可自豪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尔恰克的作品的价值于此可见了。

他还写了一些滑稽故事，有时带着强烈的讽刺，有时带着一种特别的趣味，来描写生活之各方面，也很成功的。

1928,12,25 于一切屋。

《母亲之死》译后记*

这一篇短文据屠格涅夫说“是用血和泪写的”，克鲁泡特金也非常赞美。所记全是实事，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是俄国的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我在拙著《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第五章“虚无主义之先驱——西欧派”内曾评论到他底生平和思想，我在这一章的结论说：“赫尔岑底一生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完成了新的一章。他从西欧把自由之精神吹入俄罗斯之平原。在几十年中他不断地眷爱地在尸体一般的俄罗斯身体底伤痕上涂满了香膏，一直到他看见它苏生了，而且产生了新生活。从他所下种子中，一代新的改革的青年起来，他们以他们底奋斗之热诚与牺牲之精神惊动了全世界，而且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光荣的遗印，这一代的青年曾得着了一个光荣的尊号：虚无主义者。”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P K。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编)[*] 译者序

在译完上编以后，有一天在《小巴黎人》日报上读到一段消息，当时虽然曾把那一段消息剪了下来，但如今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事实是这样：在法国南部一个滨海的城里，一天早晨，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一条狗到海边玩，不知什么缘故狗落在水里了，总泅不上岸来，男子便跳下水去救它，不幸男子也不太会泅水，看看要沉下去了。旁边一位英国女郎看见这情形，虽然她并不知道游泳，也竟然奋不顾身地跳下水去，救那不相识的异国男子。结果，两个人一条狗都淹死了。别人只救起他们底尸体来。

这一段消息很使我感动，回到自己底房里翻开《人生哲学》一面自语道，"如果克鲁泡特金读到这段消息的话，他恐怕会流泪啊！"然而克鲁泡特金底道德学说于此又得着一个有力的证明了。

近来译完下编时又忆起那一段消息来了，那样的事，是常有的。大衫荣不是也曾举出过"两诗人之死"吗？然而上面所

---

*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编：克鲁泡特金著，署芾甘译。一九二九年七月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述的那一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底心上了。我每一次读到克氏底《人生哲学》总要联想到那件事，一想到那件事，我对于克氏底道德学说就更有了强固的信仰，因为从生活方面来的证明，是比任何议论更来得有力，而且那样的事实，任那基础在宗教的启示上面的道德学说也好，或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也好，都不能解释它；能够给它以适当正确的解释的，只有克氏底道德的三位一体说。这是读完本书的人所明白的。

现在《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算是全部地呈献在读者底眼前了。然而读者在读本书时应该知道这部《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只是克鲁泡特金底《人生哲学》底第一卷而已。最重要的，还是第二卷。第二卷是解说克氏自己底体系的，据说现正由克氏的好友哥尔德斯密斯女士在整理。哥尔德斯密斯（本为俄人）现任巴黎大学教授，为法国生物学界之泰斗，又是克氏底同志，她做这种工作是再适宜不过的。第二卷出版时，我想它底标题应该是：《人生哲学：其基础及其目的》。

我将《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分为上下两编，虽然有人不赞成，我自己也觉得是非常有理的。第一，下编各章在克氏原本上只有一个总题目：《近代道德学说之发展》，另外各章再注上一个小题目如十七世纪或十八世纪之类。这可见下编各章间的关系是较它们与上编各章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那么分成两卷出版，并不致破坏全书之统一性。第二，下编各章底内容在中国一般的读者是不易了解的（加以我底译文晦涩，读起来更难懂了），而且其中的许多哲学家底名字（还

不说他们底著作)在一般的中国读者，就是很陌生的；至于了解那些著名难懂的哲学如康德、赫格尔底学说之类的人，在中国恐怕更是很少很少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希望读者们把上下两编一口气读完是做不到的事。所以对于那般与费先生(哲学)没有交情的读者，我只希望他们读了上编就够了，因为从比较易懂的上编前四章中就可以窥见了克氏自己底主张。

年幼学浅的我本不配翻译这部浩大淹博的名著，而且因为克氏所引用各哲学家底著作差不多全无中文译本，中文译者底工作是较其他国文字的译者底工作更费力更困难了。然而一则侥幸我略略懂几国文字，有五六种本子做参考，二则我为了译这本书时曾费了一些功夫去读参考书，所以到底勉强把这部大著译完了。错误的地方自然不敢说没有，希望读者给以指教。

我所最抱歉的，就是在上编出版后数月，才动手译下编，因为读者催促得太厉害，所以只得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快的办法，译完一章，便交与印局去排印，全部译成时书也就快出版了。这种办法如果我的先生中天知道，他一定不要我做的，他不是曾劝过我"以翻译作研究"吗？其实我本有心先将克氏"所引用的诸大家的原著"全读一遍，然而这在中国内，是无法做到的，我只读了一部分已经很费力了。

上编出版后，我曾得到三个人对于我底译文底批评。两个朋友说我底译文是"太直译了"；另一个人就是中天，他说"总算清楚可诵了，但究竟还不免有晦涩之处"。中天是我底教

爱的先生，他底话是鼓励我的，不见得就可靠，况且他还说有晦涩之处呢，可见我底译文的确是“太直译”了，然而在愚拙的我自己，除了依旧这样子地直译下去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像学识比我高过若干倍的日本内山贤次君来译此书时，还用了比我底更厉害十倍的直译法；西班牙文本译者有名的 Nicolai Tasin 君为了要使得他底译文不“太直译”起见，也不得不删去许多形容词和子句。那么愚拙的我为了一点不删节起见，就只有“太直译”下去了。不过对于因为“太直译”的缘故而不愿读本书（或读不懂本书）的人，我要另为他们写一卷《克氏人生哲学的大意》，章节与原书一样，不过是用我自己底话来述克氏底见解罢了。这一卷将载入我底《克鲁泡特金研究》第二集中（此书现正在起稿，将来亦由自由书店出版）。

下编底印刷上，有一点也是应该说明的，就是下编中的注解全用五号字排。这是排字工人底意思。虽然看起来不及用六号字排美观，但我一看见排字工人底那一对眼睛和那一副面孔，我觉得我们写书是在吃掉别人底生命。固然克氏底著作是有益于人类的，然而不美观一点，对于它底价值并无妨害，但排字工人却少却许多麻烦了。同样，读者若遇到书中有印错的地方，也请不要发怒，假若读者们能够亲身到印刷局去看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校对人工作的情形，读者恐怕非唯不怪他们，反而要感激他们罢。

在“附录”中我已将上编第二十九页中排落的一行补入了。至于其他的印错的地方（如四三页“与当时流行的及基督教学说”中“及”字为“反”字之误等）当在“刊误表”中更正，“刊

误表”与“索引”将来另印小册发售，不附在本书内。

再，上编是根据五种本子(即英、法、日、西班牙、世界语五种)翻译的，下编也是根据五种本子(即英、法、德、日、西班牙五种)翻译的。世界语译本，只有上编。德文本亦有错落处，如二五一页末及二五二页开始之间，就落去了两大段。

芾　甘 1929年5月，于上海。

《我底自传》[1]译本代序

我的小弟弟：

自从几个月前得到你的信叫我译著点书给你读以来，我就无日不在思索想找出一本适当的书献给你。经过了长期的选择之后我终于选定了现在的一本书。你要读它，你要熟读它，你要把它当作你的终身的伴侣。

我为什么选择这一本书呢？你把这本书读过以后就可以明白。在你这样的年纪，理论的书是很不适宜的，而且我以为你的思想你的主张应该由你自己去发展，我决不想向你宣传什么主义。不过在你还没有走入社会的圈子接触实际生活以前，指示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给你看，教给你一个怎样为人怎样处世的态度；这倒是很必要的事。——这是你在学校里修身课本上找不到的，也是妈妈哥哥所不能告诉你的。

固然名人的自传很多，但是其中不是“忏悔录”，就是“成功史”；不是感伤的，就是夸大的。归根结底总不外乎描写自己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人。

然而这本自传却不与它们同其典型。在这本书里著者把

① 《我底自传》，初版时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上下集）。克鲁泡特金著。一九三〇年四月上海启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九年五月改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他的四十几年的生活简单地、毫无夸张地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找不出一句感伤的话，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话。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朋友。

巴尔扎克在童年时代常常对他的妹妹说："你的哥哥将来要成一个伟大人物"，这样的野心并非那位法国大小说家所独有，大部分的人都有。然而克鲁泡特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野心，他一生只想做一个平常的人，去帮助别人，去牺牲自己。

从穿着波斯王子的服装站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身边之童年时代起，他做过近侍，做过军官。做过科学家，做过虚无主义者，做过囚人，做过新闻记者，做过著作家，做过安那其主义者。他度过贵族的生活，也度过工人的生活；他做过皇帝的近侍，也做过贫苦的记者。他舍弃了他的巨大的家产，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甘愿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做俄国侦探的暗杀计划之目的物。在西欧亡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俄罗斯的黑土，尽力于改造事业，到了最后以将近八十岁的高龄在乡间一所小屋里一字一字地写他的最后的杰作《伦理学》。这样地经历过了八十年的多变的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春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使得朋友与敌人无不感动，无不哀悼。这样的人确实如一个青年所批评"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所以有岛武郎比之于"慈爱的父亲"，所以王尔德称之为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这个唯美派的诗人曾说："我一生所见到的两个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是凡崙

和克鲁泡特金……后者似乎是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的精神的人。"

弟弟，我现在把这样的一个人介绍给你了，把他的生涯毫无夸张地展现在你的眼前了。你也许会像许多人那样反对他的主张，你也许会像另外许多的人那样信奉他的主张，然而你一定会像全世界的人一样要赞美他的人格，将承认他是一个纯洁、伟大的人，你将爱他、敬他。那么你就拿他做一个例子，做一个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你能够照他那样地为人，那样地处世。你一生就决不会有一刻的良心的痛悔，决不会有对人对己不忠之事。你将寻到快乐，你将热烈地爱人，也将为人所爱，那时候你就知道这本书是青年们的福音了。你会如何地宝爱它，你会把它介绍给你的朋友们，你会读它，你会熟读它，你会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

自然这里面有些地方是小小的你所不能够理解的，(但你将来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些地方的价值。)然而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你读着这一本充满了牧歌与悲剧，斗争与活动的书，你一定会感动，一定会像我译它时那样，流下感激之眼泪，觉得做人要像他这样才好。那时候你会了解你的哥哥，你也会了解你的哥哥的思想，你会爱他，你也会爱他的思想。你更会爱他所爱的人。那么我的许多不眠的夜里的劳苦的工作也就得着酬劳了。

1930年1月。

《我底自传》译后记*

我不曾翻译过什么大书，而且也不敢与一般翻译家为伍，但我始终以为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所谓翻译并不是单把一个一个的西文字改写为华文而已，翻译里面也必须含着创作底成分，所以一种著作底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

我曾经翻译过几篇剧本。我翻译它们的时候常常感到创作的情味，所以屡屡在不损害原著底本意这个范围之内增改了原著，加入自己以为可以加入的字句。但翻译本书时却并没有增加什么，不过有一些地方除了直录原文之外便别无办法，如西文暗号信，字母拼法错误之类，那么我就只得意译了。好在这类的地方并不多。

我底翻译是根据英文、法文、日文三种本子。日文本错误甚多，不足为信。英文本是著者底原著；法文本是译文，但经著者加以修改和补充。这两种本子中有时也有文句不同（甚至相反）的地方，究竟哪一种是更可信的呢？其实谁也不能断定。法文本虽经著者修改，但是译错的地方著者有时未必看

* 本篇曾用作《克鲁泡特金全集》第一卷后记。

出来(这样的经验我是有过的)；同样写英文原著的时候著者也许有些地方记忆不清楚，后来要加以删改，这也是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既然不能说哪一种本子比较可信，那么遇着这种地方我就应该行使我底选取之权了。举一个例：布兰德斯底序言中有一句话原文是："What others have thought of him he mentions only once with a single word."法文本中就译成了"Il ne dit pas unmot de ce que les autres ont pensé de lui."如果有一位翻译名家根据法文本校读我底译文，岂不是会说我连简单的法文句子也不懂得吗？

本书系随译随印，校对时又常常因了想使版面整齐的缘故，不得不增减几个字。原书只有六章，现在我把第四章(原题为《圣彼得堡——西欧初旅》)分为三章，各加上一个标题，这理由是很简单的，用不着再来解说了。插图，英文本中只有三幅，法文本完全没有。本书中的十五幅插图是我在外国搜集起来的。

最后一章不是出于我底手笔，译者是友人吴养浩君。他曾在劳动大学教授过法文，他底法文程度高出于我底不知若干倍。他在巴黎时曾有心将此书全部译出，但只译了第八章，他就变成了合作主义者，对于丹麦、爱尔兰等处的合作运动(他谓之为"和平革命")感到特别的兴趣。他读了英、法文书籍数百种，近在乡间著述几本关于合作主义及合作运动的有系统的书。我虽不是合作主义底信徒，但我也希望他底著作早日完成，来救济这饥荒的中国学术界。他不但让我把他底译稿附印在这里，而且还允许我把它大大地修改了一番，这

是值得我特别感谢的。至于注解，除了原著者底外，全是我加上去的。后面的跋是二十几年前的英文本新版底序言，但此版出后不久即绝版，现在通行的版本中是没有这篇序言的，我以为在未读本书之时不宜先读这篇序言，所以把它移在卷末，改题作跋。

几个月来的翻译与校对的工作就此完结，心里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安慰。以后打算休息一些时候，以便开始写我底第三部创作《死土》①。别了，亲爱的读者，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

---

① 《死土》，可能指《死去的太阳》。（一九九一年注）

《骷髅的跳舞》[1]译者序

虽然我还不配算在那般"天天在巴黎圣密雪尔大街上散步的面部毫无表情的中国人"(借用法国某女记者的话)之列，但赛纳河畔一带的旧书摊却是我常到的地方。一个星期中我至少要去两次，每次回来，两只手总是满满的。

然而有一次我冒着春天的微雨，沿着赛纳河岸，望着圣母院两个高耸的钟楼，踏着回家的路，手里却只有一本薄薄的世界语的小书《骷髅的跳舞》，是花了两个半法郎买来的。

几天又过去了。有一天大清早我拿了这本小书到卢森堡公园去。早晨，公园里游人不多。我坐在大树下一把长椅上，在安静而闲适的气氛中，读这本小书。阳光射在碧绿的草地上；中间圆圆的地方种着各样颜色的花；喷水机不住地喷出丝丝的雨点，在阳光中闪耀着如颗颗的明珠。这时候我读完了《骷髅的跳舞》。在这样和平的空气中，我的紧张的心情突然宽松了。"骷髅"在我的眼前不见了。我只记得首陀罗[2]的

---

① 《骷髅的跳舞》：秋田雨雀著，署一切译。世界语译本内共收《骷髅的跳舞》、《国境之夜》、《首陀罗的喷泉》三个独幕剧，一九三〇年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② 首陀罗：印度社会中四个种姓之一，他们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

喷泉和草原。我似乎已经看见这一切了。我知道那样的日子快要到来。为着全人类的喷泉和草原，是到底会有的，而且不久我们就会看见的。

作者秋田雨雀在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序中说过，"你叫喊说，'不要失望罢，因为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东西。'是的，的确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这时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不错，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

我在卢森堡的春天里读完了这本小书，心里确实充满了希望。现在我把它译了出来，又恰逢着上海的春天。

1930年3月。

《夜未央》[①]小引

大约在十年前罢，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读到了一本小书。那时候他刚刚有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有一个孩子的幻梦，以为万人享乐的新社会就会与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刻消灭。他怀着这样的心情来读那一本小书，他的感动真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那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在那本书里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他把那本书当作宝贝似地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他们甚至把它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因为那是剧本，他们还排演了几次。

这个孩子便是我，那本书便是中译本《夜未央》。

十年又匆匆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十年前的事还和在昨天发生的差不多。这十年中我的思想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我的小孩的幻梦却消失了。这一本小小的书还保留着我的一段美妙的梦景，不，它还保留着

---

① 《夜未央》：廖·抗夫著。初版时书名作《前夜》。一九三〇年四月上海启智书局出版。

与我同时代的青年的梦景。我将永远珍爱它。所以我很高兴地把它介绍给我同时代的姊妹兄弟们。

1930年2月。

《草原故事》[1]小引

近年来一种渴望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生活在这个"狭的笼"中，我渴望着广阔的草原，高大的树林，以及比生命还要宝贵的自由。然而现实的黑暗给我摧毁了这一切。我只有在这生活的废墟上悲哭。可是这其间也曾有过好梦来安慰我。

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席尼特金[2]说过："世界上最伟大、最耐久的东西就是做梦的人的手工成绩。不能做梦的行动的人便是破坏世界者，他们是兴敦堡[3]一类的人物；这些野蛮的力量要留点痕迹在时间之沙上面，除非先让时间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仙话，才能从专制和受苦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

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仙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做梦的人都会

---

① 《草原故事》，高尔基著。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海马来亚书店出版。

② 席尼特金：(H.T.Schnitkind)，本书两位英译者之一，另一人为郭尔特堡(I.Goldberg)。英译本共收《玛卡尔·周达》、《因了单调的缘故》、《不能死的人》(即《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第一节)等二篇。

③ 兴敦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将军，在希特勒执政前做过德国总统。

了解。我希望我的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

1931年2月在上海。

《草原故事》再版[①]题记

这本小书之译成曾给了我一些欢喜。我在译述中感到了创作的情味，所以很爱这译文。今年春天马来亚书店编辑以友谊的关系索去了原稿付印，出版后我只得了三十本书的报酬，并未支取过一文稿费，而初版一千册又被该店全数寄往南洋销售，在国内很难看见一本。现在该店停业，我便乘旅行无锡之便把原稿校阅了一次，售给新时代书局。这样的一本小书居然有再版的机会，在我当然是一件很可欣喜的事。

巴　金　1931年9月，在无锡。

① 这所谓"再版"，其实是新时代书局的初版（马来亚书店的初版才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的版本）。新时代书局"一九三一年十月改订再版"用的是马来亚书店的纸型。新时代书局的老板是马来亚书店的股东，即曾今可。（一九八九年注）

《丹东之死》[①]译序

我现在把新俄A.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剧本介绍给读者。倘使读了我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见附录[②]）再读托尔斯泰的剧本，那么对于法国大革命便可以有一个明白的概念。这剧本有一个长处，是作者对于他的人物有深的了解，他所写的人物都颇能代表本人的性格。作者并没有某一些历史家（如马德楞）所有的偏见。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中间大部分都是极勇敢，极高尚，极诚恳的人，他们之所以犯错误，都是出于诚意，就是说他们相信这种错误的行为是正常的，可以拯救祖国，所以大家都甘愿为自己的主张和行为登断头台而不悔．就在临死的一瞬间他们还相信“共和国万岁！”。W.布洛斯说得好：“在这革命的可怕的斗争中表现着勇气，热忱，牺牲，崇高精神，无我之心，视死如归和人类爱等等美德，我们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我们的赞美之感情。然而此等美德是一切从事斗争的党派所共有的。”托尔斯泰也知道这一层，因此他能够把当时的斗争表现得适如其分。他捉住

---

① 《丹东之死》：阿·托尔斯泰著，署一切译。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② 现收入《全集》第十卷。

了那时代的精神，同时还利用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他的剧本确实是一本成功的作品，可以与罗曼·罗兰的三幕剧《丹东》并列，同为民众剧中的不朽杰作。①

巴　金 1931年2月。

① 自然，历史剧不必完全与正史符合。

《秋天里的春天》[1]译者序

如果叫我用这题材写一部小说，我一定不会像巴基那样写。然而我读着巴基的小说的时候，我的眼睛竟几次被泪水润湿了。这是感动的眼泪，这正如那个老卖艺人巴达查尔师傅所说，是灌溉心灵的春天的微雨。

巴达查尔师傅这样的人恐怕是有的，生为优伶之子而且日与卖艺人为伍的巴基有很多机会见着这种人。然而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巴达查尔师傅的神秘的定命论，这在巴基的小说里没有别的作用，只是一个装饰，用来掩饰，或者取消这作品的反抗色彩，使它不带一点反抗性，而成了一个温和地悒郁的故事。在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巴基，他只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但是他却写得很美丽，很能够感动人。就是在这个温和地悒郁的故事里，我也感到了一种反抗的心情。我读着："不管我怎样为着它奋斗，到后来总是别一个人（穿得很阔气的小姑娘）把我那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拿走；生活另外扔一个肿脸的坏玩偶来满足我。"我的身体在燃烧了。小太阳，你上了你爷爷（巴达查尔师傅）的当了。那不是生活，那

---

① 《秋天里的春天》，尤利·巴基著。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得两个拾得的孩子的遇合成为一件值得哭的事情，那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不是生活。

在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学生亚当说："像这个秋天里的春天这么美丽的春天永不会来了。"这是个大错误。反而是教员巴南约席说了更正确的话："春天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许多、许多更美丽的春天……我这样相信着。

四年前一个春天里在巴黎的旅舍中我给一个人写了一封信，如今在那个人用自己的手把生命割断了以后，这封信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在冬天，我读着下面的话：

> 是在春天。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我每次经过了充满杀气的冬季而来到明媚的春天，我的心里又有了希望，对于未来的信仰更加坚定，我觉得经过一次与恶魔搏斗后，我又复活了。我有创造力，我有生命力！春天给了我一切。
>
> 卢森堡的枯树发了新芽，塞纳河的潮水重新泛滥，蛰伏的昆虫又起来活动。死的，睡的，静的，一切都新生了，醒来了，活动了。我的生活曾是如此绝望和苦痛，然而春天又把希望和勇气给了我，使我仍然抱着坚定的决心继续与环境搏斗，使我不屈服于敌人之前。……
>
> 春风哟，我感谢你，你煽起了我的生命之烈焰，你吹

散了我的苦痛之回忆；春天，我感谢你，在你的怀抱中我觉得生命是无处不在。……

读了这样的话，我在冬天里又看见春天了。我并没有欺骗自己，甚至就在这时候，就在寒风割着我的两耳，手冻僵得几乎不能执笔的时候，我还相信着四年前在一个温暖明媚的春天里写下来的这些话。那一个美丽的春天并没有灭亡，它至今还在我的心里，因为正如《桃色的云》里面的土拨鼠所说，“春天是不会灭亡的。”

是的，春天是不会灭亡的。在第二年的春天里，巴达查尔师傅会把小太阳给学生带回来，于是两个拾得的孩子又会遇在一块儿了。

我们用不着像学生那样地呼唤：

春的爱哟，不要飞去，快留停。
啊，留停罢……长留在我的心。

因为春的爱是不会飞走的。

最后再说几句介绍巴基的话。

匈牙利诗人兼小说家尤利·巴基(Julio Baghy)① 是世界语文坛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语写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八部创作集。他的长篇小说《牺牲者》(Viktimoj)曾经被

① 尤利·巴基现在还是匈牙利世界语运动中一个重要人物。(一九五九年注)

译成了十三国文字，在各国销行颇广。他是一个优伶之子，自己也是一个优伶，曾经演过莎士比亚的名剧中的主角如哈姆雷特之类。他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作了俄军的俘虏，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荒原。在那里他在孤苦呻吟之际，将他的苦痛的情怀写入诗歌，成了悒郁、悲怆的调子。他的《牺牲者》就是他的西伯利亚生活之记录。以冰天雪地为背景的悲痛的故事，主人公的超人的性格和牺牲的精神，以及诗人的敏感的热情与有力的描写，无疑地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引起许多人的同情，而得到世界语文坛冠冕之作的称誉。他的作品有一种旧俄的悒郁风，但里面却依然闪耀着希望。他颇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诉于人们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无论表面生活如何惨苦，社会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块湿漉漉的抹布，从里面依然放射出光芒来；换言之，就是在悲惨龌龊的外观下面还藏着一个纯洁的灵魂。自然这情形是那般少爷小姐们所不能了解的。所以从前在俄国，当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维奇描写农奴生活的小说发表的时候，许多高等贵族甚至惊讶地问道："他们那种人居然会有感情，居然知道爱吗？"那么他们就不要读巴基的小说罢。

《秋天里的春天》(Pvintempo en la aŭtuno)是巴基的近作之一。他的小说被译成中文的有钟宪民译的《牺牲者》(长篇)和《只是一个人》(中篇)，索非译的《遗产》(短篇)。

我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有时候也把那些译出来便成了累赘的形容词删去一两个；我不喜欢按字死译，所以把animo一字有时译作"心灵"，有时译作"灵魂"；sopirfloro 一字就只译

作"鲜花"。诸如此类的例子很有几个，不便一一指出，因此特别在这里声明一句。

1931年的最后一日。

《过客之花》[1]译者序

这篇剧本是三年前翻译的，当初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时候，我曾在译文的前面写了下面的引言：

本剧的著者亚米契斯 (E. Amicis) 就是写了《爱的教育》的意大利著作家。本剧是他晚年的著作，于一九〇六年(即他临死前二年)写成，这年四月罗马上演时，曾得着很大的成功。同年八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中，曾将本剧用世界语演过。我是根据这年在巴塞尔(Basel)出版的世界语译本重译出来的。原题为“La Floro de la Pasinto”。

世界语译者 Rosa Junck 女士在她的译本前面印了一句献辞是：

“献给亚米契斯，靠了他的高贵的感情，不幸的人得以恢复勇气；靠了他的教训，残酷得以变为善行。”

重译者也是怀了这同样的心情来译这书的，我愿将我的译文献给我的世界语同志们。

---

① 《过客之花》，亚米契斯著。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这些话就在现今我也觉得并没有说错。不过我这时候的心情却多少有点不同了。我要把这意思发挥出来，也许可以写成一本书，在这序文里是完全不适用的。在亚米契斯与我的思想之间显然有一道鸿沟，但这并不能阻止我读《爱的教育》而不受感动，同样也不能阻止我译出这个剧本。不过照我的意思，在安娜与阿尔背脱中间没有什么“永别”的理由，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阿尔背脱就不应该和安娜再见，为什么就应该让安娜在宗教的信仰中度她的最后的日子。

然而不管怎样，这究竟是一个可以一读的剧本。我之所以爱它，是因为它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贫穷与不幸的图画，而这图画又是用另一种笔调绘出来的。这在聪明的读者当然可以领会到，用不着我在这里详细地解说了。

单行本付印的时候我曾将译文大略校阅了一下，改易了几个字。一两处从前疑心原书印错(我根据的这版本常有错字)而依自己的意思改译的，现在觉得还没有更适当的译法，便一仍其旧。

1933年1月。

以上是六年前写的短序①，最近翻看这本小书，觉得还可以重印，便费了一天的功夫把它修改一遍，改的地方不少，可以说是重译，不过原文不在手边，无法逐字校阅，或许仍有错误的地方也未可知。

1939年9月。

① 短序，指为一九三三年初版本写的序言。

《克鲁泡特金全集》[1]总序

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我们这个世界里失掉了克鲁泡特金，许多人哀悼过他底死，以为这是一个大的损失。

克鲁泡特金被称为安那其主义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人类的最忠实的朋友，最有热情的叛逆儿，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前进的科学家。在他一身，人，战士，学者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完全的整体。他底八十年的生涯就像一块纯洁的白玉，没有一点儿污点。所以甚至他底敌人也不得不对他表示尊敬。

克鲁泡特金生在俄国最高的皇族中，见惯了种种不平等和野蛮的事情，后来就自动地舍弃了他底财产和爵位，这些东西在别的许多人是努力追求而得不到的。他放弃了特权，而投身在民众中间，这并不是出于单纯人道主义的动机，也完全与托尔斯太底神秘的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牺牲精神不同。他受了法国大革命所撒布的新思想底影响，在西欧旅行中又目睹甚至接触了巴枯宁指导下的第一国际的运动，便毅然地参加了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开始对沙皇的专制政治下严厉的

---

① 《克鲁泡特金全集》：这里指《插图本克鲁泡特金全集》，署巴金译。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新民书店出版。本篇署名黑浪。

攻击。

于是牢狱生活开始了，两年以后他逃出了俄国监狱，在一八七二年夏再赴西欧，不久就加入了当时在西欧逐渐生长的安那其主义运动。一八七九年在犹拉联盟大会中他宣读了一篇题作《从实践的现实之观点所见的安那其主义思想》的论文，这是安那其共产主义之第一次的理论底告白，自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天才的，博识的，深刻的理论底创设者了，终身不曾间断过。

这年二月，他和少数友人发刊了《反抗者周报》，阐明他底安那其主义的思想。但一八八二年尾，他因了里昂炸弹底牵连，在法国被捕了。虽无丝毫罪名，他终于被判了五年的徒刑，在克雷服监狱中度他底光阴，然而在外面他底最忠实的友人爱理则·邵可侣却把他的论文集编印出版了。这就是那本著名的书，《一个反抗者的话》，是一本燃烧着革命的热情的书。

一八八六年他因各方面的援救被赦出狱了，却不得不到英国去度他底亡命生活。在那里他无时无刻不和全欧洲的安那其运动以及社会思想潮流接触，这样继续不断地写成了许多渊博的书籍和精美的小册。发表了无数深透的演说。他归纳地表示出来，人类社会向着安那其演进的倾向，并且肯定了一个新的革命的道德之需要，这道德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道德对立的。

在《面包与自由》、《互助论》、《法国大革命史》中他很显明地给我们确立了斗争的目标。他底《自传》又是一部忠实的生

活之记录，使读者以一个跳动的心与作者共同经历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俄国革命运动与欧洲社会运动的各阶段。从这运动中显现出作者的最纯洁最伟大的人格来，作为我们每个青年人底模范。《法国大革命史》在历史的领域中是有最大的成就的。它公平地展示出来下层民众在法国大革命中所尽的重大职务，这职务是往往被一般历史家所忽略了的。

《互助论》在生物学著述中已经成了一部权威的著作。它可被视为达尔文底《人类由来》底续篇，专门指示着在所谓“生存竞争”这生物学的进程中合作的功用之大并不减于个体的斗争。据说赫胥黎看见了本书所提供的证据后，就改变了他底见解。克鲁泡特金底论据曾经引起了各国学者的讨论，它们不仅适应于动物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面包与自由》与《田园工厂手工场》是他底经济学方面的两部重要著作。而后者竟做了现今在美国流行的技术统治学派底先驱。它们给我们供给了安那其共产主义的一个明确的解释，和未来社会底一个熟思的方案。他把工业和农业联合起来。他主张工业分散而反对集中，他主张以全工来代替分工。而头脑劳动和手腕劳动的联合这理论又给现在的新教育开辟了路，做了先锋。

最后他又给了我们一部《伦理学》，这不仅是他底关于道德的研究的一个结论，这还是他的全部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之要略，这又可说是他一生的知识的综合，可惜“死”来得太快，使他没有时间把下卷完成。

他底论据是雄辩的；他底眼光是深透的；他底学识是渊博

的；他底文体是朴实简明的；他底笔调是诚恳热烈的。所以他底著作能够极普遍散布于全世界，取得多量的读者。

克鲁泡特金是一个多方面的人，但又是一个性格极其和谐的人。一个忠实的归纳的科学家，一个前进的哲学家，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把这三种性质很和谐地具有着。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一个最勇敢最热诚的社会革命的战士。所以我们决不能够把科学家的克鲁泡特金和安那其主义的革命家的克鲁泡特金分离开。我们应该认识整个的克鲁泡特金。

克鲁泡特金这个名字在中国是十分熟习的。许多人赞美他，许多人攻击他，许多人惧怕他。然而却很少有人真正认识他。大部分的青年都知道他底名字，都会说几句批评他的话，却没有一个人完全读过他底著作。在中国也有人翻译过他底著作，也有人刊印过不完全的《克氏全集》，但那些译本大半是不可信赖的。译者常常把原著底精义遗漏了，有的甚至把作者底思想错误解释了。在中国克鲁泡特金是不曾被人真正地认识。

因了这个缘故，我们才着手来编印克鲁泡特金底全集。我们底目的就是想把整个的克鲁泡特金介绍到中国来。一方面使青年认识他底学说底真面目，一方面给中国学术界供给一点可信赖的宝贵的材料。

我们不妨明显地说，我们底目的不在宣传而在研究。我们底译笔力求忠于原著，不敢稍微违背原文底意义。克鲁泡特金底著作是用四五种文字写成的，有许多文章散见于各国的报纸杂志，因此我们也在可能范围内把它们搜集起来，有单

行本的，就用各种文字的版本参照校阅；无单行本的，就整理编译。我们希望这一部全集能够成为忠实的，完全的东西。至于以后，能否做到这一层，尚待读者公平地批判。

1933年5月。

《克鲁泡特金全集》(第一卷)[①]序

《自传》并不是克鲁泡特金底最初的著作，然而现在我们却把它编为全集底第一卷，这也是有意义的。

一个研究克鲁泡特金的日本学者故大杉荣曾经说过："我们要真知道克鲁泡特金，与其读他底《面包与自由》或《互助论》，不如先读他底《自传》。"我们同意他底话。

《自传》只是克鲁泡特金底前半生的生活记录，从一八四二年描写到一八八六年，这里面并没有包含着他底生活底最重要的时期。(那是他底后半生的生活，关于这个我们在全集最后一本《克鲁泡特金评传》里将有详细的叙述，在这里多余的话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底后半生底基础，远在一八八六年以前许久就确定了。《自传》不仅是一本忠实的生活的记录，它是一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史，它描写同时代的人物和社会状况更多于描写自己。因为作者底生活是多变的，他在各种社会阶级中活动过，所以他底描写也是多方面的。他底法国友人爱理则·邵可侣给《自传》底法文译本起了个题名做，Autour d une vie 意思也就是这本书所着重的不

---

① 第一卷，即《自传》。

是作者本人，而是他这人的周围的一切人物和社会状况。而作者本人，就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安那其主义者。革命的安那其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底成长在《自传》里就充分地给我们显露出来。所以克鲁泡特金给他底《自传》题名做《一个革命者底回忆录》。

读了《面包与自由》，我们会为他底雄辩的论据和热烈的笔调所压倒，但是我们会问：一个最高的皇族怎样会变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我们读别的书也会有这个感想，但是我们读了他底《自传》以后我们就没有一点疑惑了。我们跟着他去经历了那多变的生活，我们就知道在他，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奇迹。《自传》是他底生活记录，而他底生活就是他底全部著作底基础。所以先读过《自传》，然后才能明白他底思想发展的道路，然后才能更深切地了解他底其他的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著作。

克鲁泡特金研究底权威奥国学者奈特罗曾经说过一番值得注意的话：

> ……一个人能够接受或抛弃一种学说，但他底道德性却是生了根的，不能够随时抛弃的。因此我们在克鲁泡特金底任何著作中所看见的他底道德性，必定是属于同样性质的。
>
> 然而克鲁泡特金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遇着各种不同性质之公众的，一般的生活，这必然地影响了他底悠长生活的各时代中的见解。
>
> 当他还是一个哥萨克军官旅行西伯利亚时，他把他

底全副精力与热诚完全用在考察上面，为的是谋俄国与西伯利亚之利益——恰与后来他把他底全副精力用在《反抗者周报》上面；用在"互助"和法国革命研究上面，或者用在观察合作、集约农业上面……他每做一件事，便专心一意地，极其忠实地做去。然而这种环境之变迁便免不掉使他在悠久生涯之各时代中生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评价，进化等等。……环境，人格，事实对于他生出种种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反映在他底著作之中。

我以这样的方法来观察，便发见在一八七九到一八八二年之间的各种影响，使克鲁泡特金在那些年代中看见了革命的事实，使他相信一个民众的革命快要到来了，而且就近在目前了——这个见解便产生了克鲁泡特金写出《一个反抗者底话》的当时的精神。

过后监狱的生活便开始了，这是一八八三年到八五年，在那时期中他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还存在着，但至今尚未刊行。在我未考察过它们之前我不能够断言：这些年代是一八七九——八二年之收场，或是一八八六年起至九十年代或较后一点之英国时代之开幕。接着"俄国革命"及"法国革命研究"时期就开始了。于是一九〇五年以前，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及较后一些年代中，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左右反对社会民党的时期，(因为他看见他们把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弄失败了，而且还妨害了欧洲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努力。)以及欧战时期(战前及战争当时)及其后的时代，又相继而来。

我确实觉得他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三年之间所抱的在法国及拉丁诸国一个新的革命一个新的公社马上就会到来之希望已经消失了。后来他在英国看见了英国之巨大工业组织之奇观，以及在英国常常讨论的和战争海上霸权关联着的粮食问题；他又看见英国工人底真正广大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在那里分配合作社之普及，并且他又看见英国社会党与急进党底人物和环境，当时在其中讨论,辩驳,宽容都是极其平常的，决没有暴力,激情,狂信等等——上述的这一切不免就使他大大地注意到创造的努力及进步之一切形式(只是在自愿的,而非在强迫的路线上),那么对于单纯的破坏与一个对于自发的改造之多少带点狂信的信仰,便不十分注意了。

因此这时代的克鲁泡特金底著作便有了一个不同的性质。他底英国读者和听众希望被事实和论据所说服,并不愿为热情的话语激动了感情。而且在著作或讲演俄国政治犯底惨苦的生活、俄国政府对于革命党人的迫害时，可以多用热情的语句来鼓动人。然而在讨论安那其主义、搜集材料证明互助小工业等等时，他便不得不用教育的而非用感情的方法了。(见奈特罗一九二八年给我的信。)

这样奈特罗就把克鲁泡特金底各时期的著作底性质分析清楚了。我们明瞭了这个,我们认识了克鲁泡特金底生活,再进而读他底全部著作,我们决不会感到一点困难的。

黑　浪 1933年5月。

《片断的回忆》后记*

这篇回忆从亚历山大·柏克曼的《狱中记》里译出。这是原书的第一部，后面本来还有《监牢》和《审判》两章，因为太长没有译。又《和娉斯德的召唤》一章中有好几段被我删节了，因为译出来不便发表，便用几个点子来代替。这书是部名著，二十多年前（一九一二年）在美国发行第一版时，也曾震动过一时；我看见过一些当时美国报纸的批评。不过这样的书在中国大概少有人知道。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书。假若有机会我倒想译出十部自传来，克鲁泡特金的我早译出刊行了。这是第二部（预备先出个节本）。以后还想译沙文考夫（路卜洵），高德曼（即爱玛），妃格念尔，梅晓若，薹尔书尼，加乔夫斯加亚，勒弗郎塞，格拉佛八个人的自传或狱中记。

又我在《译文》上发表的《性的渴望》和《地牢中的爱的花》是从这书的第二部中译出的。记得在那两篇译文后面写了些介绍这书的话，所以现在不多说了。

1935年4月18日在东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告青年》[1]序

我们有一颗纯白的心，我们有一个热烈的渴望，我们有满肚皮的沸腾的血，我们有满眼睛的同情的泪，我们是青年。

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有着一切了。

我们有房屋居住了，但是我们不满意；我们有饱饭吃了，但是我们不满意；我们有衣服穿了，但是我们不满意；我们有书读了，但是我们依旧不满意！因为在我们的周围还有着许许多多没有房屋，没有衣服，没有饱饭，没有书读的人。而且这些人正是我们所赖以生活的。

我们有着一对明澈的眼睛，我们不能不看见在他们的肩上安放着我们的全部幸福。我们和我们的父兄一样也成了掠夺的人了。

黑暗，压迫，灾祸，痛苦在我们的周围扩张起来。我们的欢笑里面夹杂了无数呻吟号泣的声音。我们已经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我们说我们应该走出我们的幸福的环境，到那外面的世界去。走进实生活去！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一些有用的事情，要消灭那黑暗压迫，要消灭那灾祸

---

[1] 《告青年》，克鲁泡特金著。一九三七年十月以旧金山平社名义出版；一九三八年一月由上海平明书店重新排印出版。本篇原题名为《献给读者》。

痛苦，要改革现在的社会；要帮助我们周围的无数受苦的人！我们要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不愿再把我们的生活费用放在别人的肩上。

“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预备向着外面世界，向着实生活走了，但是在我们的面前横着许多条道路，在每条路上都放着我们可以做的工作。于是，我们站在歧路边踌躇起来。没有一个人来给我们指路。我们的父兄已经躺在死床上了。

在这时候一本小书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像亲密的朋友一般给我们说明了一切，它的话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它的话里面并没有欺骗。读了它，我们就觉得一线光明把我们的头脑完全照亮了。

现在我们没有一点踌躇了，我们捧着这一本《告青年》，怀着纯白的心，沸腾的血，热烈的渴望，同情的眼泪，大步向着实生活走去！

1935年4月。

《门槛》[①]前记

这是屠格涅夫晚年写的散文诗中的一首。但英译本的散文诗里却不曾把它收进去。只有几年前在美国出版的一本《革命诗选》中有这诗的韵文的翻译，题目却改作了《革命者》。我这次是依据一九二〇年柏林版《屠格涅夫集》第八卷(《俄国文库》第四十六卷)内的原文译出的。据该书编者说，一八八二年在《欧罗巴通报》上发表的散文诗内，《门槛》一诗没有能够印入，后来也不曾编入全集。这诗于一八八三年在圣彼得堡秘密印行，是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民意社的刊物上发表的。

有人说这诗是为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写的，这当然有理。但我以为使屠格涅夫感动的俄罗斯女性决不只柏洛夫斯加亚一人。柏洛夫斯加亚型的女子在当时的确不少。而且以前和以后也有很多。譬如尼克拉索夫就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写了题作《俄罗斯女人》的长诗。我们知道，远在西欧的老屠格涅夫虽然不能够充分了解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但一直到

① 《门槛》，屠格涅夫等著。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内收《门槛》(屠格涅夫)、《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蒲利鲁克尔)、《三十九号》(司特普尼亚克)、《薇娜》(廖抗夫)四篇作品。各篇译文前均有译者所作"前记"，本文为第一篇，余三篇见本卷第一七一至一七三页。

死他对这运动都非常关心。他还想为一九三人案中的米席根写一部小说，他读了苏菲·巴尔亭在法庭的演说辞，甚至俯下头去吻那张报纸（另一个俄国诗人为这个年轻女子写过一首诗）。只可惜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坏到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了。

1935年5月。

《狱中记》[1]后记

> 柏克曼还是一个勇敢的活人。六年前我曾到巴黎郊外 St. Cloud 他的寓所，拜访过他。他给我写信时用的那柏林办事处的信纸上鲜明地印着“没有神，没有主人”的字样。这个人已经过了六十岁，他还常常说“到死都是年轻”的话。那么他到死也会相信神是不存在的罢。这是无疑的。这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啊！这样想着，那个身材短小结实的，秃头的柏克曼的坚定的风姿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十四年的监狱生活都不能改变他的信仰，却反而使他写出叫远在英国的老加本特也惊叹赞扬的《人类心灵之记录》了。神不存在的事实成了那全书的要旨，而且那生活的事实，就是有一次当他的生命在美国濒于危险的时候连远在克龙士达特的水手也举起了救援的旗帜。这样他已经显示着比神还更伟大的存在了。

这是我的小说《神》里面的一段话。[2] 所说的《人类心灵之记录》便是他的《狱中记》。我在这里译出的只有原书的三分

① 《狱中记》：亚·柏克曼著。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这一段话作者于编印《巴金文集》（第八卷）时作了删节。

之一。我几年前就发了宏愿，想把这书完全译出来，然而到了现在开始来翻译这书，却又因了种种的原因，不得不采取"节译"的办法。广告上说这是精选的节译本，但广告上的话不见得可靠，这节译只是不得已的，并非精选的，虽然我也不是胡乱地节译几篇就算了事。

全书共含四个部分。第一篇有七章，完全译出了，不过每章里略有删节。第二篇四十八章，我只译了十四章。第三篇一章是全译的。第四篇只有一章《复活》，却全删了。附录是从爱玛·高德曼的自传"Living My Life"里译出来的。

关于柏克曼的生平，虽然可说的话很多，但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不过关于他写这书时的情形，我想让读者知道一点，那么我就借用高德曼的话罢：

> 我和沙夏便到那小小的田庄上去住。我们爱那地方的美丽和安静。他在一座最高的小山上面搭了帐幕，从那里可以望见赫贞江的壮丽的全景。我忙着料理家事。这时沙夏便开始写他的书。
>
> 自从沙夏一八九二年去到披次堡以后，我的住处不知被警察搜查了多少次，然而我却设法把沙夏在牢里秘密出版的《牢狱的花》保存了几本。诺尔德、包尔和其他的朋友们也留得有几份。这刊物对沙夏很有帮助，然而和他在那"活葬墓"里面所身经的一切的记忆比起来，它们简直算不得什么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的恐怖，肉体和心灵两方面的痛楚，他的同囚的犯人的受苦，他现在不得

不把这一切从他的深心挖出，使它们再活起来。于是十四年来的鬼影又不分昼夜地萦绕他的心灵了。

每天他不是坐在书桌前面眼睁睁地呆望着空虚，就是狂热地动着笔，仿佛被什么冤鬼驱使着一般。他时时想把他写好的东西毁掉，我必须和他挣扎许久才能够把稿子保存下来，这就像我奋斗了那许多年把他从坟墓里救出来一样。接着又有一些时候他会逃进树林里面去，怕和人间接触．他躲开我，而且特别躲开他自己和那些在他的笔下活起来的鬼魂。我不知费了若干的苦心才找到适当的方法和适当的话语来抚慰他的受迫害的灵魂。我每天毅然地进行着这种苦斗，并不单是因为我爱沙夏；而且也因为我只从他的著作的第一章里面就看出来他是在生产一部伟大的作品了。要帮助这婴儿活起来，在我这方面任何代价都不算太高。

我现在介绍给读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写出来的这样的一本书。

1935年9月1日。

《草原故事》[1]后记

这本小小的书居然作了三次旅行，换了三家书店，[2]这是我万想不到的事。或许有人疑心我从它身上赚过一笔大钱，但那是别人的事情。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曾为它算过一回帐，我为这本小书一共花去五十元大洋。这个数目一点也不含糊，我记得清楚。

这小书是我的生活里一个小小的纪念物。我每次翻读它，就有一种新的感情，在这里我看见了我的爱和憎，我的希望和失望。在我看来它还是一个友谊的信物。每次我为它换一家书店重印，我知道我又和一些朋友分开了。

然而我自己的确爱这本小书。它好像是一面镜子，靠着它我可以看见我的真面目。有它在我身边，那么即使有一天我被环境逼迫着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我也不致于得意忘形地拜倒在金牛脚下欢呼前进了。我或许是个不识时务的傻子。但我就喜欢自己的这种傻气。

---

① 《草原故事》，高尔基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即用于该版）。

② 此书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曾先后经上海马来亚书店、新时代书局、生活书店出版。

重印一本小书，似乎没有大发议论的理由。而且近来正有人在小报上骂我的译文不通，我也不好厚起脸皮来，说明自己从事翻译的苦心。我想在这里指出的只是这次付印时我把译文大大地修改了一番。但这并不是说把“不通”的地方改“通”，“硬译”的地方改“顺”。正相反，我却把“通”的地方改成“不通”，把“顺”的地方也率性改为“硬译”了。至于错的地方没有能改正的也一定有。反正不是定本，而且已有人在担任定本的工作了。还有，这小书不是消遣的小说，不预备给人躺在床上看，“硬”一点也无妨。

最近有一位朋友来信问我：为什么我的文章里面常常充满着怒气。她说看见我这人又好像完全没有怒气似的。现在怒气又从我的笔下发泄出来了。不知道她看见这短文会有什么感想。我把这本小书献给她，愿她更了解我。

1935年10月。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前记*

这篇《虚无主义者的婚姻之真实的故事》，是蒲列鲁克尔的《俄罗斯的英雄与女杰》里面的一章。我一九二八年在伦敦友人 T.H. Keell 处借到这书，读后就抽暇把其中我喜欢的几章译了出来。这一章是那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法国译成的，后来曾印过一本小册子；最近重读，把它修改了一遍，但手边已没有原文来参照了。

蒲列鲁克尔的生平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是《英俄月报》的编辑，还出版了几本关于俄国的书。《俄罗斯的英雄与女杰》里有作者的一篇长序，从那里我们也许可以知道一点作者的事情，然而可惜我已经不能够记忆起什么了。

译　者 1936 年 3 月。

---

* 本篇及以下《三十九号》前记、《薇娜》前记各一篇均收入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门槛》。

《三十九号》前记

这小说是从司特普尼亚克的《沙皇治下的俄罗斯》里面译出的。这是旧的译稿，但最近曾照英文原书修改过一次。

司特普尼亚克(意思是"草原之子")本名 S. M. Kravtchinsky，是旧俄虚无主义者中卓绝的人物，又是土地与自由社的机关报 "Zemlia i Voria"(土地与自由)的编辑。一八七八年他在彼得堡大街上刺杀了麦孙采夫将军后，便逃到西欧去过亡命者的生活。著有《一个虚无主义者的经历》(小说)，《地下的俄罗斯》等书，都曾风行一时。

司特普尼亚克生于一八五二年七月十四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伦敦附近被火车辗死。

译　者 1936年3月。

《薇娜》前记

《薇娜》是廖玻德·抗夫二十七岁时的作品。抗夫便是剧本《夜未央》的作者，这剧本在中国有过大的影响。

抗夫的生平，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他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波兰克拉科夫。他自小便爱好戏剧，从六岁起，就常到本城的戏园里看戏。以后他加入了波兰的社会党，是一个活动分子，后来在国内站不住脚，便亡命到德国。《夜未央》是在德国写成的，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岁，这剧本次年（一九〇七）被译成法文，在巴黎艺术剧院上演，轰动一时，两年中间连演百余次，夜夜满座。

《薇娜》似乎是一篇自传的小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抗夫写《夜未央》的动机和经过。

这是我八年前的旧译稿，从法文译本重译出来的。现在编进这集子时，曾参照法文本改动了一些字句。

译　者 1936年4月。

《门槛》后记

收在这集子里的四篇文章是我在一九二八年译成的。因为它们都是描写旧俄的新女性的姿态的作品，这次就把它们编在一起印行了。《门槛》是去年旅居东京时，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里译出来的。它可以被看作这集子的序言，所以就放在前面。

这次付印时，每篇译文我都校阅过，而且补写了"前记"，不过这次的校阅仍是很粗率的。反正这些并不是文学上的名著，它们的价值也并不在它们的文字，却在所描写，所叙述的事实。而这事实却是不死的东西，所以文章也就能够活下去了。

别的话我在"前记"里面说过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

巴　金 1936年5月4日。

《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1]后记

这书原名《地下的俄罗斯》，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一部名著。著者是俄国著名虚无主义者，但此书却用意大利文写成在意大利出版。出版以后曾震动全世界，短时间以内，就译成俄文及英、法、德、西班牙各国文字。日本也有译本，译者宫崎龙介就是《三十三年落花梦》底著者白浪滔天底令郎。据吉野作造说，他是一个长于文笔的热血男儿，所以他译司特普尼亚克底书，能恰到好处，不过大概因为疏忽的缘故罢，书中译错了的地方可也就不少。

我一九二六年在上海时读到这书的日译本，后来在巴黎又先后得到西班牙文、英文、法文三种译本，对照着读了几遍，被此书底文笔和事实感动到极点，便起了翻译的念头，然而因为忙着别的事情，这本小小的书竟然经过了几年的长时间才得译成。

这书在一九二〇年曾由一家小书店印行过两千册，[2]但

---

① 《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司特普尼亚克著。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指一九二九年八月上海启智书店出版的《地下的俄罗斯》（署李芾甘译）。本篇系据该书之《译者小言》改写。

后来售完就绝版了。最近我参照英、法文译本把它校阅了一遍，修改了一些处所，我发见有好些地方我都采取了意译的方法，觉得看下去文字也还明白而有力，所以也就不一一的改正了。

卷末附印的《司特普尼亚克略传》是原书所没有的，仅见于西班牙文译本内。作者未署真姓名，只署了一个"E"字，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我从改订第三版的西班牙文本把它译出。那时我还在读西班牙文，认得几个字，多翻翻字典，也颇能明瞭那原文底大意。但现在我底西班牙文已经完全还给我底先生了。昨天翻开那原文来看，我甚至奇怪起来：我从前怎么能够翻译这样的天书呢？

巴　金 1936年6月20日之夜。

《春月之死》、《忆春月》[1]译后记

前面两篇纪念日本诗人生田春月的文章从石川三四郎的散文集《不尽想望》中译出。这两篇都在石川君的小刊物"Dynamique"上发表过。这次重读，我很受感动，就把它们译了出来。生田春月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九日投濑户内海自杀。他自杀的原因在他投海前几点钟写给石川君的信中便说得很清楚。石川君是日本的社会学者。他的思想之透澈，生活态度之真挚，人格之完美，在日本是少有人能够比得上的。他的作品中，《西洋社会运动史》是一千页以上的巨著，据说是属稿三次，一次毁于火，一次失于盗，而终于完成了的。那是一册热情满溢而内容充实的著作。他的散文很朴素，却自有其可爱之点，在中国还不曾被人译过。我现在译完这两篇短文，想到那位不能在群众中间活动，被迫着在东京近郊田舍里教法文、种菜蔬过活的老人，不禁起了感激与崇敬的怀念。这两篇都是充满着反抗情绪的、愤激的文章，读者若看作提倡出世或自杀一类的消极思想，那便是错误了。

1936年7月2日。

---

① 《春月之死》、《忆春月》：日本石川三四郎著，译文曾收入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梦与醉》。

《秋天里的春天》三版题记

这本小书居然有三版的机会，这在我是料想不到的。五年前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功夫把它翻译出来，只是因为我喜欢它，而且我又曾被它那么深切地感动过。译本印出后我也曾匆匆忙忙地翻阅两次，都是在旅途中，心情特别容易激动，不想一字一字地读下去，害怕会引出我的眼泪。现在这书的三版就要付印，我居然捺住性子仔细地读了一遍，改正了一些误植的字。当我把书阖上的时候，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

前天我接到一位染着不治之疾的朋友①的来信，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朋友夫妇都是这本小说的爱读者。小说出版后，我寄了一本去，说是给他们在病中读着消遣。以后我过了一段时期的飘游生活，也就没有和那朋友通音讯。只有在一篇短文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没有人了解他，他如今在艰苦的生活的斗争里，社会的轻视的眼光下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我每次读着他那些混合着血和泪的散文，我的整个心灵都被扰乱了。我常常在心里狂叫着：他是不能够死的，他应该活下去，强健起来，去享受生活里的幸福。"后来连他的文章也

① 朋友：指散文作家缪崇群，《碑下随笔》的作者。一九四五年一月在重庆北碚逝世。

不见于报刊了。谁知道两年多的阔别以后，他会意外地来信告诉我，那些时候他们每天读这小说，而且跟着书中的语句对泣呢？谁知道他给我带来的消息是：他的妻已经在前一个月的一个傍晚寂寞地死去了呢？难道真如巴达查尔师傅所说爱和幸福都只是外表吗？

他在信里这样地写着：

巴金兄：你还记得在南京，不，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有一个你曾系念过的人：你曾为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幸福……并且他也是一直的在系念着你。病没有使他灭亡，他还如你所希望的在生活着，可是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散管以至于早已丧失了他的生的意念，又早已为一切人所遗忘了的、所不屑为伍的我么？——是你曾经把一对石球遗忘给的那个人，也是写了《一对石球》寄赠你的那个人。

朋友，五年的时光是一霎间的过去了。如今除了我还在系念着的几个私自景仰、私自向往的友人之外，怕再没有如我这样的在系念着我的友人了。我是一无所有的。你所希望于我的“生活下去”，这便是我生活下去的一条荒凉的、寂寞的路程。

朋友，你还记得你曾一度闯入我们蜜一般的生活圈里：不但不曾把你看作生客，还把你当作蜂主、当作长老的我们么？一个人小心翼翼的为你抱了新缝的被衾来，一个人诚诚恳恳的留着你抵足而眠么？那一个是你知道

的祖英①，也许经过了几年，你早已把她忘记了。她是一直的和我在一起，她是一直的和我一样的为生活而苦苦挣扎，她在上月二十五日傍晚已经死去了，她想挣扎再也不能挣扎的向生活永诀了。

想到那些日子才是我们的日子，想到那些日子里有过你，我们生活的日子才仿佛有过记录。现在什么都完了，祖英一死，连那些生活有过记录的日子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谈起了。

想到前年秋天她每天给我读一节你赠给我们的《秋天里的春天》，我们每每随声对泣。爱巴达查尔师，又怨他。谁还料到祖英死后我再对你提起这个书中(？)人物呢？

祖英临死的时候还说，她死，我将是世界上一个最飘泊的人。我飘泊到什么地方去，又为什么飘泊，她就没有给我接话，连我也不知道。

正因为我是一个平凡地想平凡生活下去的人，我想到我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打扰你了，我想着祖英，想着你，想着我还有自由可想的人……我就这样地可以再生活下去吗？你该应我一声！

崇　群 九月二十二日

① 祖英：张祖英，崇群的夫人，一九三六年八月在南京逝世。

我读了上面的信，我的心因同情而发痛。我眼前的阴影显得更浓一些。但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仍然不曾失去对生活的信仰。虽然气候已经是惨淡的秋天了，可是明媚的春天的回忆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而且谁都知道，在明年春天还是要来的。

我盼望着明年的春风会给那位朋友煽起生命之烈焰，给他吹散痛苦的回忆，使他能够健壮地活下去。

“春天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数理教员巴南约席的确说了真话。

1936年9月27日。

《夜未央》[1]后记

校完了《夜未央》第三幕我仿佛做了一场痛苦的、但又是值得人留恋的梦。一九二八年我在巴黎得到这个戏的法文原本，和旧译本（李煜瀛译）对照读了一遍，发现旧译本中有误译及删节的地方，我不满意，就自己动笔另译。但这译稿在从巴黎到上海的途中被邮局遗失了。一九三〇年一月我又把剧本译出，交给一家小书店[2]印过一千册。后来书售完，那个书店也关了门。

去年夏天我在开明书店门市部买书，遇见一位青年读者。他问起这本小书，说是很想读到它。他后来给我写信又提到这件事。他的热诚感动了我。我便在旧书堆里找出旧译本来，匆匆地读了一遍，交给印局去排印。校样送来的时候，我仔细地校对了一遍，改正了一些处所。我本想丢开自己的旧译本重新翻译，但不幸我没有多的时间，这是我应该向读者致歉的。

1937年1月。

① 《夜未央》：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指上海启智书局，初版时的书名为《前夜》。

《我的生活故事》[①]前记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夜在美国麻沙秋谢州，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内有两个意大利人被烧死在电椅上。这两个人是鱼贩子巴尔托罗美·樊宰底和鞋匠尼可拉·沙珂，关于这两个人我在文章里不知道提过多少次，我还为他们写了两篇小说《电椅》和《我的眼泪》。现在八年过去了，又到了那个使人痛心的纪念日，但已经是第八次的纪念日了。我想写点文章纪念我在《灭亡》序里提到的"我的先生"，可是我找不到适当的字眼来表示我的悲愤。不知道是不是这八年的经历使我的神经麻木了？结果我只译了这篇"自传"。这是第二次的翻译。在一九二七年我还草率地译过一次。这篇短文比我所写的一切纪念文章都有力，它本身是很朴素而又很雄辩的。谁能相信这是一个鱼贩子笔下写出的东西呢？

关于那个鞋匠，我把他写给他的儿女的告别信译出附在这后面，这两封信还是我七年前的译稿。

以上的话是一九三五年写的。现在是一九三八年了。我

① 《我的生活故事》，樊宰底著。一九四〇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还不能够将我计划中的那本关于“沙樊事件”的书写成、在今年的纪念日我依然没有一件像样的祭品献给那位我所敬爱的先生。我抱着深的悔恨和怀念，把这本小小的自传印出来。这是一本真实的书。它会感动许多纯洁的心灵的。

1938年7月。

《战士杜鲁底》[①]前记

我没有见过布埃那文土拉·杜鲁底，不过我知道他，我常常听见人说起他。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那时他和阿斯加索、何威尔两人正囚禁在法国监狱里。阿根庭政府要求将他们引渡过去，以便执行早已判决了的死刑。据说法国当局已经有意应允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忍耐地顺从这个命运。他们三个人在监牢里实行同盟绝食。同时在外面他们的同志和全法国的自由思想家一致地扬起了正义的呼声，他们是无罪而被捕的，（"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这不能作为罪名；但他们确实是在西班牙国王游历巴黎的时候，因了这个"罪名"而被捕的，）因此他们必须被释放。这呼声成了一种力量，到底生出效果，杜鲁底、阿斯加索、何威尔在同志们的热诚的欢迎中走出了法国的监狱。

我读到这三个人联名的宣言。那时我和几个朋友在巴黎编辑一个刊物，由美国旧金山的友人印刷发行。我密切地注意着这事件的发展，把详细情形在那杂志上陆续刊出。我也翻译了他们的宣言。那里面有几句话我到现在还不能够忘记。

---

① 《战士杜鲁底》，高德曼等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他们说，他们靠了法国友人的援助获得自由，他们怀着深的感激回到自由的天地，他们不愿意吐露空泛的感激的言词，却保证有一天要用事实来回答朋友们的厚意。

这事实如今果然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所有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的各国朋友面前。杜鲁底和阿斯加索慷慨地交出生命，用他们的血酬答了朋友的信赖。何威尔至今还勇敢地在前线作战。巴塞洛那的陵墓的建筑，几十万民众参加的葬仪，全世界酷爱自由的人士的同声哀悼，……这些都不是没有原因的。

杜鲁底，这个西班牙的机器工人，在生前他就获得我们大家的敬爱。我常常看见从西欧来的刊物上关于他的记载。我也听见一些朋友谈到他的近况。当我知道他率领志愿兵向沙拉各萨进军时，我兴奋地预祝他的成功。当我听见他去玛德里参加坚守危城的巷战时，我对西班牙革命前途的信赖更加强固。最后哈瓦斯社的一个简单的电报，使我感到像见着一颗巨星殒落时的空虚。

但是西班牙局势的发展又使我的心变成十分强健的了。我编译这本小书不仅纪念一个未见面的友人，对他的忠实的工作和慷慨的牺牲表示一点感激和敬爱。同时我也愿意让我的同胞在这一个坚苦奋斗的抗战时期中略略知道另一个国度所经历的苦难和伟大的西班牙革命的前途怎样在这些苦难中逐渐长成。

正文八篇都是从C.N.T.—F.A.I.①出版的一本小册中译出

① C.N.T.–F.A.I.：分别为"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和"伊比利亚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的缩写。

的。作为附录的加因斯基的一篇短的报告，则是译自他的一本描写巴塞洛那的各方面情形的著作。加因斯基并不是杜鲁底的同志，不过是从客观的立场写了那报告的。

我怀着万分热诚重描了另一个争自由的国度里最伟大的战士的雄姿。我希望它能够透过一层层虚伪报导的暗雾清晰地现露在我的同胞的眼前，让他们知道在西班牙斗争中谁尽了最大的力量，什么人是西班牙民众爱戴的英雄。

1938年5月20日。

以上的话是去年在广州写的。这小书的纸型已经毁在广州沦陷时的大火中，此次重排，我另外加上一篇杜鲁底夫人爱米琳·莫林的演讲稿，这是从《西班牙与世界》这期刊转译的。

1939年3月16日。

《西班牙在前进中》[1]后记

西班牙在前进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歪曲者的笔并不能够抹煞真理。虚伪的记载也不能染污殉道者的血。英勇的斗争会克服一切的障碍而完成其目的。

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够多的关于西班牙的记载和消息。虽然大部分都是来自反侵略者一方面，但是我们并不曾从它们知道了反法西斯蒂斗争的全景。作为斗争的一个主要力量C.N.T.—F.A.I.就完全被人忽略了。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到现在依然散布着那两个团体破坏人民阵线的流言。今天还有一个学生严正地对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不能够再沉默了，在我的面前有着这么多的图片，它们便是对于那些流言的一个最雄辩的答覆。我应该让那无数关心西班牙的命运的人知道在这斗争中C.N.T—F.A.I.所尽的任务和所负的使命，因为那两个团体的英勇的努力是可以决定西班牙的未来的。

这本小册里所收的七十余幅图片都是从C. N.T. -F.A.I.刊行的画册中选出来的。我重复着那两个团体的话，把这本小小的画册献给同情西班牙斗争的各界人士。

巴　金 1938年5月20日广州。

① 《西班牙在前进中》：一九三八年八月由上海平明书店出版。

《西班牙》[1]后记

收在这小册里的三篇文章，皆出于德国的革命工团主义者奥古斯丁·苏席(Augustin Souchy)的笔下，在三个国家的定期刊物上发表了的。

作为希特勒的死敌的苏席在德国劳动运动被摧毁了以后居然逃出了国社党的魔手，如今在自由的西班牙境内做了一个英勇的斗士而在C.N.T.里面活跃着。他参加了西班牙的斗争，所以能够很深刻地了解它。从他的劲健的笔下出来的是有血有肉的文字。

意大利亡命者加米洛·柏尔奈利(Camillo Berneri)是苏席的友人和同志，柏尔奈利的死是西班牙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大损失。苏席和柏尔奈利在一起战斗过，他很了解这个年轻的战士，因此写出了这篇沉痛的同时富于教训的纪念文。

论述西班牙革命的前途的两篇是我在广州时翻译的；纪念柏尔奈利的死的短文则是在从梧州开石龙的民富拖渡中译成。我从广州出来将近三个月了，在经历了若干的艰辛之后现在还能够在这里而且在敌机的不断的轰炸之下将这小册印

---

① 《西班牙》：A.Souchy 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出，这是一件使我高兴的事。

南欧的西班牙在地理上固然和我们相隔甚远，但是它的命运和抗战中的我们的命运却是联系在一起的。愿我们牢记着西班牙的教训。

巴　金 1939年1月15日在桂林。

《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①]前记

西班牙问题是一个难解的谜，尤其是对于远处中国的我们。巴塞洛那的意外的陷落使得许多热心之士发出了绝望悲观的议论。还有人甚至相信弗朗科可以实际地统治西班牙全国了。

事实不会是这么简单。莫索里尼虽然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已经占有了它。"但抗战的西班牙至今还没有屈服的表示。最后的胜利究竟是否属于莫索里尼——弗朗科，在目前谁也不能断定。

这本小书是一个瑞士籍的志愿兵的真实的报告，已经是一年半前的作品了。但它比任何日报记载更使我们明白抗战的西班牙的内部的情形。作者为保卫自由的西班牙而战，并且在战争中受了轻伤。他记录的全是个人亲身的经历。从这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西班牙斗争的全景，而且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西班牙是不会失败的。弗朗科能够占领城市，但他不会取得民众的合作与拥戴。

将有一天弗朗科会认识民众的力量的伟大。到那时候我

---

① 《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阿柏尔·米宁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们才可以断定抗战的西班牙的失败或成功。我希望这本小书的读者会明瞭我的这意思。

附录一篇，原文见《工人团结》，是F. 孟蔡尼为送别国际纵队志愿兵的撤退而作的。孟蔡尼女士是C.N.T.的一个领导者，做过共和政府的卫生部长。

巴　金　1939年2月15日在桂林。

《西班牙的斗争》[①]前记

西班牙的“内战”现在算是结束了。对于每个渴慕自由的人这悲痛的事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知道日报上刊载的西班牙的消息会激起若干万人的悲愤。然而我并不绝望。我不相信西班牙人民的英勇的斗争果真会被窒息在大屠杀的血泊中而消灭的。对于我们，西班牙过去是一个谜，现在仍还是一个谜。我们见到的常常是一些外表。

我现在编译这套“西班牙问题小丛书”，虽然不能说是就可以解决这个谜，不过我的目的是在帮助朋友们多少了解一点那个奇异的国度的内部情形，使他们明白那个斗争的全景，其经过，其胜利及其失败。西班牙的快乐的时刻和苦痛的时刻，将藉着这些小书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一册《西班牙的斗争》便是说明西班牙斗争的真相，描绘西班牙斗争的全景的名著。作者老若克尔是国际劳动运动中的数十年的斗士，他的名字是和国际劳动运动分离不开的。他是希特勒的不能和解的敌人，终于被逼迫着只身从纳粹治下的德国逃出来。到现在他还是努力为着德国的解放，为着

① 《西班牙的斗争》：若克尔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世界的解放奋斗。作者的渊博的学识，崇高的人格和长期斗争的经验，可以给这小书的真确性作一个有力的保证。

我们不要说西班牙的斗争就永远地结束了。西班牙的命运也就是全欧洲的命运。关于西班牙的悲剧，作者在另一本小册的结尾说得很不错："西班牙的大悲剧就是直到现在它还是很少被人了解。这个民族受到了无数的伤痕，流着血，还在英勇地战斗，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胸膛里正怀着人的尊严与自由的可贵的生长，这关系着我们的前途。我们全体的未来都依赖着他们。这个民族的受苦的故事却很少被人了解。"

我们以后应该努力了解西班牙的真相。

巴　金 1939年4月1日。

《西班牙的日记》[1]前记

这小书只是《西班牙的日记》的最初的几段。作者没有能够写完它，就在法国饮了法西斯蒂的匕首逝世了。友人们在他的文件中找到这未完的遗稿，把它刊印出来。原文载于意大利文《正义与自由》周刊，我是从法文转译的。A.T.的罗塞利的略传原文见英文《西班牙与世界》半月刊。

加尔洛·罗塞利的死是国际反法西斯蒂运动中的一个大的损失。西班牙的革命也失掉了一个忠实的，有力的拥护者。然而他是幸福的，他来不及看见西班牙的悲剧和目前的阴暗的局面。

弗朗科会长久保持着这表面的大胜利吗？读完罗塞利的日记——这混和着血和泪的文章，我可以坦白地回答一个字：“不。”

我们应该相信将来。

巴　金 1939年4月。

① 《西班牙的日记》：加尔洛·罗塞利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1]前记

一九三七年五月的巴塞洛那的事变，这是梦魇，这也是不能被时间磨洗去的历史的篇页。自相残杀的内部斗争必然地削弱了革命的力量。在那五月的第一个星期里革命的西班牙的心上受到了一个痛楚的伤痕。它以后也就没有能够把它治愈。这是西班牙的悲剧中的一幕。

现在巴塞洛那(甚至玛德里和别的地方)已经陷落在法西斯蒂的手中。西班牙的悲剧的幕落下了。但舞台并不是静寂的。我仿佛见到了幕后的活动，这告诉我们第二次的西班牙的戏剧是在准备中了。将来的应该是一部充满着光明的庄严的喜剧。宗教裁判所的酷刑、里维拉的残暴也不能窒息革命，压制民众对自由的渴望，何况卖国求荣的弗朗科。

关于巴塞洛那的事变在我们这里有不少的人谈起，却不见有过一篇较详细的记载。我如今把A.苏席的报告摘要译出，并非故意将惨痛的旧事重提，以折磨读者的心灵，我不过提醒以后研究西班牙问题的人，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而已。这译稿还是在广州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完成的。

巴　金 1939年4月。

① 《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A.苏席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我的自传》新版[①]前记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在我底知识的发展上给了绝大的影响的一部书。我能够把它译出介绍给同时代的年轻朋友，使他们在困苦的环境里从这书得到一点慰藉，一点鼓舞，并且认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我觉得非常高兴。

这书是在一九三〇年一月译成的。当时由上海启明书店印过一千部。以后在一九三四年又由另外两三个朋友集资印过一千部插图本。书是没有了，但收回来的书款却很少。大半是送出去的。我们几个人对于书籍的发行可说毫无经验。因此这部书始终无法达到一般的读者底手中。为这事情我感到苦恼，尤其是后来遇着新认识的朋友向我问起怎样可以得到这书时，我便感到未能尽责似的负疚的心情。

近两三年来我就有意将这书修改重印，但总没有时间和机会。到去年我才下了决心，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事情，我曾把这决心告诉一个在重庆教书的朋友。他却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断定这样的书不会有销路。这意见倒是我料想不到的，但它并不曾使我灰心。我的决心倒因此变为

① 《我的自传》新版，一九三九年五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更坚决了。我写作翻译原不是为了销路。同时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底记录。甚至我的拙劣的译文也不能使这书的光芒黯淡。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青年的心。它帮助过我的知识的发展，它也会帮助无数的青年的知识的发展。

所以我终于违背那位做教授的友人底劝告，毅然把这书修改重印了。这其间我也曾得过一些鼓励。特别是一个年长朋友对我叙述的他的在空军中服务的青年友人的“奇遇”使我感动。那个年轻人在火车中（或者在汉口）遇见一位女郎，他从她那里得到一个奇异的礼物——就是插图本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她把它当作良好的书介绍给这新认识的朋友。我不知道那位女士是什么人，但我喜欢在我以外还有人从这书得过益处。倘使这书果真如那位做教授的友人所说“在这时候不会有销路”，那么就让我把它献给那位女士——我的译本的唯一的知己。

我当初翻译这书根据着第十二版美国本的原著和第三版的法文译本，还有大杉荣的日文译本做参考。法文本虽是译文，但出版较后，又经过著者校阅改订，不但字句间略有补充，连结构方面也有改动，分章分节都较英文本整齐。后来我又找到一八九九年初版本原著和一九〇八年新版普及本。这两种本子内容相同，都是英国版，不过普及本多一篇新版的序言，我把它改题作“跋”，附在后面。这两种本子都已绝版，它们比现在通行的美国本多一些字句。我另有第十三版的德文

译本（两卷）和纽文许士底荷兰文译本（两卷），内容与法文译本相同。

原书共有六章，我把第四章（原题为《圣彼得堡——西欧初旅》）分为三章，《归国以后》这标题是我增加的，《牢狱生活》的原来标题是《要塞（或堡垒）——脱逃》。此外，在结构方面我的译文则完全依照法文本。

最后一章原题为《西欧》，是根据友人克刚的译稿改译的。他的未发表的译稿给我减少了许多困难，对于这大量的帮助我应该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巴　金 1939年5月。

《面包与自由》[1]前记

《面包与自由》是克鲁泡特金的最被人广读的著作，甚至被人称为社会革命文学之古典的名著。在十九世纪的末叶和二十世纪的初期中没有一本书有过这样巨大的影响。它的雄辩的论据和热情的话语在今天还会激动着我们的心。

在《面包与自由》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了作者对于理想的自由社会的憧憬和对于不合理的现社会制度的憎恶，对于正义的爱和对于罪恶的恨。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的热情在字里行间燃烧着。这的确是一本热情的书。但是单用“热情的”这个形容词在这里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这是一本诉于理性的书。作者不仅是一个革命者，他还是一个科学家。无论研究学理或观察生活，他没有一个时候离开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正因为他能够证实他的理论之真确性，他把他的理想放在事实的基础上，他才能够那么深地爱这理论和这理想。

《面包与自由》就是科学家的头脑与革命者的热情之结合的产物。它是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之综合的表现，其实也可以说是他的全部知识之一个明确的纲领。每一章节都可以

① 《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著。一九四〇年八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排新版。

发展为一本大书，一个专门的研究。作者的其后的更伟大的著作的根基已经星光似的在这书中闪耀了。

克鲁泡特金在这书里阐明了他的经济学说，他甚至建立了真正的经济学(经济的科学)之最初的基础，他将经济学称作社会生理学，并且给它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人类欲求(需要)及以人类精力之可能的最少耗费来满足此种欲求的方法之研究。这就是面包的Conquête (略取，征服之意)，不过面包这名词在这里应该解释作"安乐"。他依着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的归纳的演绎法)在实生活中搜集了千千万万的事实来证明这是可能的，而且有大的效果的。这里说的"科学方法"是用着它的严格正确的意义，克鲁泡特金的观察和搜集例证的范围是很广大的，他的眼光不曾遗漏过任何一个角落。瑞士的村落，英国的矿坑，巴黎郊外的市场园艺，泽西岛和格恩西岛的农业，比利时的工人区，玛德里的美术馆……都是这个虚心精细的研究者的观察停脚的地方。这是科学的工作。这又是他的社会学的基础。

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主义是综合的，这是政治的自由与经济的平等之综合的表现。所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必须是自由的。人对于人的支配应该跟着人对于人的榨取一起消灭，权力的独占也应该随着财产的独占消失。不是征服国家，而是消灭国家。中央集权的机关应该让位给自治的公社(或共同社会)之自由联合；自由合意与相互了解会来代替法律的力量。在自由合作与自由创意上面展开了未来社会的全景。这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的要义。

"面包(安乐)与自由,"这似乎是两个简单的名词,但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概括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这两个名词甚至可以作为未来的自由社会的两大标语。另一个标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是完成这两大目标的手段。

这两大目标是不可分的。缺少一个,则其他一个也不能实现。经济的平等保证着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促成经济的平等。这是互相依赖着的。没有万人的面包(安乐),则没有万人的自由;没有万人的自由,则不能获得万人的面包。

在现在社会里,面包与自由只是为着极少数的人而存在的。我们有着谬误的政治机构,我们也有着不合理的经济组织。因此我们的生产事业是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进行的。这不是人类精力的经济,这简直是人类精力的浪费了。

然而这个错误是必须纠正的,因为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社会是不能这样生存下去的;它必须回到真理的路上去,不然就会灭亡。"这样的话也许还有人会不明瞭,我再加添一点解释:人类社会是不得不前进的。它可以一时落后,它不能永久踌躇不前,或者不停地倒退,除非它已经落了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但是甚至在今日的社会生活中也有着千千万万的事实(我们应该感谢克鲁泡特金为我们把它们全搜集起来),它们指明出来,我们的社会还不停地在往前进,虽然脚步不快,但它总是向着真理的路进行的。有一天它会达到它的目标。

那时候克鲁泡特金在本书中为我们描绘的保证万人的面包与自由的未来社会就会实现了。自然未来的发展常常会超过现今的预料与推论。但克鲁泡特金在这里所描绘的只是

一个轮廓，而且还是绘在坚实的科学的背景上面。它是不会错误的。至于上色加工，那却是后人的事了。

《面包与自由》可以说是克鲁泡特金立下的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万人的面包（安乐）与自由！真，美，善之正确的意义都包括在这里面了。克鲁泡特金把个人间的自由合意、自由联合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安那其主义的理想，把未来社会的轮廓表现得如此真实，如此美丽，如此活泼，如此完满！法国的伟大的小说家左拉称这书为“一首真正的诗”（un vrai poème），我想把它称作“一首真理的诗”。它是值得这个名称的。

巴　金 1940年3月25日。

《面包与自由》后记

《面包与自由》的法文本原名"La Conquête du pain"，出版于一八九二年。在一九〇九年就有了幸德秋水的日文译本(《面包略取》，平民社版)。最早的中文节译本刊于二十年前。全译本的出版也是十三年前(一九二七)的事。我这次重译仍以我的旧译文作根据，不过参照英、法、德文本把它修改了一遍。(我在一九二五年翻译本书时，曾参考过幸德秋水的日译本，后来这书被人借去失落了，现在我手边有的是一九三〇年黑色战线社的新译本)。我另外还补译了德文本的序言。法文本的序言也是我新译的，旧译本中用的是震天兄的译文。至于俄文本的两序，在旧译本中有贾维兄的译文，这次我根据(其实只能说参照)小池英三的日译文改译了。我没有见到俄文原文，我恐怕我的译文里一定有错误的地方，只得留待将来的改正。这几篇序文中的注释都是我加上的。

《面包略取》这个名称，一般的中国读者都说不易了解。这次改译我便采用俄文译本的题名：《面包与自由》。这个名称是作者自己起的，而法文本的题名倒是作者的友人爱利赛·邵可侣代取的。

全书没有插图，这里附印的二十幅都是我搜集的，我在每

幅图版下面注明了它的出处。

索引是朱舜龢先生编制的。

译　者 1940年3月。

《一个家庭的戏剧》[①]前记

《一个家庭的戏剧》是赫尔岑的《回忆录》的第三篇，在一八五八年写成，始终没有发表。只有几个亲密的友人读过作者的原稿。作者在一八七〇年去世，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开始A.布吕克勒尔写《俄国文学史》时，还说："难道作者的家属会使我们永远见不到娜达丽的历史的这一部分吗？"许多人都以为没有见到它的机会了。

后来在一九二一年，作者的《我的过去与思想》的俄文完全本在柏林出版，居然出乎我们意外地将这一部分收在里面。接着四年以后英译完全本又在伦敦出版。我们现在可以见到这篇用血和泪写成的"家庭的戏剧"了。

我早就发愿要把这本小书翻译出来（自然是根据英译本），不过这是一件超过我的力量的工作。我没有作者那样的学力和文笔，我不配介绍他的著作，况且这又是一个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passionate emotion.（这是我妄加的不适当的评语，也许可以译作激情之心理的研究。）或者用作者自己的话，这是一个"心理病理学的故事"。现在我竟然不量力

① 《一个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一九四〇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地勉强完成了这个工作。我希望这个不成功的尝试还能够把原作的精神多少保留一点。

巴　金 1940年春。

《叛逆者之歌》[1]前记

这十二首革命者的和关于革命者的诗歌是我十几年来的一点小小成绩。其中有发表过的，也有未发表的。我的译文虽然拙劣，但原作确实是血和泪的结晶。它们感动过我，我也希望别人受到感动，所以大胆把它们编成小册交给书局印行了。《伏尔加的岩石上》是十一年前（一九二八年）的译文。中滨铁的诗则是最近翻译的。

1939年冬，上海。

① 《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收诗十二首：《凡尔加的岩石上》、《凡尔加，凡尔加》、《寄西伯利亚的音信》、《答普式庚》、《断头台上》、《献给苏菲·巴尔亭娜》、《吕西·德木南》、《劳动歌》、《忆古田大次郎》、《遗言》、《门槛》、《给裁判官》。一九四〇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凡尔加的岩石上》、《凡尔加凡尔加》译者附记*

这两首都是俄国民歌。拉进(Stenka Rasin)是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的英雄。他以"土地与自由"号召，得农民的拥护，声势非常浩大，后兵败被擒，于一六七〇年六月在莫斯科受车裂之刑。关于拉进的传说甚多，但大半都是难令人相信的。他曾经率领舰队侵波斯海岸，大败波斯军队，虏掠了波斯公主，所以民间有他将波斯公主投入凡尔加河的传说，非尔加是他的一个同伴。

---

* 本篇及以下六篇"译者附记"，均收入一九四〇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叛逆者之歌》。

《寄西伯利亚的音信》、《答普式庚》译者附记

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暴动，是俄国一部分有智识者为国民争自由的运动。十二月党的革命家是民主主义者。他们不肯参加新皇尼古拉一世的宣誓礼，在圣彼得堡圣伊沙克广场实行暴动，企图建立共和政府。事败，五个领袖（派斯台尔与诗人芮奈叶夫两人是五个高贵的死者中最杰出的人物）受了绞刑，其余的同谋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他们在冰天雪地上的生活感动了不少的人。诗人普式庚受了这种殉道精神的感动，写过一首诗寄给他们。他们也写了一首答诗。

《献给苏菲·巴尔亭娜》译者附记

Sofia Bardina (1853—1883) 是俄国女革命家。她曾游学瑞士，回国后抛弃小姐的身分，到工厂去做一个普通工人，后来被捕，在监狱里住了两年，才于一八七七年二月受审判，被告共有五十人，罪名是同样的，宣传革命思想。这就是所谓五十人案件。巴尔亭娜是“五十人案件”中最激烈的被告，在法庭上发表过一篇惊人的演说，因此被判决在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九年。波龙斯基(1820—1893)是当时的俄国诗人。

《吕西·德木南》译者附记

这诗从德热沙而的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诗集中译出。吕西（Lucile）是加米·德木南（Camille Desmoulins）的妻子。加米曾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中的宠儿，他是山岳党中的右派，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与友人丹东等同上断头台。吕西因图谋劫狱营救加米的罪名被捕，在她的丈夫死后一星期上断头台。她只有二十三岁。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经拿莎士比亚的名剧《韩姆列特》中女主角阿菲利亚来比她，称她做“革命的阿菲利亚”。

《忆古田大次郎》(断片)译者附记

这是日本安那其主义者中滨铁在大阪监狱中作的忆他的同志古田大次郎的长诗。原诗共有二百四十余行，被检查员删去多处，不易理解，我现在摘译出以上的一部分。古田大次郎便是《死之忏悔》(有伯峰的节译本)的作者。他和中滨铁同是所谓“大阪事件”的主要人物，都因这事件被判处死刑。(关于“大阪事件”，《死之忏悔》中有诚实而详细的叙述)。不过古田又参加为大杉荣复仇谋刺福田大将的事件，在东京被捕受审，所以较中滨先处死刑。中滨的诗作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古田于九月十四日听到死刑的宣告，十月十五日午前八时二十五分上绞刑台。第二天中滨在大阪监狱中发出如下的吊电：

菊花一朵
在断头台上微笑
远远地闻到黑的香
我问候遗族

一九二五，一〇，一五晨的歌(铁)

中滨铁于六个月后，即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在大阪监

狱中受绞刑。留下的著作已经出版的有创作集《黑面包》，忆古田的长诗便收在《黑面包》第一辑中。据说还有《黑微笑》，《铁之墓》等诗集，是中滨铁在狱中就编好了的，我未见到，似乎并没有出版。

《遗言》译者附记

柏尔森司(1848—1887)是美国的安那其主义者，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 Haymarket 发生炸弹事件。柏尔森司是当日群众大会的一个演讲人，因此被法庭悬赏五千元通缉。后于六月二十一日到法庭自首。第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同志司柏司(A. Spies)、斐失儿(A. Fischer)、恩格尔(G. Engel)同受绞刑。一八九三年伊里诺斯州新州长就职，重查此案，发见真相，遂发出理由书，宣告法官枉法，并替柏尔森司等洗去罪名。这是柏尔森司上绞刑台前数小时内写成的诗，这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的遗言。

《给裁判官》译者附记

这诗的作者是一个年轻的俄国女郎（姓名不详），她因革命活动的嫌疑被捕，做了一八七七年“五十人案件”中的一个被告。她在监狱中待审的长时间里，受尽了种种的苦楚，她当时写了一首散文诗送给裁判官。后来不久她就因肺病逝世了。

《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1]前记

《伦理学》是克鲁泡特金的遗著，也是这个伟大的科学家和革命者毕生的科学的、哲学的和社会学的见解之节要。这是一部美丽的、不朽的杰作，但是死亡阻止了著者来把它完成。现在出版的《伦理学》只是这部大著的第一卷（所以我们称它为：《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至于那更重要的第二卷，著者却只给我们留下了几篇论文和草稿。这对于我们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克鲁泡特金早在一八八〇年就开始研究道德的问题了。从一八九〇年起他在这个问题上面用的功夫更多。像《正义与道德》的讲演（1890），《安那其主义的道德》的小册（1891），在《十九世纪》杂志上连载的关于互助的论文（1891—1894，即后来的《互助论》），都是他的在这一方面的光辉的成绩。我们如果把《伦理学》比作一所大厦，则《正义与道德》、《安那其主义的道德》、《互助论》便是几块基石。其实在一个意义上说，《伦理学》还是《互助论》的续篇，《伦理学》的前四章完全是《互助论》中的主要思想之重述，或者更恰当一点说，《互助论》中

① 《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即《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一九四　年六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

的主要思想之发展而已。正如著者自己所说，《互助论》是偏于博物学一方面，而《伦理学》则是偏于道德哲学一方面。

克鲁泡特金在《伦理学》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人类的道德概念从什么地方来？二、道德命令与其标准的目的是什么？在这第一卷中他只给我们解答了第一个问题，他说明了道德的起原和发展。至于说明伦理学(实在论的)的基础与目的的一部分，因为第二卷的遗稿至今未能整理出版，我们一时也就无法见到那些应该是光辉灿烂的论文的内容了。不过这一部分中的主要思想却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克鲁泡特金和达尔文一样，在社会本能(人类和动物所固有的社会性的感情)中找出道德的起原，但是他更进一步地构成了他的道德的发展的三部曲，或者三个连续的阶段：互助(社会本能)、正义、与大量(自己牺牲)。这是道德的三要素。第三个要素是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是人类所专有的，只有它，才可以真正被称为道德。

克鲁泡特金称他的伦理学体系为实在论的、自然主义的伦理学。他排斥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他不相信所谓上天的启示。他只在自然界中找寻道德的起原；他在社会的进步与民众的解放中见到个人人格的发展。

我们研究道德学说的发展，可以把过去的伦理学家大体分类为两大派：一派是功利论者，他们在社会的和个人的利害的打算(功用之考量)中看出了伦理感情之起原；另一派是直观派，把道德当作本有的，固有的神秘力。前者以追求快乐(或福祉)为一切人类行为之原动力，后者则将伦理学与宗教连结在一起。前者至小弥尔而完成，后者到康德而达于极致。

克鲁泡特金则在这两派之外，他一方面继续着培根、达尔文、蒲鲁东、居友诸人的努力，一方面又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他的实在论的伦理学的确有一个新的光辉的面目。他把社会主义视作伦理学说的一部分。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正义之概念是与平等之概念连结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他的伦理学是和他的自由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连结在一起的。他的社会主义的原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的伦理的公式便是"无平等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

克鲁泡特金并不把他的《伦理学》视作他个人的独特的成就，犹如他不把互助视为他自己的发见。他谦虚地说，他来替巴枯宁所企图创造的伦理学做一点预备基石的工作。我们知道巴枯宁在巴黎公社失败，蛰居在洛加诺的时候，就感到创造新伦理学的必要。甚至在他临死前十天他在伯勒还对友人赖黑尔(A,Reichel)说，"现今各国人民都失掉了革命的本能。他们深以现状为满足，那个恐怕连现在已有的东西还会失去这样的恐惧，使他们不敢多事，并且深染着惰性了。假使我的身体稍微好一点，我要来写一部伦理学，这个伦理学是基础在'集产主义①的原理上面的，完全不要哲学的或宗教的用语。"

不幸巴枯宁带着他的《伦理学》死去了，使我们无法来考察他的《伦理学》的内容。不过我们知道另一个伟大的安那其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的友人，克鲁泡特金的先辈)早在一八四〇年就奠定了新的实在论的伦理学的基础，并且在社会性

① 集产主义：即安那其主义，并非维达与柏格尔诸人的集产主义。

(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中看出了道德意识之起原，建立了道德的发展之三个阶段了。

蒲鲁东在《财产是什么》中提出了一个从没有人提过的问题："人类的道德意识与动物的道德意识间之差异是种类上的差异抑或是程度上的差异呢?"他的答复是"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他将社会性(我想这里也可以用道德这个名词)分为三个阶段：一、同情；二、正义；三、大量。前两个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阶段才是动物所不能够达到的。

这样的伦理学体系不是和克鲁泡特金根据数十年中间科学的、哲学的、与社会学的研究所苦心建立起来的伦理学体系相同么?

巴枯宁在某一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蒲鲁东的继承者，他的伦理思想中一定有着蒲鲁东的影响。而且我们如果把巴枯宁的学说研究一下，我们便可以断言他的伦理学一定也是实在论的，在本质上不会和蒲鲁东与克鲁泡特金的不同。我们看下面一段从巴枯宁的著作中引出的话，就知道了：

> 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他的同胞的价值，不与他们合作，不在他们的中间去实现他自身的发展，那么他便不能够认识他自身的人的价值，也就不能够实现他的完全的发展了。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使他的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因为如果我的自由与我的权利不在与我同等的万人的自由与权利中，去找寻它们的证实与认可，则我不仅在思想中，而且

在行为中，都不是真正自由的。

由此我们更可断定巴枯宁所企图著述的《伦理学》的任务也是在鼓舞人去为真理与正义奋斗，这种奋斗不是个人的，而是与同胞联合在一起的共同行动。

克鲁泡特金便继承着巴枯宁的志愿，来从事伦理学之创造的工作。据他的友人莱伯代甫说，他也是想拿他的《伦理学》"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深植在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己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着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

这样的《伦理学》，在各时代中，特别在现在，都是必要的。克鲁泡特金以他毕生所积蓄的一切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以他的广博的学识，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筑了伦理学的大厦，虽然生命的界限阻止了他，没有把这所大厦造完，然而栋梁及主要的部分却已造成了，因此这所伦理学的大厦也得以确定地立在科学的宫殿之中。

对于那般想用他们的力量来做一点有利于他们的同胞的事业而又找不到道路的人，我愿意把这部《伦理学》介绍给他们。这一部书会给他们开辟新的道路。同时我还希望他们记着克鲁泡特金的好友爱利赛·邵可侣在他的《大地理》第十九卷序言中写的一段话，实在，把克鲁泡特金的书中主要思想之一表现得如此优美如此诗化的，再没有能够超过这段话的了：

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我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我自己的国土里一样，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间一样。我从不曾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只有那个对于在一个大的祖国内所有居民的尊重与同情之感情，才可以支配着我。我们的地球这样迅速地在空间旋转，好像大无穷中的一颗砂粒，难道在这个圆球上面，我们还值得花费时间来彼此相恨么？

巴　金 1940年6月24日。

《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后记*

《伦理学》原著为俄文。我是根据英、法、日、德、世界语、西班牙六种译本重译的。这六种译本可以分为三类：英译本列入一类；西班牙译本一类；其他三种译本可另列入一类。英译本是经过英译者修正，而且原著前三章本是将从前发表过的英文论文修改而成，英译者便大半采用论文的原文，只将克鲁泡特金自己后来编入俄文本时修改了的地方照改几处，不重要的地方也就没有改。英译者又加入了许多注释；因此英译本有许多地方便和其他译本不同。日译本我见到的共有四种：内山贤次的，安倍浩的，八太舟三的，和平林初之辅与时国理一的；这都是根据英译本重译的，只将英译者加入的解释删去了一小部分而已。法、德、世界语三种译本内容相差不多（法本译比较和西班牙文译本相近）。西班牙文译本经过译者的细心校正和整理，内容比较更完善，而且在分章上的确比其他各本好。

俄文原著是在克鲁泡特金死后付印的，著者来不及校阅原稿（甚至没有功夫把它写完），因此原著内不免有一些错误，

---

* 本篇系据《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例言改写。

其他各种译本，有的改了一些错误，有的又加上错误。法文本第七一页，第一五行以下，落去一段；第七二页，第三行，将“黑龙江”误作“Américains”。世界语本只有前六章，其中也有错误：如一五六页，第七行以下：“Samkiel Platono, li opiniis ke la fonto de la ‘raciokaj movado en la mondo’ne intervenis en la mondvivon”，著者的原意是“他和柏拉图一样，也以为理性的泉源乃是神性，然而这个神性虽是宇宙中的运动及理性之泉源，它却并不来干涉宇宙的生活。”英译本比较完备，但也不免有错：如七三页，第一行“rights”（权利）乃“rites”（祭仪）之误；一二五页的脚注中也落掉一行；又二四九页，第二六行中的 help them 两字也应该删去。德译本也有错落处，如第二五一页末及二五二页开始的中间就落去了两大段。西班牙译本为了使译文简洁明白起见，往往把形容的辞句任意删去。日译本的错处更多。如内山贤次的译本中，把“propriety”（礼让）误作“property”（财产）；“antipathies”（嫌恨）译作“友情”（四五页）；“parricide”（弑父母）译作“兄弟杀害”……等。各本中还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即一部分古代思想家的生卒年的错误，这我已根据数种百科全书与字典、辞典校正了。

各本脚注一律保存；为便利读者起见，我另加了一些脚注。

分章法完全依据西班牙译本。每章细目为俄文本编者莱伯代甫所拟，我有时亦依照西班牙译本改过。

各本序言一律译出。德译本没有序言；日译本序，为避免

也复起见，未译。

固有名词的译音，力求与通行者相合，哲学术语大概依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辞典》。

原书中凡表主要意义或当做固有名词用的普通名词，第一字母都用大写。又原书中要给读者以特别印象的字句便用斜体字排印。在这些处所译文在字句下面，一律加排黑点。

译者相信翻译本书时所负的责任，是在忠实地解释我们的大师的思想。不过译者知识浅陋，对欧西文字缺乏精深研究，这又是十年前(1928—1929)的译文，此次虽加修改，但因时间匆促不能从容构思，将旧译文中晦涩之处，改译作明畅的词句，并且连旧译文中错误的地方恐怕也没有能全部改正。这是应该请求读者诸君原谅的。

附录一篇是译者十年前旧作，不过现在也是经过了修改和增补的。

索引是陆圣泉先生代做的。封面的著者的小像则是啸尘先生的胶刻。

译　者 1940 年6月18日。

《父与子》[1]后记

七年前我与陆蠡、丽尼两位相约翻译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当时讲定每人担任两部。我选了《父与子》同《处女地》。他们都早交卷了。我的却没有消息。友人们知道我这些年来过着忙乱的生活，他们始终没有催逼过我。但是我还不曾把责任心完全失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赎罪的机会，我把《父与子》译出来了。不管我的译笔是如何草率，拙劣，但我毕竟交了一次卷了。

我过去搜集了好几种《父与子》的本子，我记得除柏林版原文外，有英译本三种，法译本一种，世界语译本一种，日译本一种。可是这些都不在我身边。我现在翻译所根据的本子就只有 Constance Garnett 夫人的英译本，还是一个重庆的朋友替我借来的。后来又承素琤女士送了我一本一九三六年列宁格勒版的《屠格涅夫选集》，使我得以参照原文解决一些疑难。对这两位友人的好意，我十分感谢。

又翻译本书时我曾参看陈西滢先生的中译本，借用了他的六七条脚注。特别在这里声明一句，并表示谢意。

---

① 《父与子》，屠格涅夫著。一九四三年七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我的译文里用了一个“您”字，这在丽尼译的《贵族之家》与《前夜》中也有的。不过我的用法跟他的略有不同（自然他是依照北平话的习惯的）。凡是原文对白中用 вы 字的，我一律译作“您”，这自然是多少带点客气的称呼；反之，亲密的和不客气的称呼 ты，我都译做“你”，因此在我的译文里巴扎洛夫唤他的父母时也用“你”，不用“您”了。

巴　金 1943 年 3 月。

《迟开的蔷薇》[1]后记

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斯托姆(Theodor Storm, 1817—1888)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蜂湖》的中译本(即郭沫若先生译的《茵梦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里读过的。

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大前年在上海时我买过一部他的全集。我非常宝贵它，我有空就拿出它来翻读。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把德文念好，可是为了学着读德文书，我也曾翻译过几篇斯托姆的小说。

今年在朋友处借到一本斯托姆的《夏日的故事》，晚间写文章写倦了时，便拿出来随意朗读，有时也动笔翻译几段，过了几个月居然把里面的《蜂湖》译完了，此外还译了几篇较短的作品。

现在选出《蜂湖》等三篇来，编成一本小小的集子。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

1943年9月。

---

1) 《迟开的蔷薇》：斯托姆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处女地》[1]前记

《处女地》发表于一八七六年，是屠格涅夫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七年以后，一八八三年他就在巴黎病故了。这是他留给俄国青年的遗嘱。可是跟《父与子》一样，这本《处女地》也给他招来了不少的非难和误解。对于这个我想留到将来再说。

我这次翻译《处女地》，是根据一九二九年万人丛书版同一九〇六年屠格涅夫小说集版(嘉尔纳特夫人所译)两种英译本重译的。我手边没有俄文原著，因此在这两种译本中遇到字句间相差较大的地方，便只好依照己意决定取舍，或从万人丛书本或从嘉尔纳特夫人译本。像这样的处所是不少的，我有时附加一二脚注来说明，也不过是举例的意思。

巴　金 1943年11月。

---

① 《处女地》，屠格涅夫著。一九四四年六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处女地》后记

今天校完了《处女地》的最后一章，我觉得心里很轻松。几年来的心愿了却了。不过这工作仍旧做得很草率。我从前为了翻译这本书搜集的许多材料，都没有能够带进内地来，现在连一本俄文原书也找不到。书店方面会登广告宣传这是"名著名译"，其实那只是广告，让我自己老实说来，这不过是"草率的试译"罢了。

但名著毕竟是名著，连我这笨拙的译笔，也没有掩盖屠格涅夫的光芒。虽然有人说屠格涅夫的书在这时候不应该被人广读，因为里面带了太浓的感伤调子。我还是诚恳地劝人多读它们，尤其是这本书，因为它并不带有感伤的调子，并且，它让我们看见了希望。

又，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参看过郭鼎堂先生根据德文译本转译的《新时代》。这个译本给了我一点帮助，我应当在这儿表示谢意。

巴　金 1944年4月10日。

《马尔蔑那多夫的故事》后记*

以上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朵思托也夫斯基名著《罪与罚》的第二章。《时与潮文艺》编者来信索稿时，我正在试译《罪与罚》，觉得这第二章勉强可以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单独发表，就抽出来寄给编者了。作者的生平我不想在这里介绍。至于他的作品读过的人也不少。好些人谈过他的作品的特色。我只想提出“抹布里的灵魂”这句老话。作者掘发人性，深刻到极点，所以他能够在“娼妓”，“小偷”，“酒鬼”等等被人践踏的所谓“下等人”中间找出优美的人性，就像他在湿漉漉的抹布缝里看到发光的灵魂一样。马尔蔑那多夫的自白是作者小说中最激动人心魂，最被人熟读的一章，可惜拙劣的译笔无法传达原著的精神。读者不要以为这里就是朵思托也夫斯基的真面目，我比他不知低了多少倍。要是有功夫，还是请你们直接读他的原作。我这译文倘能引起你去读他的原作的兴致，那么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时与潮文艺》第四卷第五期。

《散文诗》[1]后记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在东京开始试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当时颇想在半年内完成这件小小的工作。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只译出十首就搁了笔，现在回想起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办应该是一个原因。但这并非说我是文化生活社的创办人。不是。我回国时文化生活社的第三本书已经在排印中了。我是受了文林兄那种苦干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的感动，才决心参加他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说"吃力不讨好"，并非菲薄这种工作，只是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人做来，它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在别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一经"参加"之后（虽说我只是一个赞助人），我的脚就给绊住了。我自己的许多工作也就被搁下来。那么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的试译也应是其中之一。我想离开文化生活社，可是文林兄总是这样说：等它有了牢固的基础后，我和你一块儿离开吧。

十年流矢般地过去了。我没有能够摆脱文化生活社的事情。而文化生活社也始终没有打好一个牢固的基础。而这其

---

① 《散文诗》，屠格涅夫著。一九四五年五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间，我们的国土遭受到敌骑的蹂躏。在抗战中文化生活社尽过它微弱的力量，也遭受过不小的损失。①可是它仍然存在，虽然不健康，但它毕竟活到十年了。这十年虽然飞如流矢，却也过得不易啊！为了庆祝它这十年的生日，我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我非但两手空空，而且"心贫"。我只好求助于屠格涅夫，向他借一份礼品。他不会拒绝我。花去三个星期，我译完了他的散文诗。我借用他的一句话送给这十岁的孩子：我们要继续奋斗！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最初在《欧洲的使者》上发表时共五十首。总名原是 Sanilia 一个老人的手记。Sanilia 一字是拉丁文，有着"衰老"的意思。后来《欧洲的使者》的编辑 Stasulivitch 得到作者的同意改用了《散文诗》的题名，沿用至今，本名反为人忘却了。

原文果如 Stasulivitch 所说，是散文诗。可是经我译出却成了笨拙的短文，诗的情味恐怕已经被我丢光了。我无颜妄称翻译，只敢在这里用"试译"二字。

《门槛》一首，据说是为革命者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写的，没有收在第一次发表的《散文诗》内，后来也不曾收入全集，在英译本屠氏全集中始终未见这诗。但一九二〇年柏林版俄文全集第八卷散文诗里却收得有《门槛》。我便是根据这个版本

---

① 在广州、在金华、在桂林，十万册以上的书烧毁在敌人的大火里。在上海，一个友人同着两卡车的书被带进虹口敌人的宪兵司令部，至今下落不明。

翻译它的。其余的五十首除了八九篇外，全是根据 C.Garnett 夫人的英译文转译的。

1945 年 3 月。

《最后的会晤》一首追写作者和垂死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最后会晤的情景。

《某某》是献给作者的女友 P. 维亚多夫人的颂歌。

《老妇》则是作者梦景的真实的叙述。

1947 年再记。

《快乐王子集》[1]后记

二十年前我起过翻译英国诗人奥斯加·王尔德(1854—1900)的童话(或译仙话)的念头。可是我始终不敢动笔。他那美丽完整的文体,尤其是他那富于音乐性的调子,我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他有着丰丽的辞藻,而我自己用的字汇却是多么贫弱。

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却开始做起这种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来。时间是三月中旬,地点是广西省的河池。我想大约是我在旅途中只带了一本王尔德的童话集,在等候客车的长日里,觉得无聊,译书消遣,也未可知。在我当时写的《旅途杂记》中曾有过这样的话:

> 在这里我睡得早,早晨常常沿着公路散步,再转到田畔山脚,去听绿树上群鸟的歌唱。散步回家,在旅舍的小屋内,因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坐在窗前译了一篇王尔德的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

那一年里我还在重庆翻译了《快乐王子》,在成都翻译了

① 《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夜莺与蔷薇》。然而我不满意自己的译文，我失了勇气。于是我把原书搁回在书架上，不去动它。一九四四年湘桂战争中桂林的大火烧毁了我的住处，两个竹书架上的书也完全化作灰烬了。

到了一九四六年正月，为了给上海朋友们办的《少年读物》月刊寄稿，我想起王尔德的童话来，决定在重庆继续那个中断已久的翻译工作，仍旧根据美国出版的《现代丛书》本，原书是我一个弟弟代我向他的朋友借来的，我每月翻译一篇寄到上海去。这一年内我居然译了五篇，王尔德的全部童话中没有译出的就只剩《打鱼人和他的灵魂》一篇了。

今年五月我开始翻译这一篇王尔德的最长的童话，到九月完成。十月我译完他的六首"散文诗"，和最后的一篇可以称为散文诗的"小故事"。这样我编好了王尔德选集的第一册《快乐王子集》。第二册将是《狱中记》，包含两篇较长的作品，"De Profundis"和"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这是我喜欢的两篇文章。①

说到王尔德的童话，我们都知道他一共写了九篇，分两次出版，第一册叫做《快乐王子和别的故事》，一八八八年出版，共收《快乐王子》、《夜莺与蔷薇》、《自私的巨人》、《忠实的朋友》和《了不起的火箭》五篇；第二册叫《石榴之家》，一八九一年出版，收《少年国王》、《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打鱼人和他的灵魂》、《星孩》四篇。《现代丛书》本的《王尔德童话集》（附散文

---

① 第二册未译出。

诗）则将九篇童话合印一册，而把《石榴之家》中的四篇放在前面。我是根据《现代丛书》本翻译的，所以排列次序也依照那个版本。Franz Blei 和 Felix Paul Greve 两人的德文译本也是照这次序排列的，并且有 Heinrich Vogeler Worpswede 的插图。此外我还有一种 Hanns Heinz Ewers 的德文译本，童话部分少了一篇《了不起的火箭》，排列次序也和有插图的那本不同，这倒是依照出版的先后排列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不是王尔德童话的适当的翻译者，我的译文只能说是试译稿。但他的原著却是很成功的作品。许多人都认为它们是他最好的，最有特色的散文著作。R.H.谢拉尔德说："在英文中找不出来能够跟它们相比的童话。写作非常巧妙，故事依着一种稀有的丰富的想象发展；它们读起来（或者讲起来）叫小孩和成人都感到兴趣，而同时它们中间贯穿着一种微妙的哲学，一种对社会的控诉，一种为着无产者的呼吁，这使得《快乐王子》和《石榴之家》成了控诉现社会制度的两张真正的公诉状。"（《王尔德传》，一九〇六年）L.C.英格列比第一次读到《快乐王子》时曾说："……这第一个故事就使我觉得王尔德还有一颗小孩子的心。"他称赞这些童话"表现得精妙绝伦，丰富的想象给每篇故事都装饰了珠玉。作者有驾驭文字的能力，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熟思以后写出来的，但同时却有自发的动人力量。"（英格列比：《王尔德论》）

《石榴之家》的初版是献给作者的妻子康斯坦司·玛利·王尔德的。作者坦白地称这一册小书为一卷"美丽的故事"。他后来曾对人表示他喜欢这个集子里的《少年国王》。又有一

次他说，在文体上他觉得《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是他的最好的故事(H.皮尔生的《王尔德的生平和机智》)。但这些美丽的故事同时也是“对于现社会制度的严正的控诉”(《王尔德论》)。英格列比还说，“当王尔德把《石榴之家》献给他妻子的时候，他那对于美的爱和对于人类的爱还是并行不悖的。”

单从这一册童话和散文诗集看来，我们也可以知道王尔德一生所爱的东西只有两样：美与人类。因此我也同意亨特生的话：“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丽的社会的哀怜，恰如几幅锦绣镶嵌的织物，用一根深红的线牢牢地缀成一帖”(《人生与现代精神的解释者》)。

1947年11月。

《笑》[1]前记

收在这本小书内的四篇译文都是我的试译。《笑》和《白痴》两篇是今年初冬翻译的，《木星的人神》与《加斯多尔之死》则是十六七年前的旧译。我在各篇译文的前面都补写了短短的说明，因此觉得没有在这里饶舌的必要了。

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想提一提，《木星的人神》一篇并不是我自己选译的。当时我替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爱罗先珂童话集第二集（即《幸福的船》）。发见爱罗先珂的全部童话和小品中就只差了《木星的人神》一篇没有被译过，我便不量力地把它译出了。这篇童话在爱罗先珂的作品中并不是最好的。我喜欢的倒是《狭的笼》、《雕的心》、《幸福的船》等，它们给我（还有和我同时代的青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为了说明这个，我现在把我在十七年前为《幸福的船》写的序作为附录印在这本小书的最后，加上一个题目《关于爱罗先珂》。

① 《笑》：奈米洛夫等著。内收《笑》、《白痴》、《加斯多尔的死》、《木星的人神》四篇。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笑》译者附记*

Dobri Nemirov(1882—)，是保加利亚的小说家，作品甚多，短篇集有《故事集》、《新的日子》等；长篇小说有《噩梦》、《奴隶》、《贫穷的路加》等，还有儿童剧数种。本篇是从 I. H. Krestanov 编选的世界语本《保加利亚文选》中译出的，原名 "Rido"。

---

* 本篇及以下三篇"译者附记"均收入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笑》。

《白痴》译者附记

A. Kuprin (1870—1938) 是侨居巴黎的俄国写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以《决斗》(1905) 与《亚玛妓院》(1909—1915)两书为最著名。中篇小说《女巫》也是一本销行很广的书。这篇《白痴》是从他的短篇集《一个斯拉夫的灵魂》(英译本)中译出的，原名"The Idiot"。

《加斯多尔的死》译者附记

I.A.L.Bratescu-Voinesti是罗马尼亚的小说家。他生于一八六八年，现在是否活着我却不知道了。他的著作颇多，有小说集、散文集等，最著名的是《光明与黑暗》、《在真理的世界中》，他在一九二五年得了罗马尼亚文学院的奖金。本篇被译成世界语，发表于十几年前在英国或澳洲刊行的某世界语杂志，我便是从那杂志中译出的。译文曾在朋友们办的某同人杂志中刊出。最近我居然在旧书堆中找到了一份剪报。但世界语原文我却无法找到了，并且连那本世界语杂志叫什么名字我也无从记起。我只记得本篇原名“La Morto de Kastor”。

《木星的人神》译者附记

这篇童话是从苏联盲诗人瓦西理·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的童话集《夜明前之歌》中译出的。原名《木星之人间神》。作者在一九二一年到过中国，在上海、北平等地方都住过些时候。原作是用日文写的，他在日本有过较长时间的居留。但这书出版的时候，作者已经被日本东京警察当局放逐到中国来了。他在东京淀桥警察署中口述的本书的自序中，有着“……和《木星的人神》是作为我的微笑写出来的。这是悲哀的微笑，然而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度(指日本)里是不能够有光明的微笑的。”

爱罗先珂在中国没有住了多久就回到他的故乡去了。听说他还活着，在他的祖国内一所乡间的盲人学校里教书，兴致好的时候，还去北冰洋一带探险呢，但这已经是十六年前传来的消息了。

《狱中二十年》[1]后记

一九二七年我曾发愿要把俄国革命者薇娜·妃格念尔(Vera Figner)的《回忆录》全部译成中文。那时我曾在一本书里写下这样的话："实在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女人的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现在，虽然是在写了那样的话的二十年以后，但我终于把《狱中二十年》的译稿交出去了。这是《回忆录》的第二卷，它还有一个名字：《生命的钟停了的时候》。第一卷还在翻译中。第一卷，依据德译本叫做《不自由毋宁死》；依据英译本叫做《一件完成了的工作》。我决定给它换上一个题名：《俄罗斯的暗夜》，那是德译本的《回忆录》的总名，原文是《笼罩着俄罗斯的夜》。

德译本《回忆录》的第二卷中共有三十章。英译本比较德译本少了七章，但另外加了一章，所以英译本的第二卷只有二十四章。不过我在英译本中也发见了不少被德译者删去的

---

* 《狱中二十年》：薇娜·妃格念尔著《回忆录》之二，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句子。

第二卷是作者的《狱中记》。作者在一八八三年初被捕，到一九〇四年十月出狱，她一共在监狱里住了二十二年。然而她的《狱中记》却只是她在席吕塞尔堡中的生活记录。她是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被押送到席吕塞尔堡要塞里去的，到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离开要塞（从那儿她又被送到彼得保罗要塞中去，关了些时日），刚巧是二十年。

作者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团体民意社的老将。她参加了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因而被捕判刑。关于这一切详情以及作者的家庭环境和她三十岁以前的经历，在《回忆录》的第一卷中均有详细的叙述。

关于作者妃格念尔，她的友人N.米海罗夫斯基（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曾经说过如下的赞美的话：

> 她所放射出来而且如此吸引着她周围的人们的魔力与动人处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这不容易说出来。她自然又聪明，又美丽。但是她岂只聪明而已。至于美丽，那是革命团体中所不大注意的。可是此外她又没有别的特殊才能。她之所以动人在于她整个身心是十分谐和，十分一致，她的一言一动都表现着她的整个自我，疑惑与犹豫是她所不知道的。通常这类的人总是非常刻苦、十分严肃的，然而她完全不是这样。刚相反，当党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她便很活泼，很爱戏谑，就像一个小女

孩似的。

她生于一八五二年六月，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病故，逝世前曾在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博物馆里担任职务。

1943年9月。

《浮士德的路》附记*

这是德国革命者R.洛克尔(1873—)的小书《六个人物》的第一章。六个都是世界文学中的著名人物。第二个是董·绶,他刚和浮士德相反,认为生命的意义是绝对不能探求,不能理解的,人只应该享受生活;他认为知识是不能得到的,即使得到也是无用。只有快乐才是真实的,甜蜜的。他这样做过了,結果,他对自己说:"一曲送葬乐引一个死人进入坟墓。我觉得这像是我的出丧。我在跟着我的棺材走——"最后的一章是《觉醒》。斯芬克司的谜终于解答了。她倒了,沙漠变成了沃土,她原先在的地方现在长出了美丽的蓝花来。

附带声明:最近一期的《人生杂志》中刊载了我的一篇《做人无秘诀》,那是我五年前的旧作。原来题目是《谈做人及其他》,在一九四四年桂林版的《人世间》新一期上发表。后来上海《侨声报》"青年学习"副刊转载过一次。这次《人生杂志》转载它、把题目都改了,似乎不大好。我并不反对谁转载我这篇未收集的短文,但我认为该刊应该声明,并非我直接投稿,更非一稿数投。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文艺春秋》第八卷第二期。

《六人》[1]后记

一

看完《六人》的校样，我坦白地承认这是一件失败的工作。我用了“试译”二字，也只是表明我没有翻译这书的能力。从这译稿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我缺乏驾驭文字的才能，我没有能够忠实地表达原意，也没有能够传达原文的音乐美。本书的英译者蔡斯教授(Ray E. Chase)说“我觉得《六人》是一曲伟大的交响乐”。但中译本的读者一定不会有同感的。错在我身上。

三年前开始翻译这书，工作时断时续，到今年五月才译完最后的一章。这本小书的翻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事实上我执笔的时候并不多。我的时间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有那些书，和那些书的著译者和读者给我作证。）想不到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两三个自以为很了解我的朋友这三年中间就因为它不断地攻击

---

[1] 《六人》，鲁多夫·洛克尔著。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我，麻烦我，剥夺我的有限的时间，甚至在外面造谣中伤我，说我企图霸占书店。我追求公道，我举事实为自己辩护，我用工作为自己伸冤。然而在那些朋友中间我始终得不着公道，始终争不到一个是非。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在这种朋友的长期的折磨中进行着的。我无法摆脱那些纠缠，我甚至不能用常理为自己辩护，那时心情的恶劣是可以想见的。但我至今没有倒下来，至今还能够工作，那是因为除了这几位朋友外，我还有着许多别的朋友，而且也因为我相信我的工作。我从来不曾为自己的工作骄傲过。但我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完全否定。好些年来我对任何人都一直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或一个翻译家，我只是在学习，学习写作，学习翻译。在学习中有进步的时候，也有停滞不进步的时候。这次工作的失败，一部分的原因自然是那些朋友的纠缠所造成的恶劣心情。（他们甚至不让我有时间在发印前仔细地校阅我的译文。但是对读者，我除了告罪外，别无他话可说。）

译稿发印以后我去北平住了一个多月。我过了四十天的痛快日子，看见了许多新气象。我摆脱了三年来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的那种梦魇般的“友情”。因为我在北平得到了真正友爱的温暖。我写过一篇短文，里面有着这样的话：

> 我每次走进会场总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在六百多个面孔中至少有一半是我没有见过的，可是它们对我并不陌生。我看到的全是亲切、诚恳的脸。我仿佛活在自己的弟兄们中间一样。谈话，讨论，听报告，交换经验，

我不感到一点拘束。自由，坦白，没有丝毫的隔阂，好像六百多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心似的。

二

《六人》的作者洛克尔(Rudolf Rocker)，是一个德国的革命作家。希特勒执政后被放逐出国，一直没有回去过。他现在住在古巴，去年做过了七十五岁的生日。他写过不少的书，都是用德文或犹太文写的。(他虽然精通犹太文，却不是一个犹太人。)其中被译成英文的并不多。《六人》似乎是第一本，据英译者葆斯说，在洛克尔的著作中这是艺术性最高的一本。

这里的"六个人"都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主人公。浮士德，董·缓，哈姆雷特原是传说中的人物，后来歌德借用传说写了诗剧《浮士德》，莫里哀写了话剧《董·缓》，莎士比亚写了诗剧《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是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小说中的英雄。德国小说家霍夫曼创造了年轻和尚麦达尔都斯，冯·阿夫特尔丁根则是十八世纪德国名诗《歌人的战争》中的歌者。

在《六人》中洛克尔使这六个人复活了，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可是他却利用他们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说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

这本小书是作者根据他的几篇讲演稿写成的。据说他的听众中有许多工人，也有水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关在英国某集中营里面，在那里认识了不少德国的水手，他们跟

集中营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热烈地欢迎他的演讲。

我在前面引用过蔡斯的话："《六人》是一曲伟大的交响乐。"他的解释如下：

> 前面有一个介绍主题的序乐。构成交响乐的是六个乐章，每一个乐章最后都把主题重复了一遍，每一个乐章有它自己的音阶法和拍子。在主题的最末一次的重复之后接着就来一个欢欣的、和谐的终曲。对这种东西音乐家也许会给它一个适当的名称。我不会，我只知道我读完整个作品好像听了一次管弦乐队的大演奏。

译　者 1949 年 8 月。

《蒲宁与巴布林》[1]后记

这本小书是为着报答一个朋友的"友情"翻译的，只花了将近三个星期的功夫。

《蒲宁与巴布林》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一八七四年脱稿，发表在《欧洲导报》上，[2] 这是一篇半自传体的小说。彼嘉很像青年时期的屠格涅夫。祖母便是作者生母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的写照。斯巴司科叶的家园生活跟特洛伊茨基乡居生活也颇相似。跟彼嘉一样，屠格涅夫也在乡间认识了自然界，认识了诗。有一个仆人（一个年轻的农奴）是一个诗的爱好者，做了他的先生，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念赫拉斯科夫的《罗西亚达》；彼嘉也有过这样愉快的经验。但是跟彼嘉一样，屠格涅夫也开始认识了农奴制度的不合理，看见地主的专横和农奴生活的惨苦。后来他回到他的故乡，有一回他指着一扇窗户给他的朋友们看，一面说："这是我母亲在那儿坐着的窗户，是在夏天，那扇窗开着，我亲眼看见两个人在流放的前一天，垂着光头走来跟她辞行。"《猎人日记》的作者日后的辉

① 《蒲宁与巴布林》：屠格涅夫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② 见《欧洲导报》一八四七年第四期。

夫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是从斯巴司科叶开始的！

巴布林，据作者自己说，是“照着活人摹写的”。他和他的年轻朋友们的审判应该是一八四九年彼得拉雪夫斯基团的审判。作者把蒲宁写得非常出色。英国爱德华·加尔奈特甚至赞美说，理想主义者蒲宁这个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长的绘像相比。至于纯洁善良的穆莎和轻浮的贵公子塔尔霍夫，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俄国，倒是常常见到的了。

1949年11月30日。

《回忆契诃夫》[①]后记

这篇《回忆》是从法文译本转译的，法译者的姓名是 Dumesnil de Gramont。法译本中包含三篇《回忆》，书名"Trois Russes"。这三个俄国人便是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安德列叶夫。关于安德列叶夫的一篇已由汝龙先生译出刊行了。关于托尔斯泰的一篇，我不久便可以译完。现在先把这篇字数最少的《回忆》(三篇中字数最少的一篇)交给印刷局，希望能在今年年内跟读者见面，今年是契诃夫逝世四十五周年纪念，不过他死在夏天。

我翻译这篇《回忆》的时候曾参考过一种英文节译本，不是节译本，也许是从一种全译本中摘出的一些片段。我没有记得英译者的名字。但我觉得那译文是相当好的。

附录《契诃夫自传》是李健吾先生翻译的，我现在征得他的同意，把这篇美丽的译文放在拙译(的确是拙劣的)的卷末。让我在这儿谢谢他。

译　者 1949年12月。

---

① 《回忆契诃夫》，高尔基著。一九五〇年一月平明出版社出版。

《回忆托尔斯泰》[①]后记

这小书跟《回忆契诃夫》一样，也是从 Dumesnil de Gramont 的法文译本转译的。可是在我的译文的第一部分排峻送过清样以后，一个朋友从北京寄来了这书的英文译本。英译本是一九二〇年的第二版，由 S. S. Koteliansky 和 L. Woolf 两人翻译的。我拿英译本跟法译本对照读了一遍，发觉法文本在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之间漏排了一节，现在根据英文本，把它补译出来：

我问他："波兹尼谢夫[②]说着医生们已经害死了而且正在害着千千万万人的性命的时候，您是不是赞同他的意见呢？"

"您很想知道吗？"

"很想。"

"那么我就不告诉您。"

他微微笑了，一面玩弄着他的两根大拇指。

我想起来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里面，他把一个次等

① 《回忆托尔斯泰》，高尔基著。一九五〇年四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② 托尔斯泰著中篇小说《克来采长曲》中的男主人公。

的乡下兽医跟一个真正的医生比较了一下：

"像'基尔恰克'(giltchak)，'帕切其尼'(potchetchny)，'放血'这一类的字眼，① 它们不是恰恰跟'神经'、风湿症'、'有机体'等等一样的吗？"

而且这是在有了因勒尔②、白林③、巴斯德④之后写下来的。这是顽固了。

这个英译本虽然是"作者特许"的翻译本，但因为出版较早，无法将作者后来增补的笔记收入，所以在第一部分中除去那节关于医生的笔记本外，英译本反较法译本少了八节。又英译本中没有第三部分，《关于托尔斯泰夫人》的文章是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发表的。

本书第一部分是作者在一九〇〇年与一九〇一年中间随时写下的笔记。第二部分则是一九〇一年作者得到托尔斯泰离家和病故的消息以后写给一个朋友的信。第三部分大概写于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五年以前。作者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的话。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托尔斯泰夫妇间的悲剧。关于托尔斯泰夫人晚年的生活和她临死的情形，她的最小女儿亚历山德拉有一段文章，写得很明

① 次等兽医给马治病时常用的一些字眼。

② 因勒尔：(Edward Jenner, 1749—1823)，英国医生，牛痘接种法的发见者。

③ 白林：(Emil Von Behring, 1854—1917)，德国细菌学家。

④ 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法国化学家和细菌学家。

白而且很动人，我把它译出来，附印在这里：

我父亲死后，母亲大大地改变了。她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温和善良的老太婆了。她常常在一张大的圈手椅上迷迷糊糊地一连睡几个钟头，只有在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时，她才醒过来。她会叹息，并且说她多么后悔曾经使他痛苦过。"我真以为我那时候发了疯了。"她这样说。

革命以后，她失掉了一切，可是她从不抱怨。她似乎对金钱荣华等等她从前那么喜欢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了。她在一九一九年患肺炎去世。姐姐达尼亚和我两人看护了她十一天。她很痛苦，不过她很能够忍耐，对任何人都很和气。到了她明白快要死的时候，她把我姐姐和我都唤到床前。"我要告诉你们，"她说，她的呼吸困难，她的话常被咳嗽打断，"我知道我是你们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妻子。"

我姐姐和我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两个都哭着。我们知道母亲对我们讲的是真话。

亚历山德拉是托尔斯泰最信任的女儿。她的话应当是可靠的。

1950年2月。

《回忆布罗克》[①]后记

收在这本小书里面的两篇短文是从高尔基的《杂记和回忆》的法文译本(一九二六年初版)中选译出来的。法译本的全名是"Notes et souvenirs",译者仍旧是翻译《回忆托尔斯泰》等三篇的 Dumesnil de Gramont。《杂记和回忆》中讲到作家的文章就只有这么两篇,虽然高尔基遗留下来的关于他的同时代作家的回忆还有一些,但我至今没有机会读到它们。

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升曙梦说过:"高尔基的回忆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有很大的价值,就把它们当作近代俄罗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同意他的话。我自己也喜欢高尔基的这一类的作品。我也高兴把它们介绍给我的读者。所以我译了《回忆契诃夫》,译了《回忆托尔斯泰》。

关于布罗克的回忆是一篇相当难译的文章。但我终于吃力不讨好地把它试译出来了。现在加上一些注解将它交给书店付排出版,也无非想给爱好俄国文学的人贡献一点材料。到了将来有人从原文译出高尔基的全部的《回忆》的时候,我

① 《回忆布罗克》:高尔基著。一九五〇年七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的拙劣的译文便会欣然消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克生于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死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八日。他是著名的长诗《十二个》①的作者，曾被西欧的读者称为本世纪初叶俄国最大的诗人。苏联季莫菲耶夫批评《十二个》说："实际上，这篇长诗确以特殊的技巧和力量传达出了一九一八年那些伟大的日子的革命激情，传达出了这些日子的难以抑止的气魄和英勇精神，对旧世界的热烈的憎恨和对未来的如火如荼的信心，以及浩大的事变和个人的欲望与思想的神妙的交织。……"②

《十二个》有胡敩和戈宝权的两种中译本。胡译本（卷末附有鲁迅先生的后记）已绝版。戈译本是前年刊行的，除了优美的译文外，还附得有几篇研究布罗克的好文章。读过了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以后，应当接着去念这本布罗克的诗。

1950年5月。

---

① 《十二个》：一九一八年一月写成，三月发表。

② 借用水夫的译文。

《回忆屠格涅夫》[①]后记

以上四则《回忆》都是从一八八七年在巴黎出版的伊沙克·巴甫罗夫斯基(Isaac Pavlovsky)的法文著作"Sourenirs sur Tourguéneff"中译出的。关于巴甫罗夫斯基，我知道的实在有限。他是一个住在巴黎的俄国著作家，而且是在屠格涅夫的晚年中时常到杜爱街去的一个客人。他在这本关于屠格涅夫的著作里面讲了些我们已经知道但不太清楚的事，也讲了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让我们知道屠格涅夫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家，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屠格涅夫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波里瓦诺夫应该是十九世纪的俄国革命者尼可拉·柴可夫斯基(1850—1926)。屠格涅夫的另一传记家雅莫林斯基也是这样说。柴可夫斯基是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到美国，参加当时在堪沙斯成立的农业公社。公社失败后，他到了所谓震教徒中间去生活了一个时期。后来他到了巴黎，在那儿认识了屠格涅夫，并且遇着了两个俄国少女，产生了一段像巴甫罗夫斯基所叙述的那样的恋爱故事。

这本小书的脚注，都是中译者加入的。译者喜欢屠格涅

① 《回忆屠格涅夫》，巴甫罗夫斯基著。一九五〇年八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夫的著作，也曾为它们花过一些功夫，译过《父与子》和《处女地》，也译过《散文诗》和《蒲宁和巴布林》，现在还在翻译他的一些中篇小说。

1950年8月8日。

《草原集》[1]后记

收在《草原集》里的五篇小说都是高尔基的早期作品，而且全是跟草原有关的，——不是在草原上产生或流传的故事，便是描写草原生活的小说。《马卡尔·楚德拉》(高尔基的处女作)是新译——我丢开了十九年前的译文《草原故事》里面的《马加尔·周达》。《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第一节也不是我二十年前译过的《不能死的人》了。只有《因为单调的缘故》不能说是完全新的译文。这篇小说的译文还是二十年前的旧稿，我在未购到《高尔基全集》第三卷(原文)之前，曾根据我有的那个英译本重校一次，改过不少的字句；最近找到原文，匆匆再校一遍，发觉英译文，真如两位英译者中的一位H.T.S.所说，是采用了比较自由的意译法译成的。他们自己说，企图在译文中保留一点俄罗斯草原的声音和香气。他们的确花费了一番苦心。我害怕我根据原文逐字重译，反倒会失去整个的情调，所以我在这个集子里保留了这篇半旧的"意译"(即照意译法译成的译文，这里说的"意译者"，应该是那两位英译者，而不是我)。我说怕失去整个的情调，这是因为我的俄文程度

① 《草原集》，高尔基著。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差，只能逐字摸索，抓不住高尔基小说的整个的调子。但这在别人却不是难事了。再过两三年我或者会摆脱英译文的影响，根据原文来完成《因为单调的缘故》的新译吧。① 又这里所谓"单调"，照原文的篇名看来，含得有寂寞，无聊，厌倦的意思，不仅是我们口头上常说的那种"单调，单调"了。

中译者 1950年9月15日。

---

① 一九五六年译者终于根据原文把这个短篇重译，改名为《因为烦闷无聊》，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该社编印的《高尔基短篇小说集》，这次重译、改译和新译的短篇小说，共有十一篇。

《红花》[①]后记

以上的两篇小说是根据英国R.Smith的《信号集》（"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1912）的英译文，对照着一九五〇年苏联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刊行的《红花》的原文译出的。《信号集》里面一共收了迦尔洵的十七篇小说（迦尔洵一生就只写过二十多个短篇），《红花》里则只有《红花》和《信号集》两篇，封面上印着苏联艺术家U.Rostontsev的木刻，现在重印在这本小书里面了。

迦尔洵的全名是Vsevolod Michailovich Garshin。他是旧俄的一位青年作家。他生于一八五五年，只活了三十三岁。他在一八七四年进过矿山技师专科学校。一八七六年俄土战争爆发，他在一个步兵联队里当一名普通兵，后来腿上带伤，便退伍回家。一八八七年狂病发作，他跳楼自杀，跌在石级上，受伤未死。不久他便进医院治疗，一八八八年四月死在医院里面。

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除了《红花》和《信号集》外，还有一篇反战的小说《四日》，鲁迅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把它介绍过来了。

1950年10月8日。

① 《红花》：迦尔洵著。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一件意外事》[1]后记

以上的两个短篇是根据英国 Rowland Smith 的《信号集》("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 1912)的英译文转译的。

作者迦尔洵(V. M. Garshin, 1855—88)的生平我已在《红花》的"后记"中简略地讲过了。昨天翻读波兰瓦里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史》，看到一段关于迦尔洵的文字，现在把它摘译出来：

> ……他在爱斯拉战役里中了弹，带伤回家，后来在《四日》里面叙述了他的经历，这篇小说被人称赞为可以跟托尔斯泰的《塞波斯托顾的回忆》相比的名著。几个月以后发生了行刺罗利司—麦里可夫的事件，迦尔洵的一个朋友被牵连在里面，判了死刑。在行刑的前夜迦尔洵想尽了方法营救他的朋友，可是他没有成功。这以后不久他就发了狂给送进疯人院去了。后来他病愈出院，跟一个年轻小姐结了婚，那是一个女医生，她小心照料他，

[1] 《一件意外事》，迦尔洵著。一九五一年六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竭力阻止他的狂病的再发。可是不久《红花》发表，它的读者们就不得不断定这位年轻的作者仍然摆脱不掉疯人院中生活的回忆。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多少知道一点自己的身份的狂人，他用尽力气作了超人的努力去拿一朵罂粟花，他以为这朵花是用人类牺牲的赤血染红了的。他想，要是这朵花被毁掉了，人类也就会得救了。几年以后迦尔洵从楼梯上跳下，终于因此死去。(一九〇〇年伦敦版)

英国利却德·赫尔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也说：

……《红花》是迦尔洵的一篇最有力也最悲惨的小说。狂人想象着毒害全世界的恶都集中在这几朵在病院天井里生长的罂粟花里面，要是他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把这几朵花毁掉，他就可以拯救世界了。……迦尔洵本人有时也发生过像他在《红花》中所描写的精神错乱的状态，他相信自己真的发见了治疗人间疾苦的万应药，他终于自杀了。(一九四七年伦敦版)

苏联达玛尔秦科在《论迦尔洵的创作》中说：

……在小说《红花》中，被称为"世界的恶"(作"资本主义"解释)的那种可怕的苦难，以及明白跟它斗争难有结果的自觉被作者用了大的艺术的力量和光彩表现了出来。因此无怪乎迦尔洵在他的创作的这一个时期中只知道一种满足——自我牺牲和死的满足了。……(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版《迦尔洵选集》)

《红花》出版后，有个朋友向我提意见说，《红花》需要一点说明的文字，所以我在这里抄译了加上的几段文章。至于收在这个小集子里面的两篇小说，它们都是写实的作品，用不着加上多余的解说了。

1951年3月。

《丹东之死》(新版)[①]后记

《丹东之死》中译本在一九三一年刊行，是从世界语译本"La Morto de Danton"转译的。译笔不妥的地方一定不少。但原书已在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日战争中烧毁，我无法根据它来校改我的译文。我希望将来能找到俄文原作重译这个名剧。

旧版《丹东之死》后面还附印了一篇我写的《法国革命的故事》，那也是二十年前的旧稿，里面也有好些不妥的地方。我现在没有时间重写它，就率性整篇删去。记得这篇文章还是夏丏尊先生要我写的，当时他是开明书店的总编辑。现在他逝世已有六年了。想到他过去给我的一些帮助，我还压不下我的感激之情。

巴　金 1951年9月9日扬州。

---

① 《丹东之死》新版：指第八版，一九五一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癞虾蟆和玫瑰花》[1]后记

他(伏谢湿罗德·米海罗维奇·迦尔洵)的父亲是胸甲骑兵队的一位军官，他的外祖父是一个海军军官。在他五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跟一个革命者(就是他两个哥哥的教师)一块儿离家出走，并且带走了他的两个哥哥；等他到了九岁时，她把他也从他父亲那儿带走了。伏谢湿罗德后来长成了一个反对残暴的专制政治的斗士。……

据说迦尔洵的启蒙读本便是某一些秘密出版的期刊；他八岁的时候就读了《何为》[2]。在他幼年对他有影响的其他的书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巴黎圣母院》[3]。社会问题并不是他的唯一的兴趣；就是在他做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很喜欢博物学了，再后他又研究生理学与精神病学。

迦尔洵有一个时期很让当时的斯拉夫派的宣传迷住

---

① 《癞虾蟆和玫瑰花》：迦尔洵著。一九五二年一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② 《何为》：即《怎么办》，蒋路译，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小说。

③ 《汤姆叔叔的小屋》：我国旧译名为《黑奴吁天录》，美国司妥夫人(H.E. Stowe，1811—1896)的著名小说；《巴黎圣母院》：法国雨果(V. Hugo，1802—1885)的著名小说。

了(那种宣传除了获取东方市场外再没有更高的目的)，所以他在一八七八年就去报名，想参加塞尔维亚的军队；一八七七年他在俄国步兵中当了一名普通兵，并且参加了俄土战争(1877—1878)，俄国方面从这个得到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四日》，这篇小说奠定了迦尔洵的文学声望的基石。他还写了别的几个短篇，说明那种战争的无意义以及帝俄军队生活的不合理，这些短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并且得到读者群的赞美。

迦尔洵一家中有精神病的遗传：他那两个哥哥都自杀了，一个死在伏谢渥罗德自杀以前，一个死在他的自杀以后。伏谢渥罗德虽然是一个性情快活、身体强壮的青年，可是他在十七岁就发过一次精神病；一八八〇年迦尔洵在深夜到一个贵族出身的酷吏[1]那儿去，跪在地上哭着哀求酷吏赦免那个图谋行刺酷吏未成事实的凶手[2]，他个人的这番哀求并没有成功，这以后他就发了厉害的精神错乱症，过了几个月还没有完全复元，后来他住过了两个精神病院，他的病才痊愈了。在这个时期他到过亚斯那雅·波良那去拜见了托尔斯泰。……

作为诗人、短篇小说家、社会心理小说的创始者(这种小说后来让契诃夫发展到异常完善的地步)，寓言作家、艺术批评家、翻译家，迦尔洵在俄国文学中留下他的

---

① 酷吏：指罗利司—麦里可夫伯爵(M.Loris-Melihov,1825—1888，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一年间俄国的内务大臣。

② 这是迦尔洵的朋友。

影响，而且在那里占了高的地位。在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活中间，他一直充满着利他心和热烈的仁爱在工作……

以上五段是从盖尔奈(B. G. Guerney)的一篇关于迦尔洵的短文中摘译出来的。既说是“摘译”，便不是按照原文文法结构的逐字翻译。我不过在这儿引用几段旁人的话简单地说明迦尔洵的短短的一生的故事。对于这本小书的读者，它们或许会有一点帮助。

盖尔奈提到的迦尔洵拜见托尔斯泰的事，在西蒙斯(E. J. Simmons)的《托尔斯泰传》中有着比较详细的叙述，我现在把它摘译在下面：

> 年轻的迦尔洵当时已经接近精神错乱的状态了，他在一八八〇年一个初春的早晨来到了亚斯那雅·波良那。他不经通报就在门口出现，托尔斯泰问他要什么，他却回答道：“我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一杯伏特加和一条青鱼尾巴。”他那使得托尔斯泰喜欢的豪放、快乐的表情和孩子气的笑容上面就现出一种疯狂的样子。酒和食物都拿来了，他不久便讲出他就是那篇轰动社会的短篇小说《四日》的作者，这小说托尔斯泰也读过，很赞美它。他接着就对托尔斯泰和孩子们讲起他在俄土战争中的经验来，他们全听得出神了。接着他又一口气不停地讲起他那个实现普遍的万人幸福的计划，托尔斯泰对这个很感兴趣，迦尔洵的道德的感受性和他对战争恐怖的抨击一定感动了托尔斯泰。迦尔洵这个人有一种陀思妥也夫斯

基式的无限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这在托尔斯泰身上很容易引起反应。几天以后有人看见这个半疯的作家骑在一匹马上，一边自言自语，一面乱舞着手。

迦尔洵是屠格涅夫的朋友。屠格涅夫的传记的作者曾经提到屠格涅夫劝托尔斯泰读迦尔洵的小说的事。西蒙斯也说过屠格涅夫责备托尔斯泰不该拿他的宗教的著作影响年轻的作家，说是迦尔洵已经成了托尔斯泰的追从者了。屠格涅夫在一八八三年逝世的时候，迦尔洵还写了《红花》纪念他。季莫菲叶夫说的"迦尔洵的《红花》中的罹了疯病，不过是高贵的疯病的主人公"，我想，在《红花》作者的心目中大概就是指屠格涅夫吧，季莫菲叶夫又说："优秀的俄罗斯作家① 把关于人的自由、关于他同凶恶的压迫者的斗争的梦想放进了他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形象。……迦尔洵的《红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他准备为了别人的幸福献出自己的生命。"

然而收在这个小集子里面的四个短篇却是迦尔洵的另一类的作品。前面的三篇跟《红花》一样是达玛尔泰科所说的"迦尔洵的创作的第二个时期的小说和故事"。达玛尔泰科说：

> 迦尔洵创作的第二个时期的作品的特征就是完全明白的、确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它们全充满着这样的意识，那就是：在人民的理想与资产阶级的现实中间存在着不能调和的矛盾的意识，自己的理想毫无力量的意识。

① 指十九世纪的一般的作家。译文引自《苏联文学史》，水夫译，一九五〇年海燕版。

在迦尔洵创作的这种演进上反映出来了七十年代某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的历史的发展……

在另一处达玛尔秦科又说：

英勇的棕榈树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的不可避免的灭亡和故事《并没有的事》，里面的昆虫们在大靴子踏来时候的无力自卫，跟小说《夜》的主人公的自杀决心一样明白地说明了"哭的人"(迦尔洵在他的某一篇小说下面署了这样一个笔名)的世界观的本质。①

中译者不想在这里添说什么了。

四篇故事(我想叫它们做"寓言小说")中，第一篇和第四篇是根据英国 R.Smith 的《信号集》(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1912)的英译文转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则是根据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刊行的《迦尔洵选集》(只收了八个短篇)中的原文，对照着 R.Smith 的英文译文译出的。译完了重读一遍，觉得译笔实在拙劣，没有能保留下原著的风格，记得盖尔奈曾经慨叹迦尔洵的著作没有好的英文译本，他说几种英译全不好，他指的当然是风格，我担心我的译文比英译文还差。

1951 年 11 月。

---

① 引自一九三一年莫斯科版《迦尔洵选集》中达玛尔秦科的《论迦尔洵的创作》一文。

《木木》①后记

这本小书是根据英国C.Garnett夫人的译文，对照着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版《屠格涅夫选集》中的Муму翻译出来的。原文在一八五二年写成，当时屠格涅夫因为一篇纪念果戈理的文章，给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逮捕，在彼得堡的警察局里关了一个月(四月十六日到五月十六日)。他的囚房隔壁便是"犯了罪"的农奴们受笞刑的屋子。他就在这一个月里面写成了他的中篇小说《木木》。这是一篇真实的故事。盖拉新是他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的看门人哑子安得烈。太太就是瓦尔瓦拉。

《木木》发表在一八五四年的《现代人》第三册上。十九世纪的英国著作家加莱尔(T. Carlyre, 1795—1881)说这是全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J. Galsworthy, 1867—1933)也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旧俄思想家赫尔岑(A. Herzen, 1812—1870)论到《木木》的社会的意义时说："屠格涅夫并不单单停留在农民的殉道者似的命运上面，他还

① 《木木》：屠格涅夫著。一九五二年五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不怕看到农奴们的不通气的小屋，在那里面就只有一种安慰——伏特加(烧酒)。他用了很高的艺术性把这种汤姆叔叔[1]的生活表现出来了，它居然逃过了双重的审查，而且它迫使我们望着那种惨重的、非人的、受苦的图画愤怒得打颤；是那些人在受苦，他们背负着世代相传的重担，前途没有丝毫的希望，他们不仅有受侮辱的灵魂，并且还有残废的身体……”

屠格涅夫在一八八三年逝世，他的遗体运回俄国以后，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

1952年1月。

---

① 汤姆叔叔：《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

《快乐王子集》再记

这次平明出版社重排《快乐王子集》①，我抽空把译文校读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九篇《童话》也依照原文发表的先后另外排列过了。这次还增加了查尔斯·洛宾孙的若干幅插图。

1955年5月。

---

① 出版于一九五五年八月。

《处女地》(新版)[1]后记

《处女地》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是他的六部艺术性相当高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部。这六部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但就艺术上的成就来说，《烟》和《处女地》比较差一些。

屠格涅夫出身贵族地主阶级，他的母亲是一个专横的地主婆，对待农奴非常残暴，甚至对待她所喜欢的儿子伊凡也很专制。屠格涅夫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反映。他反对农奴制度，反对沙皇专制政治，但他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但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脱离了人民，也不大了解祖国的现实生活。他看到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腐朽丑恶和日趋没落的命运，也看到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不可救药，但是他看不清楚人民的力量。他知道旧的、腐朽的一切都要灭亡，会有新的、进步的事物来代替它们，然而他并不理解这些新生事物。他害怕变革，害怕革命，他赞成改良，主张用"教

① 《处女地》新版，一九七八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育”代替革命。他的英雄就是本书中索洛明那样的受过英国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其实索洛明那样的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个改良派，可能走上革命道路，但也有可能变成英国工党中的那种工人贵族。小说中的另一个“革命者”涅日达诺夫好像是一幅讽刺画，其实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有屠格涅夫自己的毛病。屠格涅夫描写涅日达诺夫的时候，也常常在解剖自己。屠格涅夫把涅日达诺夫描写成一个他所谓的“多余人”（屠格涅夫自己就是一个）。其实“多余人”只是贵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屠格涅夫熟悉的就是这一部分人。他在他的小说中替这种人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唱了挽歌。

《处女地》是一八七六年的作品，在这以后作者还写了不多的短篇和散文诗。在逝世前一年（一八八二年）写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中，他这样地表明他的坚定的信念：

>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根据这首诗来回顾他六年前写成的《处女地》结尾中所谓的“一个匿名的人”（指领导革命者）和“匿名的俄罗斯”，我们对“匿名的”这个词便有更清楚的理解了。可以说作者对未来的看法还是乐观的。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

来；他虽然害怕革命，但是根据他对祖国的热爱，他理解到革命必然要来，而且要改变他当时存在的一切。

1975年6月。

《往事与深思》（选译）译者说明*

《往事与深思》（选译）是从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深思》第一卷《育儿室和大学》的中译文原稿中选出来的。

作者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和作家。他的后半生是在国外度过的。他在伦敦"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成立了第一个"自由俄语印刷所"。他死在巴黎，葬在尼斯。

赫尔岑与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是同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述中几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过赫尔岑，指出他思想上的一些错误观点，如"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①，以及他的泛斯拉夫主义等等。列宁也曾批判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的立场，并说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住了"。

一九一二年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列宁写了《纪念赫尔岑》这篇光辉的著作，对赫尔岑作了全面的评价。列宁

---

* 本篇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世界文学》第二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六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写道：

>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
>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

列宁称赫尔岑为"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往事与深思》是赫尔岑以十五年的时间写成的最重要的文艺作品。它是一部包含着笔记、书信、散文、随笔和政治论文的回忆录。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往事与深思》的内容非常丰富。它的前四卷中展开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景象，在这样一幅宽广的历史画面上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从高官显贵到仆役、农奴。作者善于用寥寥几句话勾出一个人物，更擅长用尖锐

无情的讽刺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怪人怪事，从各个方面来反映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革命的热情说明沙皇君主制度是俄国人民的死敌，而且它必然走向灭亡。

赫尔岑是出色的文体家。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憎的感情。他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富于感情的，有声有色的。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说："它紧紧地抓住了人的灵魂。"

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创办的《译文》月刊复刊的时候，我选译了赫尔岑的两则回忆发表在复刊号上。这两则回忆是叙述作者的母亲遇难和妻子病死的一部分。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读过这一部分原稿，他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这次《世界文学》复刊要介绍赫尔岑的这部名著，因为篇幅有限，我只挑选了将近四万字的译文，从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绞死了包括诗人康·雷列耶夫在内的五个革命领袖、登上沙皇宝座，写到进步的青年孙古罗夫死在流放地上。这一部分是用爱和恨写成的。爱是作者对他的同学、对俄罗斯青年的爱，恨是对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沙皇君主制度的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特点就是摧毁一切新生的力量，镇压一切进步的活动，摧残生气勃勃的青年，扼杀创造性的艺术，等等，等等。赫尔岑对这个人和他的统治是深恶痛绝的，而且是与之战斗到底的。"让尼古拉的统治永世受到咒骂吧！亚门！"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着多少深仇大恨啊！

我的译文是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部出版的三十卷本《赫尔岑全集》第八卷（一九五六年）和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Mrs. C. Garnett)翻译的英文本赫尔岑回忆录《我的过去和思想》第一册（一九二四年）翻译的，主要是依靠英译本。文中的注释除注明“作者原注”或“英译者注”者外，都是译者增加的。

巴　金 1977年6月15日。

《父与子》(新版)后记*

俄国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在一八五五年开始的二十一年中间写了六部长篇小说(作者自己称为中篇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最好的一部就是《父与子》。这是六部小说中的第四部。一八六○年冬天作者开始写《父与子》,到一八六一年七月完成。小说发表、出版了一八六二年。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它这样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的。

作者怎样想起写这部小说呢?据他自己说:

我最初想到写《父与子》还是一八六○年八月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在怀特岛上的文特纳尔洗海水澡……①

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是一个叫我大为惊叹过的外省医生的性格(他在一八六○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

* 本篇系为一九七八年《父与子》新版所作,后未用。

① 引自作者的《文学与生活回忆录》。怀特岛是英国南海岸外的海岛。文特纳尔是一个著名的疗养地。

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①

那个典型很早就已经引起我的注意了，那是在一八六〇年，有一次我在德国旅行，在车上遇见一个年轻的俄国医生。他有肺病。他是一个高个子，有黑头发，皮肤带青铜色。我跟他谈话，他那锋利而独特的见解使我吃惊。在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分别了。我的小说完成了。我花了两年的功夫来写它……这不过是埋头去写一部已经完全想好了的作品罢了。②

标题《父与子》就说明小说的内容。作者写的是父亲一代和儿子一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写的是具有科学思想和献身精神的青年和标榜自由主义却不肯丢开旧传统的贵族之间的斗争。在新旧两代的斗争中，作者认为他的同情是在年轻人的方面。

可是完全和作者的预料相反，小说引起了那么多互相矛盾的批评和那么长久激烈的争论，小说给作者招引来那么多的误解。保守派抱怨他把“虚无主义者”“捧得很高”，进步人士却责备他“侮辱了年轻的一代”。年轻人愤怒地抗议他给他们绘了一幅“最恶毒的讽刺画”。上了年纪的人讥笑他“拜倒在巴扎罗夫的脚下”，在彼得堡发生大火灾的时候，一个熟人遇见作者就说：“请看，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好事！放火烧彼得堡！”使作者感到最痛心的是：“许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对我

① 转引自《俄国文学史》下册（蒋路、刘辽逸译）。

② 译自巴甫洛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第六节。

表示一种近乎愤怒的冷漠，而从我所憎恶的一帮人，从敌人那里，我却受到了祝贺，他们差不多要来吻我了。这叫我感到窘……感到痛苦。"①

作者痛苦地说："这部中篇小说使我失去了（而且好像是永远地）俄国的年轻一代人对我的好感。"② 这对作者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寂寞地死在法国。

我在一九七八年校阅我这个旧译本。③ 再过五年便是屠格涅夫逝世的一百周年纪念。一百多年前的激烈争论早已平息，对作者的种种误解也已消除。九十五年前作者在法国病逝，遗体运回彼得堡安葬的时候，民意党人曾散发传单，以俄罗斯革命青年的名义向死者致敬，这是最大的和解了。

说到《父与子》，我同意屠格涅夫的话。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的身上，作者的确"用尽了"他"所能使用的颜色"。他对自己创造的典型人物感到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他认为巴扎罗夫是"一个预言家，一个大人物，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固然他写了巴扎罗夫的死，但他是把巴扎罗夫看作一个生在时代之前的人④，因此把他放在和他格格不入的社会环境中，使他显得很孤单，还给他安排了一个过早死亡的结局。而且

①② 引自屠格涅夫的《回忆录》（蒋路译）。

③ 《父与子》初译稿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完成。第二次的译稿于一九五三年在上海出版，一九七八年我只作了一些小的改动。

④ 这个说法也值得考虑，因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所谓"旧虚无主义者"就是巴扎罗夫这样的人，他们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他们并不孤单，而且他们给七十年代的新人开辟了路。

他写到巴扎罗夫死的时候，还流过眼泪。他甚至说巴扎罗夫是他的“心爱的孩子”。这都不是假话。然而作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改良派，西欧派。他不会真正理解巴扎罗夫，也不可能真正地爱巴扎罗夫。他只是凭着自己对俄罗斯社会生活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凭着他的艺术的概括力量，看到了一代新的人，知道这新人——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定要压倒过去的一代人物。他称巴扎罗夫为“虚无主义者”。他创造了这个词。他又在私人通信中解释道：“虚无主义者——这就是革命者。”这个词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普遍地被采用，用来称呼一切反对沙皇政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党派。民意党人司特普尼亚克在他的著作《地下的俄罗斯》(1882)的开头就说：“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名声自然将由他的著作而长存于后代，但是只靠一个词他也可以不朽了。他就是第一个使用‘虚无主义’这个词的人。”

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时候，巴扎罗夫这个新人刚刚产生，一般人对他还很生疏。但是不久，这样的新人便大量出现，像“大自然是一座工厂”，“拉斐尔没有一点用处”这一类话已经成了“虚无主义者”常用的警句。他们是严肃地相信这一切，并且准备为它们献身的。这般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到了七十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就让位给另一代新人了，那就是“到民间去”的“民意党的英雄”们。然后又出现了同工人紧密结合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战士……但是远在法国的衰老的屠格涅夫已经无法理解而且也来不及在新的作品中反映了。他的

最后一部长篇是在一八七六年脱稿的。他把年轻的涅日达诺夫(《处女地》的主人公)几乎写成了像他自己那样的人。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在《处女地》后记中写的那一段话："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来；……而且要改变当时存在的一切。"也就是一八八三年民意党人在散发的传单上所说的："也许他甚至不希望发生革命，而只是一个诚恳的'渐进主义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用他作品里的真挚的思想为俄罗斯革命服务过，他爱护过革命青年。"①

屠格涅夫"想通过主人公的形象把迅速嬗替中的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加以典型的艺术概括，"②他的六部长篇小说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写出了数十年间③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艺术编年史"。④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新人巴扎罗夫早已归于尘土，可是小说中新旧两代的斗争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对于这个斗争屠格涅夫是深有体会的，他本人就同他的母亲(短篇《木木》中的地主婆)斗争了一生。但是她母亲所代表、所体现的一切在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已经化成灰烬，找不到一点痕迹了。旧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发展，要壮大；旧的要让位给新的，进步的要赶走落后的——这是无可改变的真理。即使作者描写了新人巴扎罗夫的死亡，也改变不了这个真理。重读屠格涅夫的这部小说，我感到精神振奋，我对这个真理的信仰加强了。

1978年9月8日。

---

①②④ 引自《俄国文学史》下册(蒋路、刘辽逸译)。

③ 数十年间：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往事与随想》[1]后记(一)

《往事与随想》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中译本将分五册陆续出版。现在先出第一册。第一册包含最初两卷,即《育儿室和大学》和《监狱与流放》。第二册尚在译述中,将收三、四两卷(《克利亚兹玛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作者的俄罗斯生活的回忆到第四卷为止,一八四七年初他就远离祖国一去不返了。

回忆录的作者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和作家。他的后半生是在国外,在西欧度过的。他在伦敦创办了"自由的俄语刊物",成立了第一家"自由俄语印刷所"。他编印的《北极星》(丛刊,1855—1869)和《钟声》(报纸,1857—1867)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死在巴黎,葬在尼斯。他的著作,除了《往事与随想》外,还有《论自然研究的信》(1846)、《克鲁波夫医生》(中篇小说,1847)、《偷东西的喜鹊》(中篇小说,1848)、《谁之罪?》(长篇小说,1846—1847)、《法意书简》(1850)、《来自彼岸》(1850)、《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和《俄国的人民与社会

① 《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著。一九七九年十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主义》(1855)等书。《赫尔岑全集》共有三十卷。

关于赫尔岑，列宁在一九一二年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写了《纪念赫尔岑》这篇光辉的著作，对他作了全面的评价。列宁写道：

>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
>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
>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①

列宁称赫尔岑为"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二页，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

作家”。

《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花了十五年以上的辛勤劳动写成的极其重要的文艺作品。它是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它也是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巴黎公社前夕俄罗斯和西欧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艺术记录。还有人说，它“是时代的艺术性概括”。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在本书中作者把他个人的生活事项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往事与随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在它的前四卷中展开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景象。在这样一幅宽广的历史画面上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从高官显贵、各级官员、大小知识分子、各种艺术家到仆婢、农奴。作者善于用寥寥几笔勾出一个人物，更擅长用尖锐的讽刺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怪人怪事，从各方面来反映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革命的热情说明沙皇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是俄国人民的死敌，它们必然走向死亡。

作者在后面四卷(即《巴黎—意大利—巴黎。革命前后》、《英国》、《自由俄语印刷所与〈钟声〉》和《断片》)中描写了西欧资产阶级社会各种生活景象和各个阶层的人物。家庭日常生活、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和鲜血淋淋的革命斗争……十分鲜明地出现在这样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上。把一八四七年后的二十多年间的人物和事件连在一起的仍然是作者这一根线。每

一行文字都流露出作者的爱憎。书中散发着淡淡的哀愁，有时也发出怀疑的嘲笑和悲观的叹息，但横贯全书的始终是作者对未来的坚强信心。

赫尔岑是出色的文体家。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他的语言是生动活泼、富于感情、有声有色的。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和他同时代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说："它紧紧地抓住了人的灵魂。"

有一次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读完了《往事与随想》第五卷中叙述作者的家庭悲剧的那一部分手稿，他感动地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地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够这样写作……"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读它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Mrs. C. Garnett) 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需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这样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就没有这样的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我最初把书名译作《往事与深思》，曾经用这译名发表过

二、四万字的"选译"。现在我根据一位朋友的建议将"深思"改译为"随想"，这样可能更恰当些。我们翻看全书，作者在叙述往事的时候常常夹杂了一些感想，这些感想与其说是"深思"或者"沉思"，倒不如说是"杂感"。作者随时随处发表的这一类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作者学识渊博，但他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甚至也有错误的。赫尔岑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几次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赫尔岑，指出他的一些错误观点。①列宁也批判过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的立场。②我并不向读者推荐这些"随想"，我颇想删去它们，但为了保持全书的完整，我还是把它们译出来了。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讲过我想作一些删节，朋友不赞成，他说："应当相信读者，读者不是小学生，他们是知道怎样取舍的。"

一九七四年九月我抄完《处女地》重译稿以后，便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到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第二两卷的译稿就完成了。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我只是把它当作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而这工作又只能偷偷地完成，因为"四人帮"要使我"自行消亡"，他们放在上海的那条无恶不作的看家狗一直瞪着两眼向我狂

① 例如，恩格斯说："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 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一页，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

② 列宁还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七页，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

吠。“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我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发表的《一封信》里说：“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有人认为拿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来比“四害”横行的日子并不妥当，因为封建已在我国绝迹。我不想替自己辩解。反正书在这里，请某些人自己看看书中有没有他们的画像。我特别请读者注意皇位继承人扔在窗台上的一颗桃核，这难道只是一百四十年前的笑话吗？

我的译文是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三十卷本《赫尔岑全集》第八卷(1956)和康·加尔纳特夫人的英译本第一册(1942)翻译的，主要是依靠英译本。书中的注释除了注明“作者原注”或者“英译者注”的以外，都是译者增加的。

我以前做翻译工作，都是一个人单干。去年五月《文汇报》发表了我的《一封信》以后，特别是在新华社发了我翻译赫尔岑回忆录的消息以后，不少的读者来信表示愿意给我帮助。福建师范大学的项星耀同志把他译好的四卷译稿全部寄来供我参考。①我曾经请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莽同志根据原书替我校阅了第一册中的序文和第三、第六两章的大部分。今年北京大学的臧仲伦同志主动地替我校阅了第一册的全稿并且提出不少好的意见。最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周朴之同志不仅校阅了我的全部译文，而且还做了技术性的工作。靠了这

① 辽宁新民县的刘文孝同志也寄给我他翻译的第二卷的译文。

几位新、老朋友无私心的帮助，我才可以把这部十九世纪的名著照目前这个样子献给读者。我的译本还不能算是定稿，但是我相信，靠着大家的努力，这个译本一定可以修改得比较完善。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新中国，在今天的新社会！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事情。我真诚地感谢给了我帮助的和来信给我以鼓励的一切见过面和未见面的朋友。

1978年9月17日。

《往事与随想》后记(二)

今年四月出版社把《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的校样送到我这里,过两天我就动身去北京,作赴法访问的准备。五月我在巴黎旅馆里两次会见赫尔岑的外曾孙,在巴斯德学院工作的诺艾尔·利斯特博士和他的夫人(五月二日和九日),第二次他还介绍我认识他的兄弟莱翁纳尔。

我重访巴黎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诺·利斯特这个人。可是他在报上看见我到达巴黎的消息,就主动地跟我联系,到旅馆来看我。他第一次看见我仿佛看见亲人一样。我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谈得很融洽,主要谈赫尔岑的事情。他送了我一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还送给我一九六八年在伦敦重印的《往事与随想》英译本新版改订本四大册。他又介绍《往事与随想》的法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同我会见,并让她带来她的法译本前两册(1974—1976,在瑞士出版)。他知道我去尼斯扫赫尔岑墓,便打电话通知他的亲戚安·昂孚大夫在公墓等候我,要他向我说明赫尔岑夫妇葬在尼斯的一些情况。

在我返国的前一天中午,我有别的活动,刚刚走出旅馆,诺·利斯特先生在后面追了上来,交给我一封信和赫尔岑的彩色画像的照片。像是赫尔岑的大女儿娜达丽绘的,现在在

他的家里。他特地为我把画像拍摄下来 信上还说，画像的黑白照片取到后就直接寄往上海，我可以在我的译本中采用。……

我和这位和善的老人分别不过三个星期，他的亲切的笑容还在我的眼前，我刚刚根据他给我的资料校改了《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的校样，我每看完一章抬起头来，好像这位老人就在旁边偏着头对我微笑，甚至在凉风吹进窗来的深夜，我也感觉到他的微笑带给我的暖意。我感谢他的深情厚谊。我和他同样热爱的赫尔岑的著作、同样珍贵的赫尔岑的纪念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出版了。这只是一件巨大工作的五分之一，要做完全部工作，还需要付出更辛勤的劳动。我有困难，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敬爱的远方的朋友，您的微笑永远是对我的工作的鼓励。我常常想您的帮助，我绝不放下我的笔。让我再一次紧紧握着您的手。

1979年5月30日。

《巴金译文选集》[①]序

一

三联书店准备为我出版一套译文选集，他们挑选了十种，多数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多年未印了。他们也知道这些书不会有大的销路，重印它们无非为了对我过去在翻译工作上的努力表示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可是说真话，在这方面我并无什么成就。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我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只是懂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

① 《巴金译文选集》：一九九〇年一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可能有人说它们“四不像”：不像翻译，也不像创作，不像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像我平时信笔写出的东西。但是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丢失了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我只保留着我自己的那些东西。可见我的译文是跟我的创作分不开的。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

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虽然是“试译”，我重读它们还不能不十分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即使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可以说它们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谢三联书店给我一个机会，现在的确是编辑我的译文选集的时候了。

二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在创作上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

言，我预告要写的小说不曾写出来。在翻译方面我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赫尔岑的回忆录还有四分之三未译。幸而有一位朋友愿意替我做完这个工作，他的译文全稿将一次出版。这样我才可以不带着内疚去见“上帝”。前一个时期我常常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坐立不安，现在平静下来了。没有做完的工作就像一笔不曾偿还的欠债，虽然翻译不是我的“正业”，但对读者失了信，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有些事我做过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细心的读者偏偏要我记起它们。前些时候还有人写信问我是不是在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表过翻译小说《信号》。对，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信号》是我的第一篇译文。我喜欢迦尔洵的这个短篇，从英译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中选译了它，译文没有给保存下来，故事却长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头一本小说《灭亡》中我还引用过《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三十年后（即五十年代初）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了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它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

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灭亡》，我的第一本书，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学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杀人被杀中毁灭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牺牲精神的不仍是对生活、对

人的热爱吗？

《寒夜》，我最后一个中篇（或长篇），我含着眼泪写完了它。那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不肯伤害任何人，却让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为了爱生活、爱人……吗？

还有，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时间写成的《随想录》不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三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愿意做一个普通人。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

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从一九二二年翻译短篇《信号》开始，到一九八二年摔断左腿为止，六十年中间我译出的作品，长的短的加在一起，比这套选集多好几倍。作者属于不同的国籍，都是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我和他们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我没有才华，没有文采，但我们同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别的我不多说了。

巴　金 1988年4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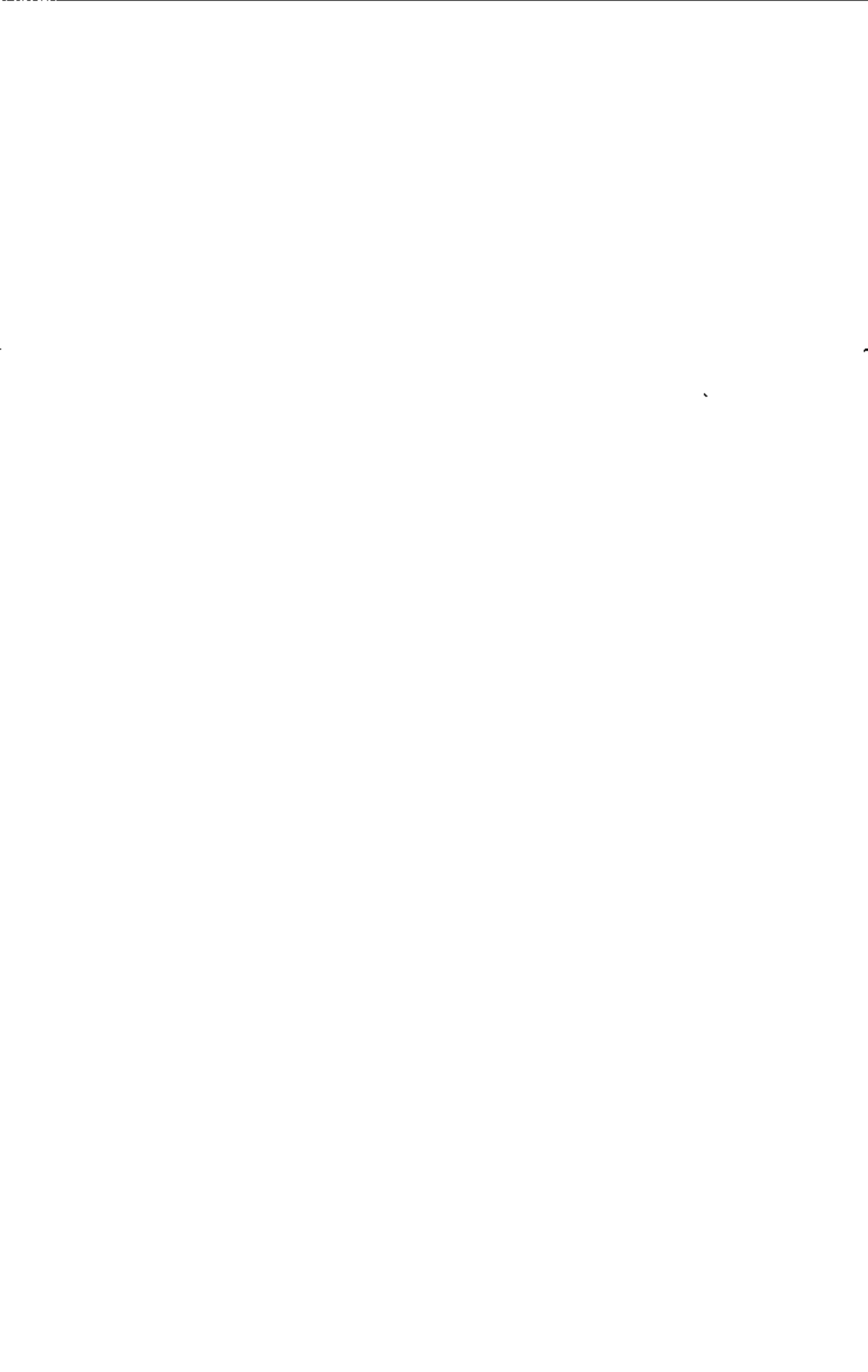
附　记　最近，编者告诉我，台湾的东华书局希望在

台湾同时出版这套小书，征求我的意见。

一九四七年，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台湾设立分社的事，我曾去过台湾半个月，还跟当时在台湾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的老朋友黎烈文和其他一些人见了面。这个美丽的小岛和我那些朋友，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现在，我当然很高兴台湾读者也愿意读这些我所喜爱的书，并感谢台湾东华书局的盛情。

巴　金 1989年9月26日。

第 四 辑



《工女马得兰》[1]译本序

在这样一本名著的前面放上一篇序，非但不必要，而且还是多余的。不过我既有了机会先一般读者而读此书，它又曾使我异常感动，那么我把我的感想写下来，也许可以作为读者了解此书的一个帮助，何况我又曾答应译者岳煐君写一点东西在他的译稿的前面！

近来译成中文的西洋文学名著中最使我感动的，有三部书：第一部是阿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第二部是路卜洵的《灰色马》，第三部便是此书。前两者是俄国的作品，又是小说，而且在意义上也和这本《工女马得兰》不相同。《工人绥惠略夫》呢，鲁迅君说是一本"愤激的书"。《灰色马》呢，它的英雄佐治是一个极端的否定者，对于革命，对于一切，都没有信仰，虽然他是一个恐怖党人。《工女马得兰》却不是这样。它是一本充满着希望的书。它的"英雄"，对于革命是有坚定的信仰的。不仅最后马得兰所说的"我的儿子没有死，让的儿子没有死，"这两句话里所暗示的希望是极其明显的，便是其他的地方也都贯穿着希望，随处可以增加读者的勇气。

① 《工女马得兰》：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译本之所以改名为《工女马得兰》(这是我的意思)，这意义也是很容易明白的。这本戏是以马得兰为贯穿全书的一根线，以她开始，以她结局。她与让·罗路同为全戏里的两个重要人物，而她的重要更超过让·罗路，我们说她是全戏的唯一"英雄"也未始不可。

马得兰，据让批评她说，是"有高贵心灵的女人"，是"天地间所生的精华中的一个"，然而在从前，在罢工以前她"不过是一个多苦多病的穷女子"，"曾是那样的安静而多愁"。从一个多愁多病的女儿变为一个信仰坚定的战士，成了罢工群众的"小母亲"，这样的变化并不是什么奇迹。假若我们追踪马得兰心灵的变化，便很容易明白一方面是困苦的生活，被富人们虐待，侮辱，遗弃的生活燃起了她的怨恨，一方面是真诚的爱情，以"幻梦，计画，奋斗"相信托的爱情给了她"如许多的勇气，如许多的信仰"。这样完成了她的变化，这是很自然的。

让·罗路以前的遭遇倒与绥惠略夫相似。他的同伴为了信仰都跑到死里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他在波那被绞死时才逃出来。到处受人嘲笑，到处被人告发。他的"苦痛之中，超过于饥饿日子的超过于无被褥的夜里的，却是感到人们的冷淡不关心，和给他们指示幸福之途的力量的白费"，这样他便只停留在一个像烈火般"奔腾的激奋里"，甚至失了信仰。但他与绥惠略夫不同的，他后来得到了马得兰的爱情竟然得到了崭新的生命力和对于前途强烈的信仰，终于为工人的利益把生命牺牲了。

罗伯与喇尔江关系的描写，也是这本戏里一个精彩的地

方。他们父子间思想上的冲突到了极点。甚至"彼此相谈，相看，不是像父亲和儿子，却是像仇敌和仇敌。"然而在感情上他们仍是彼此相爱，仍是父子。喇尔江说："要是我们彼此不相爱了罢，可怜的孩子，我们还会这样难受么？"这是一句何等沉痛的话！米尔波对于理智与感情交战时期的心理描写，在艺术上的价值实在是不朽的了。

喇尔江也不是如一般人所想象的怎样一个坏人，他也想做一点好事，然而因为他的偏见太深，周围的人如麦哥来等又是异常之坏，他自己又没有决断心（这是他的最大弱点，虽然麦哥来等称赞他是一个有决断心的人，实际他毫无决断心）。所以终于造成了绝大的罪恶。他承认工人所要求的是生活，是很公道的事情，然而他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反而听了麦哥来的话叫军队来压服工潮，结果杀死许多人而自己的工厂也被焚毁了，他的儿子因为参加罢工者一方面的运动，也被军队枪击死了，自己几乎发了狂。这便是无决断心的结果。

此外如都卢得等资产阶级的谈话以及热勒维娜之所谓慈善，处处表示出来横于富人与贫民间的鸿沟，和在富人眼底下的穷人的面影。至于二十七年苦工所造成的路易·笛耶，便是表示工人困苦的绝好证据。他在罢工失败后同着邻人到堆尸场去。他坐在凳子上望着来来往往的家属，竟说："这是发工钱的日子。"这时幕下，全剧由此告终。这样的结局很有深长的意味，不晓得那些富人看见了他们的"成绩"能否不惊心动魄！

就艺术方面讲，这本戏也是成功的作品，全篇无异乎是一

首很长的散文诗，句法短劲而有力，修辞也很美丽，还带有极强的煽动力。第四幕里让与马得兰的演说，恰与莎士比亚的名剧《凯撒》里布鲁达司与安多利欧的两篇演说一样，是极能动人而又名贵，即与大演说家的演说相比也无愧的。

《争自由的女儿》[1]序

我感谢梅弟，他底这本小小的书使得这几天心情恶劣的我做了一个好梦。

不知为什么缘故，在这个大时代中我只感到沙漠上似的寂寥，悠长的岁月就在这不死不活的寂寥中过去了。然而梅弟底《争自由的女儿》给我带来了一个炸弹，它底爆炸声是我亲耳听见的。我如今不再在这种寂寥中断送我底青春了。

从这本小书里，我回忆到几年前我最初献身于社会运动的情形，我又再感到我在我底小说《灭亡》里所描写过的"立誓献身的一瞬间"，而且我又看到几年前的我的面影（虽然这书里并没有我）。所以这本小书给与我的感动，是非常之大，不可以言语形容出来的。而且我相信不仅是我，便是所有从事于社会运动的男女青年读了这本小书，也许会与我有同感罢。

然而这本小书还给了我们以一个"新妇女"之典型，——即所谓"争自由的女儿"。这使我记起了我去年在法国时所译的一篇题作《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的长篇故事。那篇故事是叙述另一个国度的一个青年女儿求知识争自由的事实。这所谓争自由自然不仅是争个人的自由，而且也是要争众人的自由。而梅弟底小说里的女儿所求的，所争的也正是那样。

① 《争自由的女儿》，梅子著。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

在《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话："俄国的新妇女第一力求获得她们多年所不能得到的知识，其次力求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并不是为着她底自私与个人自己的安乐，而是为着便于尽力于俄国，于人类以及一般的自由与进步之目的的缘故。这样的'新妇女'自第一次露面以来就充分地表现出来她们对于她们底目的之真挚，热心，忠诚，自己牺牲，甚至于死，这样的妇女是其他各国的历史上所少有的。……"虽然久别新归的我不曾在中国看见这样的"新妇女"，但在梅弟底小书里我却看见她了。

这小说底结局并不能使人愉快，乐之与若丽被害了，她们底两个姊姊还在长夜漫漫中期待天明。读了这篇忧愁的故事谁能不感到深切的悲哀，能不拿他底眼泪来为这故事里的主人公而流？她们——争自由的女儿——为了替同胞争自由的缘故牺牲了一切个人的幸福，但她们底牺牲只造成了自己底更悲惨的结局。这是多么令人灰心的事啊！

然而亲爱的读者，你们要记着：就在这样的痛苦生活中她们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悔恨。在她们除了这样的生活外，也没有更好的路了。如果她们能够再生一次，以充满了希望的青春再来一次生活之旅路，我相信她们也一定是重走着这同一的道路！事实上难道我们能够说世间还有人比较她们更忠实地尽过了做人的义务么？

争自由的女儿，如果中国真有这争自由的女儿的话，那么请接受我底祝福！

巴　金 在上海。

《幸福的船》[1]序

吴去厦门的前一夜邀我去逛"新世界"[2]，他说："那个地方我几年前去过一次，是和爱罗先珂[3]同去的。"他提到爱罗先珂就露出了无限的温情。我知道他在想念那个人，他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找出当年的遗迹。

爱罗先珂是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友人。他的垂到肩头的起波纹的亚麻色头发，妇女似的面庞，紧闭的两只眼睛，这一切好像还深印在我们的心上。这个俄罗斯的盲诗人，他以人类的悲哀为自己的悲哀。他爱人类更甚于爱自身。他像一个琴师，他把他的对于人类的爱和对于现社会制度的恨谱入了琴弦，加上一个美妙而凄哀的形式，弹奏出来，打动了人们的心坎。所以就是在中国的短期勾留中，他也已经在中国青年的

---

① 《幸福的船》：爱罗先珂著，鲁迅等译，巴金编。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② "新世界"：指当时的"新世界"游乐场，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

③ 爱罗先珂是俄罗斯的盲诗人，曾经到过印度、缅甸等国家，后来又到日本，用日文写了好些童话，收在《天明前的歌》和《最后的叹息》两个集子内。一九二一年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到中国来住了一个时期，发表了一些用世界语和日文写的童话和散文。一九二二年他经过满洲回到苏联，担任盲人教育工作。一九五二年逝世。

心上留下一个不灭的印象了。

是的，他确实给了我们许多礼物。如像他给了日本青年以《虹的国》、《雕的心》、《桃色的云》、《幸福的船》[1] 那样，他也给了我们以《红的花》、《爱字的疮》[2] 和《一个寂寞的灵魂的呻吟》[3]。他去了。因为这个寂寞的沙漠挽留不住他的那一颗热烈的无所不爱的心。他终于回到了他所眷恋的故乡[4]，在广阔的草原上去呼吸五月的空气，在浓密的树林里去倾听夜莺的歌声。但是他也曾从我们这里带走了一些东西。我们像报酬似地把《人马》、《小脚女子》、《驼背女孩》和《一个小女孩子的秘密》[5] 等等全给了他，在他的苦人类之所苦、憎人类之所憎的心上，永远刻印了一条悲哀的伤痕。这件事至今还令人痛心。更可悲的是这几年来我们的青年也曾许多次多少表现过他们的活力。但是他已经看不见了。

然而我们也不是完全忘恩的。我们爱他，我们也了解他。是的，我们的青年确实是了解他的。记得去年吴给了我一张盲诗人的照像，面庞上多了一双眼睛。吴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小孩画上去的。要消灭一切自然的和人为的缺陷，使世间再没有一个会感到不足的人——这样的纯洁的孩子的心也正是我们的盲诗人的心。我们的小孩不忍见这个异邦的盲人的痛

---

① 这些都是爱罗先珂写的童话(《桃色的云》是童话剧)。

② 这两篇是他在中国写成的童话。

③ 这是他的一本世界语散文集(在上海出版)。

④ 故乡：指苏联。

⑤ 均见爱罗先珂的《枯叶杂记》(小标题：《上海生活的寓言小品》)，胡愈之从世界语译出，收在《幸福的船》内。

苦，想使他双目重明可以和其余的人一样欣赏自然的美景，正如盲诗人不忍见人类的痛苦，想造一只为全人类乘坐的"幸福的船"来普救众生。所以在美的童话般的世界里，我们的孩子的心是和盲诗人的心共鸣的。在中国，盲诗人的作品之受人欢迎，大约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罢。

为全人类乘坐的船几时才会来呢？有些人以为这永远是不能实现的梦想，但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

我现在住在一个僻静的南国的古城里。夜间有一个朋友教我认识天空的星群；日里我便观察显微镜下面的小生物如草履虫、阿米巴之类的生活。我看见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个那么大的世界和一个那么小的世界。生命真是无处不在。孤立的个人在这世界中并不算什么。我觉得我的个人生命的发展是与群体生命的发展有连带关系、永远分不开的。所以把个人的生命拿来为他人而放散，甚至为他人而牺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反而正如法国天才哲学家居友所说，"这个扩散性乃是真实的生命之第一条件。"何况我们的心中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的自己保存所需要的不知多过若干倍。我们拿它们来分给他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为万人乘坐的船是有的，而且会来的。只要人类如今不是正向着灭亡之路走去，那么我们终有一天会见到那样的幸福的船航行在人间之海里。

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替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这一本《幸福的船》，我愿意把它献给我的同时代的兄弟姊妹们。

1930年9月在泉州。

附 记　这本集子正要付印的时候，一位朋友从苏联回来，给我们带来关于爱罗先珂的消息。据说他健康地活着，在他的祖国一所盲人学校里教书，有兴致的时候还常常去北冰洋一带探险呢。这个消息当然是读者所乐闻的。

1931年3月在上海。

《何为》[①]后记

《何为》的名字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后来听说这书有英文译本，[②]曾托友人在伦敦、纽约等处搜求过，却没有结果。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在巴黎赛纳河畔一家书摊上买到这书的法文译本，书名改作了《嫉妒》，但内容是一看便明白的。这法文译本也早绝版了，我无意间得到它，心里高兴自不必说。我那时在翻译廖·抗夫的短篇小说《薇娜》，司特普尼亚克的《三十九号》，蒲列鲁克尔的《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这都是描写旧俄新女性的姿态的作品，我打算把《何为》也译出来，和它们编在一起，印一本小册子。然而后来，《灭亡》的写作占去了我的时间，而且那几篇译稿寄回上海后也找不到发表的地方，那时候的杂志编辑不会看得起我的文章，更没有一家书店肯接受我的稿子。我便停止了《何为》的翻译。当时我已经开始译了几页，但现在连译稿也不知道失落在什么地方去了。一搁就是几年，直到三个月前我整理破书，找出了这本《何为》，拿给世弥看，她说愿意翻译，就把这事情拜托给她。

---

① 《何为》，罗淑译（节本）。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收入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开明书店版《梦与醉》时，改题为《关于〈何为〉》。

② 英译本名《一个重大的问题或何为》，在纽约刊行，译者为 Nathan Haskell Dole，现已绝版。

世弥没有失信，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她就把稿子送来了，是这么流畅的译笔。我把译稿仔细读过一遍，在我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觉得很高兴。

关于这本小书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在《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第一卷第六章里面曾论过它，我写了一个极简略的节要，这和现在这译本的内容不大相同。我的节要是根据捷克马沙列克的《俄罗斯精神》第二卷第十四章写的，马沙列克对于俄国社会运动的知识之广博，是无可怀疑的，他的著作里面征引《何为》的处所甚多，而且有些对话还是这译本里所没有的。①根据这两点我们也可以断定法文译本只是一个节本。不过原本我们一时找不到，这节译本又没有支离破碎之处。所以我们也就以这节译本为满足了。

这小说②对于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俄国男女青年都有过极大的影响，对于他们，它简直是“一个启示”。它一出版

---

① 譬如薇娜责备乐卜何夫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说它是冷的，平庸的，严酷的，乐卜何夫答道：“这理论是冷的，然而它教人怎样去创造温暖。一根火柴是冷的，火柴匣子的边也是冷的，然而在它们里面却含着火，它会给人烧饭，而且使人身体温暖。这理论是严酷的，然而倘使人们遵从它，他们就不再会做那些徒然无益的同情之可悲的玩具了。握着刺胳针的手是不应该退缩的，因为单纯的同情对于病人并没有一点好处。这理论是平庸的，然而它揭示了生活的真正动机，而且只有在生活的真理中我们才会找出诗来。”这一段话在这译本里就没有。

② 瓦利歇夫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说这小说缺乏艺术和诗的色彩。然而车尔勒雪夫斯基的艺术观是“非美学的”。他的诗的定义是：生活，活动与激情。他以为生活本身才是美丽的，艺术只能帮助来说明生活，而决不能代替现实，也不能达到与现实同等的地位。他的一个信徒还说：“一个鞋匠比拉斐尔（意大利名画家）要高贵得多。”

马上就成了俄国青年的纲领和福音，它的确支配着，指导着当时青年男女的行动。①

这小说的力量在于它所阐明的理论，在于它所描写的实在论者的典型。这无异乎给当时的青年男女指示一条道路，告诉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小说里的主人公，那些实在论者，又是唯物论者，实证论者，利己主义者。② 他们并不博学，然而却能科学地思索。他们是锐敏的观察者，而且常常从他们的观察得来合于逻辑的结论。他们把这实证的知识也应用到道德的方面去。因此他们否定了一切过去的传统和习俗。自然，质朴，直接，坦白，这是他们的口号，而且成了他们的生活的特征。他们少说话，而宁愿多实行，多学习；但是他们却喜欢彼此争辩讨论那些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他们中间也许有两三个会抱着这实在论走到极端，但大多数的人都是诚挚的工作者，他们为自己同时也为同胞工作。他们当着一切困难的问题，处在一切困难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冷静地思索而行动。

他们应该怎样做呢？"何为"的问题来了。一切都是很显

---

① 这小说是在监狱里写成的，出版后不久作者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其后的二十年中间他都以骄傲的态度过着困苦的放逐生活。他的崇高的人格感动了无数真挚的男女青年。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真正的实证论者除了爱和高贵的心灵外，什么也没有了。"他的一个信从者沙热夫更说："我们相信我们是为人类的幸福奋斗的。"可见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与自私自利不同。它一方面尊重，而且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创意性，他方面也倾向着共同的善与万人的幸福。所以这合理的利己主义又可称做利他的个人主义。

然的。社会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原理来组织过。一切制度必须与福利叶的理想相合。这些理想应该用路易·布郎式的合作组织而且由人民的教育来实现，这不仅是依照福利叶所指示的，同时还与奥文的计划相合。

这可见车尔勒雪夫斯基在《何为》里所阐明的理论并不是他的创见，他的论据还是从西欧的作者那里得来的。

有一点是应该特别提说的，就是车尔勒雪夫斯基在这小说里还解决了几个重要的妇女问题（如争自由、求知识的问题等等，尤其是夫妇中间的关系这问题）。在俄国四十年代，乔治·桑是很时髦的，然而普希金却借着塔季安娜大胆地，独立地处理了这问题①。德鲁景林的波林加不肯接受她丈夫的牺

---

① 塔季安娜是普希金的长诗《叶傅金尼·奥涅金》的女主人公。这一个乡村的姑娘爱上了时髦的富家子奥涅金，他却并不注意她。她向他表示过她的真诚的爱，却被他拒绝，而且得到他一番教训。后来她被母亲逼着到了莫斯科，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他们夫妇到圣彼得堡，她在那里成了交际社会的明星 在这时候奥涅金出现了。他遇着她。这一次是他疯狂地爱上了她。他趁着一个机会向她表示他的爱情，她说："奥涅金，那时我还年轻，我想，人比现在还漂亮，而且我又爱你 可是一个乡下姑娘的爱情在奥涅金是一点也不希罕的，他完全不注意她 ，可是他现在为什么又步步地跟着她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地注意她呢？是不是因为她现在有钱，成了上流社会的人，在宫廷中又受着欢迎呢？·但是在我，那一切的财富，那豪华的宫廷生活，我的一切的成功，我的那些富丽堂皇的房屋与宴会……在我，全是空虚！我宁愿撇弃这讨厌的衣裳，这种假装，这一切的喧嚣与光华，来换取几册旧书，一所荒园 还有我们那所简陋的茅舍，那些我们第一次相会的地方，还有我们村里的墓场，我那可怜的乳母的坟墓旁边有一个十字架和几株荫凉的树木，一一在那时候幸福是可以实现的！幸福是那么逼近！ "她含着眼泪请他离开，她最后说："我不能够委身给你！我爱过你，我现在还爱你。然而我现在结了婚，我要遵守我的信誓。"

牲，而和他留在一起，那丈夫知道妻子爱着年轻、热情、浪漫的加利奇，他原谅她，然而到底他患肺病死了。同样赫尔岑在《谁的罪过》里面使那个不幸的丈夫死于酒病。其他如冈查洛夫、屠格涅夫、阿斯特洛夫斯基诸人都在车尔勒雪夫斯基之前企图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切的企图都是失败了的，因为没有人敢来提出一个积极的答案。然而这问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不能忽视的。车尔勒雪夫斯基当然要根据他自己的立场来提出一个有力的解决了。

妇女问题在当时的俄国是急待解决的。在尼古拉一世的治下女人从政治的压迫所受到的苦并不少于男子。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就有不少跟着丈夫到西伯利亚去。女人也分担着男人的政治的渴望，一八五〇年塞瓦司托颇尔叛乱中就有三百七十五个女人因参加叛乱被处死刑。一八六一年以来的革命运动更浸透了女性的血和泪。女人的求知识争自由的渴望变成不能够遏止的了，父与女的斗争已经以一个惨痛的姿态现露出来。女子的教育成了迫切的需要，而使政府也不得不在一八五八年开始创办了女子学校。

车尔勒雪夫斯基的《何为》就是在这时期(1863)出现的。他把握住这个现实，由此创造了新妇女的典型，表现了当时年轻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们应该有的观念，应该走的道路。

这是七十几年前的旧作了。然而这观念，这道路在现今仍然是很新的。所以这本小书的翻译，虽无接受文学遗产的意义，却也自有其独特的使命的。

1936年4月。

《死之忏悔》[1]后记

前年年底伯峰回到上海，和我常常见面，我看见他闲着无事，便介绍了一本书给他翻译。这是日本古田大次郎的狱中记《死之忏悔》，我知道他在东京时就读过了的。他说他也喜欢这书，打算动手翻译两三章试试看，便高兴地把原书拿了去。他不曾爽约。去年五月底他把全部译稿送来了。我答应替他仔细校阅一遍。我以为至迟七月初我就可以把他的译稿交到印刷局去。然而忙碌的生活使我对朋友失了信。我在七月初交出去的，只是一部份的译稿，其余的三分之二就在我的书桌上放了将近一年的光景，直到最近我才能够把它校完。现在这书要出版了，在我也算卸去了一个重负。我自然感到欣慰。这一年来我每天就记挂着这工作，它把我折磨苦了。

我应该告诉读者，伯峰交来的只是一个节译本。其实原书就非全璧。出版之前便经过了检查员的删削。节译的办法还是出于我的提议。原书出版在十一年前，古田的事件发生更早，我们一般异国的读者对当时的情形自然十分隔膜，所以原书中有许多处所我们的读者现在看来颇不易了解，而且感

① 《死之忏悔》：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篇收入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开明书店版《梦与醉》时，改题为《关于〈死之忏悔〉》。

不到兴趣。我以为不如索性把它们删去，倒可以省去读者的一部份时间。不过我读了伯峰的节译本，我对于他那取舍的观点却不能同意，因此在校阅的时候我还做了编辑的工作。我删去了一些地方，又增补了一些地方。删去的约有两三千字；增补的字数至少在三万以上。这时伯峰已不在上海，我只得请了陆少懿来做补译的工作，其中也有几处是我翻译的，但这样的处所并不多。同时我还请少懿把全部译稿对着原文再看一遍。总之古田的狱中记能够以这样的形式在中国出版，除了伯峰而外，我们还应该感谢少懿。

我们知道《死之忏悔》是一个死刑囚的狱中感想录，原稿共三十二册。但这都是死刑确定前所写的。作者自己说只有第三十三册才是"真正的死刑囚的狱中记"，那是判决死刑后的作品。这最后的一册据布施辰治在序文里说当局不许拿到外面去发表。然而它后来终于被领取出来而且秘密出版了。我得到一册，曾读过一遍。书名是《死刑囚的回忆》，但在"一二八"的沪战中被炮弹打毁了。我没法将它译出附印在这里。这一册的内容和以前的三十二册(即《死之忏悔》)差不多，不过调子略微有点不同。写以前的三十二册时作者已经知道死刑是无可避免的了。他没有挽救的方法。然而判决究竟不曾确定。死虽然就立在他的眼前，但它却不住地在摇晃。希望纵然是极其微弱，却也不曾完全消失。所以那时有疑惑，有挣扎，有呻吟，有眼泪。作者当时还不大认识死的面目、最后临到了写第三十三册，一切都决定了，从此再没有从前那种不安定，从前那种苦苦的挣扎。的确如布施辰治所说确定了舍弃

生命以后，心境和态度都是更为沉静，真有超越生死之慨。因此无怪乎有人会以为这一册"真正的死刑囚的狱中记"反不及以前的三十二册中文笔之清丽和表现之沉痛了。

古田大次郎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同时他又自称为一个恐怖主义者。其实安那其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两样东西（许多安那其主义者都不赞成恐怖主义）。而这书可以说是和安那其主义不相干。若把它当作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心理分析的记录看倒很适当。或者把它看作一个纯洁的青年灵魂（或者就说一个人）的最真挚的自白看也无不可。所以加藤一夫读了它，就"觉得我（加藤氏）的灵魂被净化了。我真的由于他的这记录而加深了我对于生活的态度。"这记录在深与真两方面是超过了无数的书册。和它同类的书本我连一册也没有见过。加藤一夫称古田为一个"真诚的，真实的而又充满温情的纯真的灵魂"，这个灵魂的最深而又最真的表白当然会引起无数年轻的灵魂的共鸣，加藤一夫说《死之忏悔》是一本"非宗教的宗教书"也是有原因的。

但这样说并不就是表示在古田的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其实不然。我觉得原书内有一些议论都是值得商讨的。伯峰似乎喜欢议论，他常常不肯将它们割爱。然而我却不得不把它们删去了一部份，以便补入被他割弃而我和少懿都觉得是更有价值的一些篇页，虽然发议论的处所我们也还保留了一些。

我爱《死之忏悔》，我甚至为了这书才发愿去学日文，但是我每次读它，在我的心灵被那么强烈地震撼了以后，我却有一

种惋惜的感觉。像古田那样的人不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上面，却选取了恐怖主义的路，在恐怖主义的境地中去探求真理，终于身死在绞刑台上。这的确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

我最近写过一篇谈死的短文，里面也谈到这书，而且和我在前面所说的话还有一点关系，所以把它印在后面作为附录。

1937年4月。

《生人妻》[1]后记

这本集子是应该由世弥自己编好交给我的，她这样答应过我。但是“死亡”阻止她做完她所计划做的一切事情。我没有理由责备她失约。马大哥又远在成都，他遭遇到这个灾祸以后，我就不曾得着他的信息。从别的朋友的来信里，我知道他一时还不能从悲痛的网中挣扎出来。我更不能够在这时候拿整理世弥遗著的事情去增加他的悲思，虽然我知道世弥有不少的遗稿留在家里，里面也许还有描写盐场生活的中篇。

我认识世弥有七八年了（那时马大哥刚接了她从四川出来预备同路到法国去）。直到一九三四年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常常见面。但是她很少和我谈起写小说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她偷偷地写着短篇。所以我在《生人妻》的原稿上替她写了“罗淑”的笔名交给靳以在《文季月刊》发表时，连靳以也觉得奇怪。《生人妻》发表以后，许多朋友赞美这篇文章，却不知道作者就是他们时常见面的一个熟人。

在《生人妻》以后，我又从世弥那里得到《刘嫂》、《桔子》、《井工》三个短篇。《井工》是她离开上海时交给我的。还有几

---

① 《生人妻》：罗淑著。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收入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开明书店版《梦与醉》时，题作《关于〈生人妻〉》。

个未发表的短篇由她自己带回四川去了。她答应回到那边把它们删改后再寄来。可是她并没有寄出。她的来信里只说她身体不好，不能够静下心来工作，要我等待一些时日，于是就来了她的死讯。这就是我等待了多日的结果！

我还能够等待。但是书店负责人却几次来信催索《生人妻》的原稿。我很了解那位负责人的心情。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生命犹如庭园中花树间的蛛网，随时都会被暴风雨打断，倘使我们不赶快做完一件事情，也许就永无机会做好它。今天还活着谈笑的人明天也许会躺在寂寞的坟场里。飞机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天了。谁能够断定机关枪弹和炸弹明天就不会碰到我的身上？然而我活着的时候，我还是要工作。我愿意趁这个时机，多做完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这样草率地将《生人妻》编成了。倘使这草率的工作使得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世弥感到不满，那么还望她原谅我。

1938年4月在广州。

《逃荒》[1]后记

作者在桂林和我谈过他的稿子的事。现在我的手边有几篇他发表过和未发表的短篇创作，就替他编成了这本小书，连书名《逃荒》也是我起的。

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那里面闪露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

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1939年4月初。

---

① 《逃荒》：艾芜著。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地上的一角》[1]后记

这是我替世弥编的第二个集子。她留下的文章自然不止这么一些，但是我手边就只有这两个较为完整的短篇。

《地上的一角》是初稿，还需要作者的整理和加工，可是她连做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没有！小说原稿到我手边的时候，我正在桂林的旅舍中，我代作者做了一点整理的工作。

在敌机连续的轰炸中我抄完了世弥的小说，我一字一字地读着她那颇为潦草的笔迹，想到她不能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大时代中经历当前的一切，遗憾像火一样地在我的胸中燃烧起来。

其实感到这种遗憾的并不止我一个。有一位朝鲜朋友后来在我的桂林的寄寓中看见世弥的笔迹，谈起她，谈了几句，就埋下头去揩眼睛。她那颗热烈的、善良的心把许多人牵引到她的身边。朝鲜朋友和我痛苦地说：

"她不应当这样地死去……"我们又说：

"她并没有死。"

是的，善良的人的纪念是不会死的。况且世弥留给朋友

---

① 《地上的一角》，罗淑著。一九三九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们的印象并不仅是善良。

静静地安息吧，亲爱的朋友。你的美丽的人格对我们将是鼓舞的泉源。我们要补偿这个巨大的损失，唯一的办法便是各人在事业上的努力。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地努力工作，为了更好地纪念你。

1939 年 6 月在上海。

《互助论》[1]前记

在中国有不少的人知道《互助论》这书名，但读过这书而彻底了解的却并不多。有人以为这只是一首爱的赞美诗，有人认为这是空想的著作。这都是误解。《互助论》固然不是一本艰深的书，但它是学术的著作。作者并非凭空立论。作为他的学说之根柢的乃是那无数客观地搜集起来的事实。作者根据他对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之渊博的知识来处理这丰富的材料。每一引证均注明它的出处，或是生物学者的实验，或是探险家的报告，或是人类学者的记录，或是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我们都可以用批评的眼光来考察它们。这里没有武断，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的学说是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面的。

其实将互助的学说称为克鲁泡特金的，这并不恰当。克鲁泡特金以为它只是达尔文学说之正确的解释，这不是出于谦逊的态度，他有这权利，因为达尔文的友人白次说过克鲁泡特金的关于互助的意见"才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至于爪与牙的斗争不过是赫胥黎对于生存竞争的过于狭隘的解释

① 《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朱洗译。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而已。

关于生存竞争这个术语，达尔文在《物种原始》的开始便解释道："包含着生物间的相互依附，而且不仅为着维持各个体的生命，还要为着遗留子孙这样的广泛的比喻的意思。"

关于什么是最适者的问题，达尔文自己也说："有着同情极深的个体之最大多数的团体最能繁荣，又能衍育最多的子孙。"

达尔文在社会本能中看出一切道德感情之真正的根柢。他说，社会本能"使得动物从它的同伴们的社会中得到快乐，感到对于它们之某种程度的同情，而且为它们去做种种的事务。"他在《人类由来》中考究了动物中的社会性，它们的社会爱（即它们喜欢过社会生活），以及其中各个体过着孤独的生活时所感到的苦痛；它们的不断的社会的交际，它们的警告，狩猎及自卫时之和衷共济。他还说："当然联合的动物有一种彼此相爱之感情……除了爱和同情外，动物还显示出来与社会本能相连结的其它性质，此等性质在人类中便应该称为道德。"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应该说是《人类由来》的续篇。据说赫胥黎看见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中所提供的证据，后来便改变了他的见解。

其实克鲁泡特金从事《互助论》的写作以前，在欧洲学术界中就已经有了一些与他的见解多少相同，不过较不完备的著作。而且俄国动物学家凯斯勒教授在一次讲演里还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相互斗争是自然的一个法则，那么相互扶助至少也是一个。但是对于物种的**进步的**进化，互助比互争更为重要。

克鲁泡特金怀着何等激动的心情说："这几句话对于我就是全问题的关键。"的确他在这里找到启示了。在这方面他以后所做的不过是为"这几句话"搜集更多的证据，并且更进一步证实这个原理在人类中间也同样普遍地存在而已。尤其是在关于互助的著作的后一部份中他用的精力更多，而且成绩更大。

他的工作是成功的。现在互助已经不是新奇的名辞了，互助的学说得到普遍的承认。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是应该被欢迎的。

但是在我们这里有一些以耳代目的人，他们没有研究过达尔文或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只听见互助这个名辞，便以为在这时候提倡互助会消减民族解放战争的热诚。他们有这杞忧，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克鲁泡特金的原著，不知互助的学说的内容。作者为英文普及本写的序文便可以击破他们的忧虑。这普及本之刊行正是在欧洲战争激烈的时候，它是为着打击侵略者作种种暴行时所用的口实而被廉价印行广为流布的。正如作者在另一著作中所说："无论是在文明社会里面，……或者在'强者'对待'弱者'的关系中没有一件罪恶不是拿这个公式（生存竞争）做藉口的。"我们目前所遭受的侵略也是在"生存竞争"之错误解释下进行的。我们也需要这一部对那

种错误的解释表示抗议的书。

而且它并不单是一本抗议的书，它还教给我们一个斗争的武器，这便是互助(同种间的团结)。互助是最好的武器，无论是用来抵御外敌的侵略或与残酷的自然斗争。能够使用这武器的物种或人类决不会灭亡，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

《互助论》被译为中文，这并非第一次。旧译本出版于一九二二年，遗漏颇多，且暧昧难解，又略去附录和一部份脚注。一九三〇年又有新译本出版，收在“万有文库”第一集中。这新译本的译者似另为一人(署名却相同)，译文流利可读(惜仍有少许错误)，不过仍是根据普及本翻译，未能将旧译本中所略去的附录及脚注补入。这次朱洗先生的全译本出版，可以说是弥补了过去的缺陷。

朱洗先生的译文由我匆匆校阅一次。译者另有“附言”一篇附于卷末，现在为我删去，但我以为应该将该文的最后数节保留在这里：

> 一九二九年我用了十一个月早晚的时间将《互助论》译完，并且从克鲁泡特金所举出的各著作中找到各种表示互助与团体生活的插图三十一幅，连同译稿寄往柏林请友人沈先生校阅。后来沈先生回国，这译稿便一直搁到现在(一九三八年)。最近我又花了四个月功夫修改一次；有的篇幅改得太多，等于重译。但这次修改的主要目的着重于句子简明化，用力避去直译和硬译的毛病。我想本书读者所需要的是文中主要的意义，决不愿拿它当

作中西文对照的翻译范本看待。本译文的真确性和对于阅者的感受性究竟如何，也只有读者能够批评。

最后，关于中国人的互助材料，在原书中几乎完全忽略，因为克鲁泡特金当时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没有较多的参考资料。所以我不揣冒昧，在正文中，随处留心附加脚注外，还在本书卷末，增加附录《中国人的互助》一章。

译稿承张果先生重抄原稿，许阅香、蔡玉燕、朱舜范三先生校阅了一次清样；再承陆圣泉先生编制索引。他们的辛劳我是不能忘记的。

巴　金 1939年6月18日。

《雨夕》[1]后记

奂午的集子我见到的这是第二部了。"八·一三"以后我就没有得过他的信。从朋友那里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我惦记他。

这集子本来应当在另一家书店出版。但那书店停业了，原稿转到了我的手里，而且在我那黑色的书橱中过了一年半寂寞的时光。我不忍心让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便拿出来编在"文季丛书"内交给出版社付排了。原稿全是将杂志、报章上发表的文章剪贴起来的，难免有误植的字，我无法就正于作者，便依照自己的意见修改了。原书的目录中本来有《后记》一篇，但未见原稿，不知是否已为那家书店遗失，我一时无法弄清楚，只好让它缺着，现在由我另写数行。

1939年6月在上海。

---

① 《雨夕》，毕奂午著。一九三九年七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荒》[1]后 记

我并未见过作者。大约在三年前他从北平寄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原稿）给我，要我找一个出版地方。我托友人把它介绍给某大书店。稿子送出以后，就没有下文。后来北平沦陷了。作者也同一些朋友到了别处。他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情，也没有来过信催问。我知道这两年他差不多跑遍了“自由中国”的土地，见到不少使人欢欣、令人感泣的事迹。他或许写出了更好的文章。他当然没有余裕想到那些寄出的旧稿。但我还是有空闲的。我不忍辜负作者远道寄稿的盛意，又不愿将他的一点心血埋没，便趁着续编“文学丛刊”第六集的机会，花一点功夫把作者过去在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集起来，以写作的先后为序，编成了这一小册。不过我在这里见到的旧杂志并不多，搜集也不可能完备，而且时间匆促，我也来不及和作者通信商讨集子如何编排。倘使作者在工作的余暇能够见到我代他编成的这本小书，还望他原谅我工作的草率。

1939年8月在香港。

---

①《荒》，田涛著，一九四〇年六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三月天》[①]后记

这个集子是我代屈曲夫编的。前年作者去北方时，我们一起在一个朋友家里吃过一顿晚饭，以后我便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前年年底那个和他同去北方的朋友回到上海，我问起屈曲夫的消息，他说屈曲夫一个人到河北去了。去年我又在武汉遇见那个朋友，又谈到屈曲夫。这一次朋友却担心着屈曲夫的安全。他说他前年和屈曲夫分手以后，一年来向各处打听屈曲夫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回音。

我没有朋友的那种想法。我看，得不到一个友人的音信，在这个时期原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忙于工作，有的人没有固定的歇脚的地方。一切都在动，我们常常追赶不上。我们想念朋友，得不到音信，朋友们也难知道我们的行止，彼此打听消息，有时简直是在互相追逐，谁也追不上谁。但是有一天无意间两个朋友在一个新地方遇到了。"你还活着？""你也还活着？"彼此高兴地望着发问，才知道以前的焦虑全是多余。这是多么快乐的时刻！

我想，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地同屈曲夫见面的。

---

① 《三月天》，屈曲夫著。一九四〇年十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夜已深，我翻看旧存的《文季月刊》，看到屈曲夫的名字，眼前浮现了他那军人似的面貌，对他和散处在各地的友人，不觉起了深的怀念。我这时百感交集，不能成眠，便花了一些功夫，编成这本屈曲夫的短篇集。

这个工作我做得草率，文章的搜集也不完全，有一天集子传到作者的手中，他感到不满意的时候，还请他原谅我。

1939年8月在上海。

《蜕变》[1]后记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外。它到我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经成为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亮光。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以上的话是应该在昆明写的，但是我离开昆明快两个月了。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

---

① 《蜕变》，曹禺著。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小的精力。《雷雨》这样地感动过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眶。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块纪程碑。

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1940年12月16日在重庆。

《冰心著作集》[1]后记

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开明书店刊行。

这重编的工作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原先已有了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现在我改用了《冰心著作集》这个总名。对三册分集，除了诗集没有增添外，小说集后面增加了《冬儿姑娘》、《西风》等数篇，散文集后面加入《游记》和《新年试笔》两篇。抗战后新写的《默庐试笔》，及译作《先知》一册，因原稿散失，一时无法找到，只好从阙，俟找到后再行补入。

十几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爱读者（我从成都搭船去渝，经过泸县，我还上岸去买了一册《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爱她的著作（他还抄过她的一篇小说《离家的一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懂得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我记得《超人》里的

① 《冰心著作集》：共三集。一九四三年七月至九月重庆开明书店出版。

那个小孩，他爱他的母亲，也叫我们爱我们的母亲。世界上真的有不爱母亲的人么?)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固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对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这《冰心著作集》当作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希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这册书，也能够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的温暖吧。

1941年1月记。
1942年12月重写。

《鱼儿坳》[1]后记

这是世弥的第三创作集。散文三则都是在作者生前发表过的；《鱼儿坳》和《贼》两个短篇则是尚待整理的遗作。为了编辑这本集子，我读过世弥遗留下来的全部稿件。在《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以外的成篇的作品都收在这里了。

《鱼儿坳》和《贼》都是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故事，但显然都是未完的作品。前者好像还是一个长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都有关联，是同样的背景和人物，而且拿这小说的第二节与《地上的一角》的第二节对照，连文句也是大同小异的。这似乎需要删改。但是我珍视作者的原著，我觉得让这重复的处所保留着使《鱼儿坳》一篇显得较为完整。这里说"较为完整"，读者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我现在做的只是整理的工作，我不会在世弥的遗稿上面增加什么。作者的早逝的确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倘使作者能够多活十年，她一定会给我们留下几部描写四川盐场生活的杰作。

最近我在成都到过世弥的墓地，一抔黄土，一块石碑，一丛矮树编的短篱，这里埋葬了一个年轻可爱的生命，也埋葬了

---

① 《鱼儿坳》，罗淑著。一九四一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友情，尊敬，和许多朋友的期望。我想起了四年前在上海西站分别时的情景，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在悲痛的回忆中，我几次暗暗地问自己，难道生命就是这么脆弱，死的魔手随意一动便可以毁掉一切？

现在我应该说，死并没有毁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间就可以毁灭的东西。如今我们谈起世弥，还仿佛她活在我们中间。她的名字和她的面影至今还系住许多朋友的心。今天在这窗外细雨如丝的春三月的寒夜，摊开她的遗稿，那些颇为潦草的字迹还在诉说一颗善良仁爱的女性的心的跳动。甚至躺在最后的安息地上，她还发出正义的喊声，为那些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呼吁。我们能说她已经死去了么？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长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死亡，而且也永远不会死亡。

1941年3月在重庆沙坪坝。

《白甲骑兵》[1]后记

世弥的第二个翻译小说集能够在她逝世三年后的今日同读者见面，我觉得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我算是她的遗著的编者，但是这次工作的大部分都是黎兄代我做了的。他也是世弥的友人。

译文五篇，都是从法文译出的，四篇录自《译文》月刊，一篇从《文学季刊》中抄出。抄录的事情是黎兄找人代办的。《贝多芬笔谈》因为不是小说，所以排作附录。关于原作者我无话可说，因我手边无一本可作参考的书。译文后面原先附有介绍之类的“后记”的，在这里自然全部保留。未附有的，就只得让它缺如了。

这样办，我其实不能算是尽了责。不过这些日子我们是在一种抓彩的情形下过活。我们的大部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面。我们每天都抓彩。抓的不是金钱，却是死亡。倘使一旦抓到，则在轰然一响之后，我的心灵就会消灭，我也没有机会来做任何事情了。因此即使草率地做完一件工作，在我，也是一桩值得欢喜的事。但这情形不知道会不会被一般的读者了解。

1941年8月17日昆明。

---

① 《白甲骑兵》，罗淑的译文集。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心字》[1]后记

和剑波分别有四年了。他常有短文在成都某报副刊上发表，有时也寄我几份剪样。我喜欢他那些含蕴着强烈生命力而不带丝毫说教意味的文章。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要为他编印一个集子。他不怪我多事，却很爽快地把他近四五年来的短篇作品全交了给我。我挑选了二分之一出来编成这本小书。《心字》是他自己起的名字。

读着剑波的文章，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激荡，仿佛就要把我的心推出我口腔来，又好像要将它捣成粉碎似的。接着我全身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这颤动一下就过去了，但我感到相当长期的喜悦。这不是在编造故事。剑波的文章触动了我那没有好好使用过的"生命力"，它在激荡，它要求放散，它不愿意在我身体内枯死，它需要着居友[2]所说的："开花"。对我，剑波的文章就像花开以前所受的雨露或阳光。

剑波是一个病弱的人。但是他却有着极强的精神力量。他过刻苦的生活，做过度的工作，二十年如一日，不仅物质的缺乏折磨着他，他还受到常人无法从其中自拔的精神上的煎

---

① 《心字》，卢剑波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居友，法国哲学家。

熬。（我应该特别提出恋爱的纠纷，他为这个受过不少人的指摘，有人说他是"自作自受"，但我知道他是在赌着生命地恋爱着。他从没有想过掩饰自己的矛盾，却企图用自己的健康和痛苦来消除它。）他已经年过四十，而待人对事，却始终保持年轻人的认真与热情。他受过多少打击，熬过若干艰苦，可是他一直不曾失去他那颗"赤子心"。二十年来他在贫病交迫中，难得有一天舒适的生活。他的身体已经瘦得不像样了，人们常常把死和他的影像连在一起而问着，"剑波还不曾死吗？"（在一篇短文里，他自己这样写了出来。）但是他没有失却生的意志，他还写出歌颂"生命的欢乐"的文章。他"为生命而奋斗，为奋斗而痛苦"。他战胜了疾病，征服了死亡，他怀着无比的勇气和信心说"我不想死"，又说："我拖着病的身体，但我愿意将剩余的一半生命献给真理的探究与阐发。我和病争夺生命而不愿徒然地跌仆下去。"的确他没有跌仆下去。

有人说剑波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活得很硬，这是一种奇迹，其实并不是。他有着很强的精神力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他还有着爱的心，（他自己用了盲诗人爱罗先珂的说法，"爱字的疮"。）"爱"给他带来痛苦，但也给了他精神力量。他的爱是无限的。他"爱生命，甚至爱残缺，以怜悯的心跟哀矜愚昧与痴顽"。他"早晨惊讶于恒河沙数的辉灿的明珠，点缀在枯黄的草叶上，知道天心也不惜夜夜分给每一茎草叶以一滴慰安之泪"。他相信"终有那么一个普天之下人类的心都奏着谐和的曲调的日子"。他甚至要求"为着爱——为了必得有一个人献身于祭坛之上的时候，便让我来"！多么深厚的不自

私的爱。这便是他那强烈的生命力的来源了。

我和剑波在二十六年前第一次通信，二十四年前第一次见面。我那时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他和我同年，但他比我更有勇气，而且跑过更多地方，做过不少惊人的事情。有人批评他“锋芒太露”，又有人说他“年少气盛”，也有人称他为“才子”。他自己则愿意做一个为理想献身的革命家。虽然在二十岁以前他因为宣传新的理想，受过军阀的拘禁。可是他始终找不着牺牲的机会。这是他生涯中的一个时期。后来他改变了生活方式，我想应该是环境使他改变的。他自己解释，由于“年岁渐长”和“身体的早衰”。他做了十几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在四川的一个角落里，几乎与外面世界隔绝。而“心理的外向性也逐渐收敛得像一只封闭在茧子里的蚕”。这是他生涯中的另一个时期。他默默地在和疾病与贫苦战斗，虽仍有热情，却“已无澎湃蒸腾的气焰”。他不再存有“尽情尽性放出光耀与热力，烛照黑暗、温暖冷冻”的雄心，却自比于沙漠中的骆驼，始终走着“稳定沉着而不退转的步伐”。骆驼不空作绿洲之梦，他却一直“抱持着一个对真理的信心”。他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平凡，身体更衰弱，可是他的信仰更坚定，思想更成熟，观察也更透彻。多年来生活的体验与真理的探究如今在他脑子里完全消化了。结果出现了他那许多篇文章。他不再被人称为“才子”，他也不再显露那火花一现似的锋芒。他的眼界，他的四周扩大了。他的脚步稳定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而‘人’的生命无限，时间无限。”瞭望无限的将来，他“存蓄着无限的希望”。

生活在无数青年学生中间，他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他说：“新春总是充满着生命之力的，朝阳总带着新生的光与热冉冉上升。为了创造而永远有着老的死亡，朽的腐溃。”他相信“春快到人间了。具有丰饶的生命力的一代舞台幕景快揭开了。”读着他的文章我仿佛听到了关于新世界到来的预言。

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文章！虽然他至今还是一个没没无闻的中学教师，可是我喜欢我有这样一个朋友，我更以能够代他编辑这一本集子为我的光荣。

1947年6月20日。

《一个反抗者的话》[1]前记

《一个反抗者的话》是克鲁泡特金的第一部革命的著作。这书的前几章是在一八七九年中写的。他写这几章的时候，他看见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无产阶级的再度觉醒，拉丁诸国劳动运动之迅速的发展，俄国青年之热烈的献身精神，德国社会主义宣传的扩大，以及欧洲一般的经济情形之濒于崩溃，他以为一个全欧洲的社会大革命就要爆发了（作者自己后来在一九〇四年五月为本书意大利文本作序时，曾这样说过），他仿佛在向他的同胞们预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他好像要领导他那些目前尚陷在贫穷与劳役中间的弟兄去争取新的黎明，所以他在那些文章里用了不少带煽动性的辞句。奔放的热情无法制止地从他的笔端流下来，他的心同着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心一块儿在跳动，他丢开了写地理学论文和调查报告时用的那种文体，丢开了为《自然杂志》写科学文章用的那种文体，他现在要为劳动阶级讲话，要向劳动阶级讲话，他要唤起劳动阶级的热情，也要敲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德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鲁多夫·洛克尔（R. Rocker）说："在这书里面燃烧

① 《一个反抗者的话》，克鲁泡特金著，毕修勺译。一九四七年八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

着克鲁泡特金的革命的激情。他的精神所感受的一切，他的心灵所铭刻的一切都在这书里找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表现。”这评语并不是夸张的。

克鲁泡特金写这书中所含的各章时，他的年龄不曾到四十，他正在青春，但他已经经历了一长段丰富的生活，和革命的斗争以及入狱逃狱的壮剧。他本是一个俄国皇族，却为着革命放弃了爵位和财产；他本是一个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却为着革命牺牲了学术界的荣誉。因此他能深刻地理解革命，更能真正“燃烧着革命的激情”。他有着深厚的科学的修养，所以就在他燃烧着革命的激情，充满着青年的热情时，他还能够保持他那科学家的头脑，他还能依据缜密思考的理解。在全书中他始终保持着两个特色：唤起行动的热情与合于伦理的分析。此外作者还有着丰富的学识。像《代议政府》、《法律与强权》、《革命政府》、《反抗的精神》等篇，洛克尔评为“证明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之光辉的论文”，早经分印小册，在世界各地散布甚广。至于《告青年》，则已成为社会主义宣传品中的古典作品，差不多有了全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单是在中国就已有过三种译文，流传二三十年，数目在十万册以上，正如洛克尔所说：“从这燃烧着最深的人类爱与最高的理想主义的字里行间，人们第一次得以正确地理解那个惊人的运动的精神（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这精神当时感动了成千的青年男女，使他们抛弃了以前的生活，甘愿过那种手工匠、农工、看护妇等等的艰苦的日子，去向人民报告关于他们的就要到来的解放的消息”。

本书各章和作者的后一本著作《面包与自由》一样，是用法文写的，在日内瓦出版的法文刊物上发表的，所以也和《面包与自由》一样，书中引证的事例常常取自法国的生活，作者是以拉丁诸国的读者为对象而写这书的。后来作者在一九一九年为俄国劳动之声社校订本书的俄文译本时，曾经为俄国和别的国家的读者加添了不少的脚注，最后关于社会革命与经济改革这个问题，作者还根据新的材料添上一篇“跋”，我已把它们译出添加在中文译本里了。一九一九年的俄文本是本书的最新的本子（石川三四郎的日文译本出版虽较后，但那是根据法文本翻译的），可是距离现在也将近三十年了。而出版期更早的法文本则是六十几年前的旧作。书中所举事例到现在看，有的也许稍嫌陈旧，可是作者的主要的论据到今天还不曾被人推翻，新的事例反而供给了更多的补充材料。不但这样，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后所写的“跋”中预言的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实现；而且在第二次大战刚结束的今天，人们又在呼吁“防止第三次大战”了。今天读着作者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所写的这一段话：

> 只要某一些国家以为自己应当从事制造品的大量生产来赚钱致富，并且把另一些落后国家拿来任意分配，好让那些落后国家来供给它们需要的原料，而它们自己却靠着别人的劳力积蓄起财富来，只要这样的事情存在一天，那么像上次大战那样残酷的战争便不可避免，并且还会有更残酷的战争。

谁能不“毛骨悚然”！

毕修勺先生的译文由我匆匆校阅了一次。译者另有序文一篇为我删去，现在只将那“序”的最后二节录在这里，

> 本书的原名是《一个反抗者的话》，共十九篇，其中有十几篇是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作工时候译成的，文字方面颇有生硬与难懂之处，此次经我完全重译过；《告青年》一章有巴金的译本，现在征得他本人同意，仍用他的旧稿。
>
> 本书与《面包与自由》（法文本原名《面包略取》）是姊妹作；本书是批评性的，凡盛行于今日的各种制度，都用科学的眼光，加以批评，如我以上所说，是陈述病原的著作；《面包与自由》是建设性的，探出病根之后，施以对症之药，使人类可以恢复健康，社会可以达到安乐；法国大文豪左拉誉为“真理之诗”，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的巨制，故读了本书之后，必须再读《面包与自由》，才能窥见克鲁泡特金学说的全貌。

巴　金 1947年6月5日。

《鲁彦短篇小说集》后记*

鲁彦夫人要我替鲁彦编选一本短篇小说集，我没有理由拒绝，我爽快地答应了她。我是鲁彦的朋友，鲁彦的小说我全读过；我有时还同他谈过我对他某几篇小说的意见；他也常常对我讲起他写作的苦心，和他对自己作品的爱好或不满。所以从鲁彦遗留下来四十多个短篇中，编选一本集子，在我并不是一件难事。

鲁彦生前自己编印的小说集有：《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雀鼠集》、《河边》、《我们的喇叭》七种（另外一册短篇小说总集，也是他自己编的）。我现在选编了七篇，《杨连附》和《陈老奶》两篇是抗战后的作品。本来我还想把《河边》选入，可惜手边没有良友版原书，只得割爱。他也写过创作经验谈。那是一篇叙说他的创作苦心的好文章，现在把它附印在卷末，对那些愿意更深切地了解鲁彦作品的读者，它会有一点帮助。

鲁彦逝世已过两周年。我和他相交十三载，可是他在病中，我不曾帮忙减轻他的痛苦，临死我又没有到他的病床前照

---

* 本篇曾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学风》第二卷第一期。

料。殓，我未能抚到棺木；葬，我未能见到墓穴。甚至，在他病逝前一年，我还为着没有答应继续给他的刊物投稿，使他伤心。今天在这炎热的上海的秋夜，一间堆满家具的小楼中，重读他一生的作品，他那带病容的瘦脸还依稀现在我的眼前。这似乎是我为我这位善良的亡友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要是我没有做好我这工作，愿他的亡灵能饶恕我。

《月球旅行》[1]后记

七年前友人在学、振寰两兄在上海创办《科学趣味》月刊，那时林兄刚从天津来上海养病，住在在学兄的家里。《科学趣味》是同人杂志，撰稿人不多，有时缺稿，在学便拉林兄帮忙。林兄不是研究科学的人，不过他的兴趣较广，也喜欢读一点通俗化的科学文章。振寰兄那里有的是英、美的通俗科学杂志，他便借了一两种来，选译了几篇短文，陆续在第一、二卷的《科学趣味》上发表。后来他忙着翻译冈查洛夫的长篇小说，而《科学趣味》也增加了好几位固定的投稿者，刊物不缺稿，也不再有人来逼他。他把他的时间完全放在文学和音乐上面。那以后他还译过半部科学小说。但是他的健康已经完全毁坏了。"养"对他没有多大的用处。"胜利"前最后两年中他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受着大的压迫。上海的市民会记得那样的日子，那些日子！

现在我编印这本小书，一是为了纪念林兄，二是因为我喜欢他的译文。单为纪念，我用不着花费读者的时间，必须文章有意义，对读者有益处，才值得印出来。而这些短文确实是值

---

[1] 《月球旅行》，李林译。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得一读的。

这里一共收了七篇译文，其中三篇发表时未注明原作者姓氏，现在我也无法查考，就让它缺着。《环球独航记》一篇则是在《万象》上发表的。

巴　金 1947年7月。

《大姊》[1]后记

我并不认识郑定文先生，他开始在上海《万象》月刊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还在内地，等到我在"抗战胜利"后第二年五月回到上海，《万象》早已停刊，而他也已去世了。

读者们似乎已经忘了他，我不曾听见谁提到他这个名字，可是他的朋友们并没有忘记。我不会有机会读到他的文章的，要不是他的一位朋友魏先生特地把它们送来，托书店转给我看。在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读了它们。它们使我感动。我喜欢那些平凡的故事，那些琐碎的情节，那种朴实的文笔，那种自然的抒写。他在叙述自己的生活，[2]诉说他自己和四周围的人，尤其是他四周的人的痛苦。看，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写得那么亲切，那么真实。正如他另一位朋友尚钧先生所说："他是站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同悲哀，一同快乐，他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太熟悉了，他和他们的悲剧太接近了。"

我写信告诉魏先生，我愿意把郑定文先生的小说集收在我编辑的"文学丛刊"里面。魏先生回信说作者生前未能将集子编好，现在要请我担任编选的工作，他还补送了一堆稿子

① 《大姊》：郑定文著。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小说中的"定文"大概就是他自己。

来。我有感于魏先生对亡友的不渝的友情，我也同情郑先生的不幸的遭遇，我没有说一句推辞的话。

我为作者编好了这个集子，并且为他看过了校样，我想到不久便可以把这小书印出来介绍给我的一些读者，我觉得高兴，同时我感到痛苦，作者是不应该早死的。他有写作的才能，也有艺术的良心。要是他不落在那种贫苦的境遇里，让他好好发展自己的才能，要是他有个较安定的环境，让他自由地、安静地写作，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一点点，这一册《大姊》不过是一个开端，可是他却没有机会"发展下去"。在这一点上，我们总算比他幸运多了。读着这些贯串着似淡而实深的哀愁的文章，我想到这个我素不相识的作者的短短的贫苦的一生，我真愿意我能够大叫一声。我要叫出我心上那些魂磊。

魏先生送来作者生前或死后发表过的长短文章一共十四篇，其中有两篇类似文艺杂论而又写得不好的东西，我没有采用。附录一篇也是魏先生交来的，我认为那是一篇相当好的纪念文（从它我才知道郑定文其实是一位蔡达君先生的笔名），并且我也没有看见别的叙述作者身世、为人和性格的文字，所以我把它附印在卷末。我不知道尚钧先生是谁，也无法征求他本人的同意。好在这个集子的版权是属于作者家属的。为了帮助读者们了解作者起见，我采用了尚钧先生的文章，我想他一定能原谅我。

集子的题名用《大姊》，这是魏先生提出的，他的理由是"这两字叫起来很响亮，并且郑定文这名字给人惊异的发觉，

原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我同意他的话。

1947年10月。

再 记 我写好了这《后记》，便将前面提到的两篇未收入的稿子退给魏先生，今天得到他的回信，才知道他也并非郑先生生前的友人，现在将他的话抄一段在这里，算是更正，并且请他原谅：

> 老实说，我和郑定文并不相识，只是他死后我结识了他的几个朋友，他们同意（并且高兴）我去找几个出版机关接洽罢了。所以他家属的地址，我还得打听起来。……

同年11月。

《伊 达》[1]后 记

这本小书也是我替译者编辑的。李林并不是什么"名翻译家"或"翻译名家"，他生前不过是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员。据我所知，他对教书这职业很感兴趣，他喜欢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也喜欢他。他颇有做一个普通中学教员了此一生的意思。我觉得他真正是一个亚米契斯的小说（即《爱的教育》）中的教育家，真诚，朴素，善良，认真而又那么富于人情味。

清苦的教书生活摧毁了他那本来就不很健康的身体，他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二岁。他不想死，至少有三件事牵系住他的心：一、读书；二、听音乐；三、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教育年轻孩子。（在英国语文的教学中，他还教他们怎样做人。前几天他的三个学生来信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那瘦削的但充满精力的身子在黑板前给我们讲书的情景，我们更不会忘记他由课堂中把我们带到操场上围坐唱歌时的快乐……"今天我又接到他另一个在湘雅医学院念书的学生的信说："他造就了我，他给了我一个生活的榜样……"）

翻译的工作不在这三件事里面。

---

① 《伊达》：李林译，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不过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译稿，说多，或许不算多，说少，却也不能。译稿中有长短篇小说、剧本、科学文章等等。可是他亲眼看见印成单行本的就只有一册《悬岸》。《战争》(三幕剧)和《无名岛》(通俗小说)付印时他正在病中，他还来不及看见校样就"长辞此世"了。《月球旅行》(科学鳞爪)是我代他编辑的。这本小书自然也是。此外还有一本中篇小说和两个半部长篇译稿(其中威尔斯的长篇小说的后半部已由他的学生黄裳先生续译)，也将由我整理出版。

他从事翻译只算是"客串"，可是他工作时构思、下笔都非常认真，他只翻译他喜欢的作品，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所以他的译文中也有科学文章和通俗小说。他翻译《悬崖》和《月球旅行》时，正和我住在一处，我们分住在两间屋子里，他常常为了书中的一字一句，走到我房里来自己反复念着，并且问起我的意见。译稿有时还要修改抄录几次，才拿出去。他翻译时就像自己在创作，虽然他不是一个小说家。

卷首破例用了译者的遗照。和那四篇文章的原作者比起来，他虽然只是一个"没没无闻"的清贫的读书人，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还有好些年轻人爱他敬他，他们得过他的益处，他们不会忘记他的。为着他们，我把他的遗照印了出来，让他们保留着这个纪念吧。

1947年11月。

《碑下随笔》[1]后记

这本小书是我替崇群编辑的。他的遗著原不只这么一点儿，可是这几年中间我搜集到的就只有这八篇短文。记得三年半前崇群逝世后我去北碚看他的遗体（其实我看到的只是筑在一个斜坡上的新坟），曾和几位朋友谈到刊行崇群的遗著和编印全集的计划。我希望Z兄[2]负起整理遗著的责任。因为Z兄是崇群的好友之一，他当时住在北碚，崇群的丧事还是由他料理的。他读过崇群的日记，崇群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寄发文稿、信函，都要在日记中写下篇名、日期。根据日记来整理他的遗著，应当有令人满意的成绩。可是这些年Z兄一直在忙碌中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从文喜欢用的句子），而跟着"胜利"来的又是出版界的不景气。我始终没有得过Z兄的消息，而出版全集的希望也在"不景气"的冷风中给吹散了。我不知道Z兄是否还在进行整理崇群遗稿的工作。

可是我不能够等待下去。我手边还留着这八篇费了力搜集起来的短文。我耽心会把它们失去。一九三八年冬天在桂

① 《碑下随笔》：缪崇群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Z兄：即左恭，胥之。

林东江路的木屋里，崇群做过几天我的客人。我读过他那时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我称赞他，信写得好，我说他不像我，"写信时拿起笔随便乱涂几下就算完事。"我还带笑地对他说我要替他编辑一本厚厚的"崇群书简"。他没有表示抗议。从那时候起，我就留意搜集他的信札。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第三次离开上海去内地时，上海的书斋中还保存着几十封崇群的旧信，有的从昆明寄来，有的从石屏寄来，还有些是他从贵阳寄到桂林，我又从桂林随身带回上海的。可是这些信在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租界以后，被留在上海养病的我的哥哥完全烧毁了。我去内地后在桂林的书房里又积了一大堆他写的信函，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大火中它们跟着文化生活社的全部存书一块儿化成了纸灰。最后在重庆我又得到十多封他的来信，我把它们全保留起来，我珍贵这一束遗札。胜利后的第二年，我在重庆买不到船票东下的时候，一个朋友的朋友愿意为我先带两箱书物去上海。崇群的遗札就在这些书物之中。这一次居然又遇到意外。箱子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早晨送上了船，到两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它们的消息。崇群的最后的几封信也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前两天偶尔跟一文① 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也保存了一些崇群的书札，但是胜利后在重庆却被人当作烂纸卖掉了。可见在这个年头要不让一件东西毁灭，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我的耽心更不是多余的了。

然而这里也收了他的五封手札。《短简》一、二都是写给

① 一文：田一文(1919—1989)，当时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

我的，因为发表在他生前，它们才逃掉了毁灭的恶运。《短简三则》是写给他一个昆明朋友和另一个石屏女学生的信，却是为了他的逝世周年纪念在昆明某报上发表了的。那个学生当时还是一个女孩，现在则已做了孩子的母亲了。

用《碑下随笔》作这集子的名字，自然是我的私意。但这些短文的确全是在“碑下”写成的，连《短简三则》也是，就除了那两封给我的信。H兄①在他的《晞露新收》编者序中曾提到那本“没有完成的定名为《人间百相》的书”，崇群生前也对我谈过他有意描写“人间百相”，而且他谈到靳以的《人世百图》的时候，还写信给靳以讲他的“人间百相”的看法和写法。可惜病妨害了他的工作，他似乎只写出了“百相”中的几相，大概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更生》，《流民》几篇吧。也许还有更多的，可是直至现在我还没有机会见到。

H兄编选《晞露新收》时，曾经写过：“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长存下去，而像他那样可珍贵的友情，在这人间恐将永无重获之期吧。”今天，在炎热的七月下旬的正午，我坐在阳光满室的小楼中校完了崇群的遗稿，市声嘈杂地送进我屋子里来，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透过这些杂音，一个熟习的声音向我的耳朵慢慢接近，我明明听见他在唤我的名字！那是崇群！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声音。我放下笔。可是我带着痛苦地想起了H兄的话，我和他有同感。然而我

① H兄：即韩侍桁。崇群的老同学。

又禁不住要问自己："难道世间真的就没有不跟着肉体同死的友情么？"

我不相信。对于我，他的友情是不曾死的。我就靠着它活下去。是的，我是靠着友情活下去的。

1948年7月25日。

《何为》(新版)[1]前记

这本《何为》是从薇拉·司塔尔科瓦的法文节译本转译的。俄文原著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3] 节译本虽只是一个概要，但作为一个中篇小说，或较长的短篇小说看，它也是一件不坏的艺术品。

译者罗淑是一个留法的女作家。《何为》节译本是她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里译出的，曾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过两千册，但也已绝版多年了。最近编者偶然在旧书堆中翻出译者的手稿，觉得还有重印的价值，便把它交给平明出版社负责人拿去重排。

关于车尔勒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也是罗淑的译文，《何为》初版本中没有收入，记不起来是为了什么缘故。现在编者把它放在新版的卷首，让它第一次跟读者见面。

译者罗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成都病故。过些天便是她的逝世十二周年纪念日。她在这人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四年，可是她也已留下了一些不能被时间磨灭的纪

① 《何为》新版，一九五〇年三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③ 即《怎么办》，蒋路译。一九五一年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

念。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在想念她。那么这本小书就作为供在她的灵前的祭品吧。

1950年2月6日。

《上海十年文学选集》[1]总序

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横暴、黑暗的统治。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一个光明灿烂的新时代开始了。东方的太阳带着无限的热力和夺目的光芒升上天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怀着无比的信心和无穷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在从事前人所梦想不到的光荣事业。每颗心都愿意变作一瓦一砖来建筑社会主义的大厦。十年来，经过了一系列伟大的运动，尤其是在党先后提出的两个总路线的光辉的照耀下，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旧中国在一切的困难面前低头，新社会好像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聚宝盆"。在党的领导下六亿五千万人民从一盘散沙变成了钢铁一样的坚强团结；人的精神面貌从"各人自扫门前雪"改变为"为子孙万代谋幸福"；钢的生产量从十六万吨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吨，粮食的产量从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增加到五千

---

① 《上海十年文学选集》，分短篇小说选、电影剧本选、曲艺选、散文杂文选、论文选五集。一九五九年九月至一九六〇年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五百亿斤；荒地上建造起繁荣的城市；杳无人迹的深山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工业基地；沙漠变成了良田，海上筑起了铁路；高山可以随人意搬家，河水可以听指挥改道；农作物年年增产，工业品销行全世界；科学文化普及到偏僻的角落，工农群众创作了千万首动人的诗篇。人民公社给农村增加了欢乐的气象，给农民带来了更大的幸福；大跃进给新中国带来了无比辉煌的成就，给人们展开了无限美丽的远景。创造奇迹的新人天天出现，移山倒海的新事时时产生。人的精神面貌天天在改变，社会的面貌天天在改变，国家的面貌天天在改变，改变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变化越来越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一等强国，被践踏、受压迫的"东亚病夫"一下子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东方巨龙"，……十年来我们做了多少、多少震惊世界的大事情！不用说，十年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这个伟大的开端已经给我们保证了今后光芒万丈的锦绣前程。

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应当感到莫大的幸福。严肃的文学工作者都有责任反映这种丰富多彩、绚烂无比的现实生活，描写我们人民的吞日月贯长虹的英雄气概。不必讳言，我们的文学跟伟大的现实比起来还显得苍白失色。但是我们的文学事业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说明我们的作家始终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地执行了党和人民交给作家的光荣任务。十年来我们的文学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灯塔的照耀下，在工农业大跃进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文

学界中也出现了一个跃进再跃进的新局面，当前工农业战线上的火热斗争，工业建设的雄伟场面，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新事，在我们的作家的笔下，都得到了迅速的反映。新的作品大量地产生，新的作者不断地出现。我们在欢庆文学丰收的时候，还因为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创作运动的出现而感到万分兴奋。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工农出身的作家给我们的文学事业注入了更多新鲜的、健康的血液。新中国的作家的确没有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论是专业作家或者业余作者，不论是一诗一文，一戏一曲，都或多或少地绘出了新中国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让读者看到我们伟大时代的光辉面貌，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这个选集里的每篇作品都可以为以上的话作证。建国十年来全国文学选集将在我国首都北京出版。这个选集称为《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由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编委会编辑，在上海印行，广泛地收集上海十年间较为优秀的作品，来说明这个地区各方面出色的成就。所选作品有的反映了上海地区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生活，有的作品所写的虽非上海的题材，而作者当时却在上海工作，因此作品本身便可以表现上海文学工作的成就。

时代不停地向前飞奔，英雄的人民决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回顾过去无非为了更勇敢地、更有把握地奔向未来。未来是无限壮丽，无限美好，无比光明，无比雄伟的。但是新中国向前迈进的每一大步都依靠着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冲天干劲。跃进是没有止境的。光芒四射的总路线的灯塔一直照亮

着全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我们期待着我们的作家，热烈地响应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继续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和群众路线，充分地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为保卫总路线做冲锋陷阵的战士，燃起更强烈的心灵之火，擂起更响亮的咚咚战鼓，跟着六亿五千万人民一起奔向未来，显露更大的才华，怀着更高的政治热情，鼓足冲天的干劲，付出艰苦的劳动，写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未来的中国和未来的上海的作品，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服务！

1959年9月7日。

《热情的赞歌》[1]序

这是靳以的最后一本集子。他在《江山万里》和《心的歌》编成后写的文章都收在这里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是罗荪同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做的。同志们为了表示对于死者的敬爱，在这本集子上花了不少的心血。靳以要是活着见到这本集子，他一定会感谢同志们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给这本集子取一个名字：《热情的赞歌》。这五个字是读者对靳以这些文章的最普遍也最恰当的估价。靳以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天了。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到读者和朋友的来信，说靳以的逝世是人们的一个大损失，因为他再也不能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唱出新的"热情的赞歌"了。的确，靳以倘使能再活几十年，他一定会写下数不尽的更激动人心的诗篇。他的早逝使我们大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诗人和一个热情的歌手。

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美好的东西，这本集子便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些"热情的赞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作为读者的感受和领会："你用了那么热烈、那么欢乐的

---

① 《热情的赞歌》：靳以著。一九六〇年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调子，歌颂十年来千千万万无限美好的事物；你用了诗一样的激情的语言抒写个人深切的感受，歌唱人民的幸福生活。……我读你的文章，总觉得仿佛作者从纸上伸出手来，紧紧地拉住读者向前飞奔。你把你对新社会的热爱尽量地放在文章里面，你把读者全当作你的朋友，向他们倾吐你最深的感情。读你的文章我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在你的文章里充满的是生命。”

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死的，这样的歌声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巴　金 1959年12月27日。

《胡絜青画集》[1]前言

十年浩劫之前，我每次到北京，总要去老舍同志的家，照例先见到他的夫人胡絜青同志。她让我在客厅里坐下，然后进书房通知老舍。老舍出来，闲谈一会，他们夫妇就陪我到王府井大街或者东安市场走走，有时也去书画社看看。我记得有一次他买了一把折扇送给我，他们夫妇都向我解释扇面上谁写的字，谁画的画。虽然我对书画是外行，听了很快就忘记，但他们的好意我却忘记不了。还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到他们家去，老舍书房里一张桌上放了十几把老式折扇，他要我们每人挑两把拿回去。他说，这都是他最近买来的，在扇面上题诗作画的人全是清代北京的知名人士。谈起这些人他们非常熟悉。我们高兴地接受了礼物。我知道絜青同志是白石老人的弟子，我当时曾经想：拿一把折扇请他们两位给我写字作画留个纪念吧，可是我还不曾有机会把这想法讲出来，浩劫来了，几把折扇也全给拿走了。我仿佛落进了但丁的“地狱”里面，一下子变成了“牛”。在“牛棚”里听到关于老舍的不幸的消息，我将信将疑，但从自己的处境来看，我又感到凶多吉少。后来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也成了问题，再也没有精力考虑其他的

[1] 《胡絜青画集》，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龙狮子会印刷。

事情，活着就像做梦一样。

我渐渐脱离了“险境”，可是越来越多的消息证实老舍悲惨的死亡，传播消息的人常常添上一些可怕的描写。我空下来，想起那位正直善良，才华横溢的作家会得到“家破人亡”的下场，我感到不平。我不知道絜青同志和孩子们在哪里，但他们的处境我也可以想象到，我多么希望他们平安无恙！

终于盼到了云散天青的日子。压在我头上的大石给搬走了，我又从“牛”变回到人，恢复了人的权利。我到了北京，到了过去常到的老舍的家，一次、两次、三次……我见到了絜青同志，读了她写的回忆文章，我看到大的变化。破碎的家庭又团聚了。老舍的遗著逐渐得到整理出版，多卷本文集的编辑工作也已开始。杰作《茶馆》将在欧洲演出。关于对这伟大作家的纪念，应当做的工作都在进行……我坐在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客厅里，同絜青同志和孩子们畅谈，我总觉得老舍就在我们中间，我仿佛几次听见他的笑声。他应当为絜青同志这些年的努力感到高兴！

—

去年四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动身前我和孔罗荪同志到丰富胡同拜访絜青同志，向她讨画，准备赠给法国朋友。她为我们绘了三幅。法国文化界朋友重视这样的礼物，他们敬重《骆驼祥子》和《茶馆》的作者，也敬重他的夫人。絜青同志的《红梅》挂在法中友好协会的会所，美丽的花朵象征着中法人民的深厚友谊。对绘画我没有发言权，但对人民的友谊我却是深有体会的。为了这个我感谢絜青同志。

[illegible]月31日于北京。

《靳以文集》[1]后记

去年是靳以逝世的二十周年，我写了一篇怀念他的短文。我当时这样写道：

> 时间好像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
>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刊物，我也写文章，编丛书。他寄稿子给我，我也给他的刊物投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关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庆，开始在复旦大学授课，他进了教育界，却不曾放弃文艺工作。二十几年中间，他连续编辑了十种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艺附刊，写了

---

① 《靳以文集》：两卷本，上卷初版于一九六四年，一九八四年再版；下卷初版于一九八六年。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前夕》和三十几本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语文教师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帮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视着他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走过的道路，我看见那些深的脚印，他真是跨着大步在前进啊。从个人爱情上的悲欢开始，他在人民的欢乐和祖国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热烈，到处都听见他那响亮的、充满生命和信心的声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

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好像他又在发问。"写吧，"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语言今天还在给我以鼓励。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

革命公墓里。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到上海慰问他的家属，问起有什么要求，家属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选集或者文集。协会同意了，出版社也答应了，不过把编辑的事务委托给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办理。最初听说要编四册，后来决定编成上下两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数少，没有人注意，而且"大写十三年"的风越刮越猛，即使还没有点名批判，出这样的书已经构成了右倾的罪名，再没有人敢于提起下集的事。于是石沉大海，过了十几年还不见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属问原来的编辑人，说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还没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现在纸张缺乏，"或者"不在计划以内。"不过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运，只要风往这边一吹，下集马上就会出来。否则……谁知道靳以是什么人？已经十几年没有印过他的一本书了。

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八月十一日。

最近靳以的女儿洁思把《靳以文集》下集的全稿送给我看，我才知道出版社愿意履行诺言，尽它的职责，把落在大海里的石子拣回来。当然海底捞针，只是神话里的事。下集原稿早已丢失，现在看到的是重新编选的稿本。经过十年浩劫

之后，我又看到这样一叠文稿，它们多么值得珍惜。我相信这一次不会再有什么阻力了。

靳以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作家，又是认真负责的编辑，还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他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后来发病住院治疗，还在病房里审稿校稿，可以说他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早逝是一个大的损失。他留下不少的作品（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等等），在读者中间产生过影响。香港书店不久前还编印过《靳以小说选》和《靳以散文选》。对今天的读者说，上下两册文集似嫌份量太少。希望将来能看到靳以的多卷本文集。这大概不是我的奢望吧。

1980年12月7日。

《写给彦兄》附记*

覃英同志编成《鲁彦选集》①，有人建议找我作序。她知道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一时无法写出什么，打算重印我在三十几年前悼念鲁彦的文章。她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覃英同志是最适当的写序的人。她同鲁彦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些年，在艰苦的日子里，她都在他的身边，安慰他，帮助他，支持他。她熟悉他的作品，编选他的集子，也最了解他。但是她谦虚，一定要让鲁彦的老友先讲话，我怎么好推辞呢?!

作为序言，即使是"代序"吧，我的文章也不够标准。它既未介绍作品，谈鲁彦的为人也谈得少。在这两方面可谈的本来很多，但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写什么。不过关于鲁彦，我相信会有人写出更多的文章。好的人，好的作品是不会消亡的，作家鲁彦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

1982 年 10 月 7 日，巴金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写给彦兄》，见《全集》第十三卷《怀念》。

① 《鲁彦选集》：一九八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冰心传》[1]序

卓如同志：

信早收到，我指的是您写给冰心大姊要她找我为传记作序的那封信。对您我并不感到陌生，我在北京医院大姊的病房里见过您，即使我们没有机会交谈，可是我经常听见大姊和家人讲到您，知道您在搜集资料，为她编全集写传记。大姊对孩子们开玩笑说："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可以问卓如。"拿起大姊转寄来的厚厚一叠《冰心传》翻了翻，我也不得不佩服您这个"冰心通"。您唤起我数不清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事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我还记得离家前的那个夏天满园蝉声中我和一个堂弟读着《繁星》，一边学写"小诗"。这些小诗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虽然我就只写了十几二十首。我不是诗人，我却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我的前面，我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给您回信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一位诗

---

① 《冰心传》，卓如著，一九八八年九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人和她的作品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您写的我已熟悉，您讲的我也知道。不用翻阅您寄来的厚厚的印张，我早已回到六、七十年前温暖的梦中。我有那么深的感情，和那么多的回忆！为《冰心传》作序，我担心病中无法从容构思，写不出像样的序文，但是我又不能交一份白卷，因为我有责任为我那一代人表态。我不敢一口答应，也不愿一口谢绝。

就在这个时候，热浪袭击上海，我坐立不安，度日如年，无法动笔，又不能搁笔，感到进退两难，忽然看到大姊写给香香的信，短短的一句："也只要几句真话！"这是对我说的。我明白了。的确有几句真话我非讲不可。

冰心大姊不过比我年长四岁，可是她在前面跑了那么一大段路。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一个产儿。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尽管她几次摔伤、骨折，尽管她遭逢不幸、失去老伴，她并不关心自己，始终举目向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虽然她有很长的写作经历，虽然健在的作家中她起步最早，她却喜欢接近年轻读者，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汲取养料。

她这个与本世纪同年龄的老作家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的最后一位元老，这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但是把"老"字同她连在一起，我又感到抱歉，因为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我劝她休息，盼她保重，祝愿她健康长寿。然而在病榻前，在书房内，靠助步器帮忙，她接待客人，答复来信，发表文章。她呼吁，她请

求，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我听说有人不理解她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随意地删削它们。我也知道她有些“刺眼的句子”不讨人欢喜，要让它们和读者见面，需要作家多大的勇气。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她，大多数作家敬爱她。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作为读者，我不曾上当受骗；作为朋友，我因这友谊而深感自豪。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思想不老的人才永远年轻！

冰心大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传记就是一本读了使人感到永远年轻的书。

巴　金 1988年7月28日上海。

西班牙的血

附《西班牙的苦难》

《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画家加斯特劳绘。一九三八年四月由平明书店初版，同年七月再版。一九四八年十月与《西班牙的苦难》（绘者同，一九四〇年七月由平明书店初版）合为一集，一九五一年三月由平明出版社初版，同年五月再版。

序

在我们的无数酷爱和平的同胞用他们的无辜的血灌溉了他们的家园的时候，我见到了西班牙画家加斯特劳(Castelao)的画册。我们同胞的哀号和地中海畔诗之国土上的呻吟响成了一片。我们眼前出现了汪洋的血海。那许多无辜者的血！然而这血海开始怒吼了。我们求生存的呼声和地中海畔争自由的呐喊压倒了呻吟、哀号与呼吁。我们和西班牙的兄弟以绝大的毅力经历过了同样的苦难，现在更应该以同样的勇气向着伟大的目标迈步了。

这里展开的十幅图画正表现着我们西班牙的兄弟的意志与心灵。这些图画乃是真实的艺术之最优美的范本。它们生活着而且呼吸着。虽然作者谦逊地称它们为"这些速写"，但是它们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每一幅画面上都鼓动着同情与热诚，都闪耀着受苦和牺牲的精神。它们忠实地，素朴地告诉了它们自己的故事，并且体现了一个紧要的而且激励的使命。它们的传播会激起无数温良的人的愤怒与同情。

西班牙的兄弟如今还在和回教摩尔人的骑兵，以及法西斯的德、意两国的机械化部队苦战，以争回他们的自由，重建他们的残破的家园，正如我们目前抵抗侵略以争取我们的独

立与生存一样。加斯特劳是西班牙北部加里西亚省人，所以在画册卷首冠了告加里西亚人的短序。然而酷爱自由愿意重建残破的家园的人不只在加里西亚一省，在西班牙各处都有，在全世界各国都有。在我们这里更有着不少。所以我把这十幅图画献给我的酷爱自由的同胞，让他们在西班牙的血里看见他们自己的血。

巴　金 1938年4月12日于广州。

前　记

这是西班牙画家加斯特劳(Castelao)的画集"Galicia Maritir"和"Atila en Galicia"的合订本。说明是我添写的，原印本仅有简短的画题，虽然简短，却很有力量。"Galicia Maritir"一册，我十年前曾经在广州翻印过，改用了一个题目：《西班牙的血》。两年后，我又在上海翻印了"Atila en Galicia"，换了《西班牙的苦难》的题名。现在重印，我仍然保留着《西班牙的血》中的序言。《西班牙的苦难》初印本中没有附加说明，现在有的说明是这次新写的。

巴　金 1948年9月。

献　辞

一切都是从血里产生出来的。那些侵入加里西亚，把它的可爱的花园，它的河岸和它的海底盖满了哀愁和痛苦的野蛮人，他们使得那地方流出洪水一般的血，这种大量的，丰饶的血会将爱和恨溶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种族来。那般死在野蛮残虐的手里，倒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默默无闻地埋在受苦的加里西亚的土地中的，各党各派的男男女女，农人，工人，和知识分子；你们在你们的伟大的和平里，在你们的伟大的沉默里，等待着罢！会有人为你们的痛苦复仇；你们受的苦刑绝不是徒然的，你们的儿女会活在一个更自由，更美丽，更幸福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与你们的心灵的愿望极相合，而且也很值得你们奉献了自己生命的惨痛的牺牲。

C.N.T.①全国委员会。

① C.N.T.：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

给散布在全世界的加里西亚人

在我自己的悲痛中创造出来的这些速写是给你们看的，我知道你们永远宝爱着自由，而且只有你们能够帮助我们来重建我们的残破了的家园。

加斯特劳 1937年2月于瓦伦西亚。

祷　告

"主啊，他们借你的名义杀人、放火、抢劫、奸淫！"这个诚实的妇人跪在基督的遗像前祷告着。基督的教训是爱，是扶助，是和平。如今那一群信奉他的教训的人却做了和这相反的事情。为什么呢？这问题是她永远不能够明白的。但是她的单纯的心也感到不平地怀疑起来了。



Essi bruciano, rubano, assassinano in tuo nome.

法西斯蒂的上帝

这就是法西斯蒂的上帝。他永远撒布着扰乱的种子，他用火、用剑、用炸弹、用大炮，要毁灭一切和平的城市，在废墟上建立起他的宝座来。



Ecco il dio dei fascisti.

“胆小的！杀人的凶手！”

法西斯蒂的上帝需要着血宴。刽子手们活动的机会到来了。连无抵抗的妇女也不能逃掉惨酷的命运。房屋破毁了、财产抢劫了、男人遭害了。在那少妇的伤残的身体上还留着酷刑的痕迹，她的口里发出微弱的呼声：“胆小的！杀人的凶手！”



Codardi, assassini!

屠　杀

人类社会进步的历程是一部血的记录。每一个新的理想都浸透了无数殉道者的血。死了的耶稣受人崇拜；活着的耶稣永远被人虐待。这样一个悲剧到现今还在重演。千万的人为自由的理想牺牲了生命，他们的尸体像山一样地堆积着。一个教士满足地在旁边着。他的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他想说："你们现在可以明白不应该有理想了。"



Così apprenderanno a non avere idee!

起来，世界上贫苦的人！

勇气可以克服一切。信仰是不会消灭的。坚定地站起来，举起拳头高呼："起来，世界上贫苦的人！"即刻会听见洪钟般的响应。



Viva i poveri del mondo!

埋　葬

死并不是终结。种子落在土里会发生新芽。生命将绵延不尽。一些人为理想牺牲了，他们的崇高的行为会感动另一些人出来继续他们的工作。这里埋葬的不是尸首。这都是种子。等到春天再来时它们会开出灿烂的花朵。



Non sono i cadaveri che sotterrano, ma i semi!

血　　债

忍受和让步并不能减轻痛苦。连酷爱和平的人也不得不流出他的无辜的血。母亲悲痛地抚着垂死的儿子。在这悲哀的时刻没有人来给他们以同情和安慰。起来，眼泪是没有用的。血的债应该用血来偿还。现在正是时候了。



Questo dolore non può guarirsi con rassegnazione.

教师的最后一课

老教师始终忠于他的职务，他不肯把谎话教给他的学生。他死了，他的血灌溉了他所宝爱的土地。两个孩子依恋地留在他的旁边。他在这最后的一刻还把怎样生活，怎样爱人的事情教给他们。他的眼睛闭上了。那两个孩子还含着泪静静地领受教师的最后一课。



La le ion ultima del maest o.

战士的遗言

“请告诉外面的朋友们。我们是没有一点悔恨，没有一点惧怕的。我们将勇敢地死去。他们杀死我们的身体，然而我们的理想会征服一切。”



Essi vanno ucciderci, ma noi vinceremo.

残 留 者

风暴停止了。过去的一切只是梦魇。然而繁荣的日子也跟着消失。留下的是一个废墟。两个纯洁的孩子亲爱地坐在一起。斧子横在他们的脚下。勇敢地站起来，孩子们。未知的将来横在你们的前面。你们快拿起斧子去重建那残破了的家园。



I sopravviventi.



《西班牙的苦难》

序

殉道者常常创造出英雄不能够了解的世界。在我的国土里，殉道者的志愿会成为事实。

加斯特劳 1937年7月，于瓦伦西亚。

看以后谁还敢举起拳头

"你举起拳头敬礼,① 我就砍掉你的拳头。你挺起胸膛昂然朝前走,我就砍去你的双脚。让我们拿你来开个端,做一个例子:看以后谁还敢举起拳头。"

① 举拳头是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敬礼式。



Affinchè alzino il pugno.

法西斯蒂的天堂

他们夸说着兴盛和繁荣。他们夸说着幸福和安宁。他们在大地上建立了他们的天堂。可是在他们的天堂里没有爱和笑，没有花和光，更没有成人的歌声和孩子们的笑语。这儿有的只是死亡和凄凉。



Il paradiso facisto.

轻的刑罚

“打罢，打罢。反正是打不死的。我是一个强健的人。我能忍受，我应当忍受。有一天我会站起来。那时候我会来向你们索取这笔小小的债。”



Castigo minore.

冤沉海底

死并不是完结。血能够使土地肥沃。自由的花常常需要灌溉。可是给粗绳缚着颈子，给巨石压住身体，让鱼虾咬食，让盐水冲打，连自己的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这真是冤沉海底了。



In fondo del mare.

未来的圣人

死并不可怕，为理想死更不可怕。今天他们把我们牵到刑场去。可是明天会有无数的人崇敬地念着我们的名字。我们用自己的血灌溉了理想。有一天理想会开出美丽的花来。



I martiri saranno santi.

他们杀死了她的儿子

儿子是她的唯一的亲人。儿子是她的生命。除了他，这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使她依恋的东西。然而他们杀死了他。这个打击太大了。是真的，还是梦？她忍受不了！她相信抱在她手里的不是一个木头，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孩。她哭着，笑着。她亲爱地低声唤他的名字。



Essi hanno uccisi suo figlio.

他们也有来迟了的时候

一切的希望都断绝了。他已经用尽了他的力量。他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忍受痛苦和侮辱。手枪里最后一颗子弹原是留给自己用的。好，让他们来罢，除了血，他们再也找不到什么了。



Avolte arrivano tardi.

为了祖国宗教和家庭

他们杀了和平的人民，奸了善良的妇女。他们毁灭了祖国，败坏了宗教，摧残了家庭。可是他们偏偏说：这都是为了祖国，为了宗教，为了家庭。



Tutto per la patria, la religione e la familgia.

宁死在被辱之前

谁不爱惜生命？何况她是一个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少女！然而前面是一片白茫茫的水，后面有四五个带着枪追来的人。听，那不是胜利者的色情的笑声！她应该等着受辱么？她应该向他们乞怜，让他们摆布么？不。至少水是干净的。水会保护她。这是她唯一的路。



Piuttosto la morte che l'oltraggio.

逃　亡

他们侵入我们的村庄，杀害我们的亲人。他们占据了我们的一切。他们用火用刀，用枪炮，用炸弹，毁灭一切。可是他们毁不了我们的反抗的意志。“再用一点力，朋友！不要怕，我们马上就要逃出他们的魔掌了。”



Evasione.



西班牙的曙光

《西班牙的曙光》，西班牙画家辛门绘。一九四八年九月据《西班牙的黎明》（绘者同，一九三八年七月由平明书店初版，次年三月再版）增订，由平明书店初版，一九四九年一月再版；一九五一年三月由平明出版社三版。

前　　记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是暂时地失败了。佛朗科用炸弹和屠杀毁灭了它。

但佛朗科得到的只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就在今天我还在外国报上读到西班牙国内的反抗的消息。

并且，三年的战斗也绝不是白费的，它给我们留下不少的东西。这本画册便是其中的一件。

我爱这本小小的画册，直到现在它还给我希望，给我鼓舞。

巴　金　1948年8月。

献　辞

革命并不是一块灰色的东西。它也有色彩。

它并不完全是一场决死的战斗，一场流血受苦的战争。它也有快乐的时刻，微笑的面容，还有生命和青春。

西班牙革命的大厦是用欢乐与青年的精神建造起来的。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能够成功。

激动着革命的这种快乐，这种年轻的精神，这种热诚完全被一个巨匠的注意的眼睛捕捉了，用画笔留在纸上。

当艺术变成了某种伟大的民族感情的解释者时，它便是崇高的，正和某一些伟大的稗史传说的歌者描写着他的民族的英勇的行为一样。那是血肉和精神的混合物。

我们现在介绍的便是这样的作品。

这本画册是一个伟大的，纯粹的群众运动之艺术的精华。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谋一个阶级的解放，而且在谋一个种族的幸福，在这个种族中间英勇行为不断地产生着，那些激动着民众的理想之慷慨精神也随时表现出来。

作者辛门(Sim)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平民之子。他能够用他的画笔写下他的印象和感情。爱的场面；恨的场面；团结的场面；流血的场面；生与死的场面；还有枪弹的火光，还有

在这个悲痛的时刻里为“自由”指路的亮光。

我们怀着热烈的愿望将伊比利亚的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时代介绍给全世界，着手刊印这本描写西班牙革命中的此等场面的画册，这次的革命给西班牙打开了一条新路，以达到经济与精神两方面的更大的成就。

革命并不是一块灰色的东西。它也有色彩。它们就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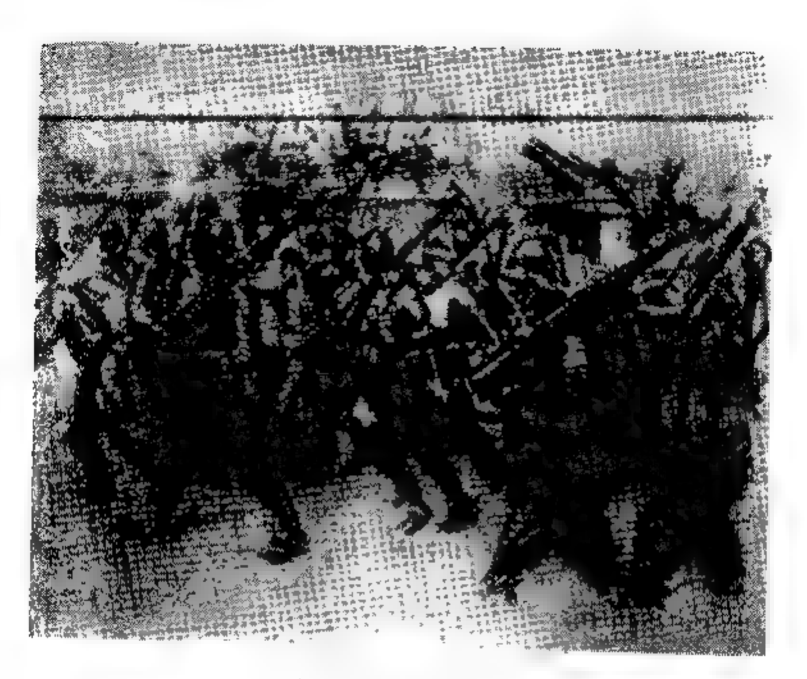
C. N. T.

F.A.I.①

① F.A.I.，伊比利亚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

凯旋的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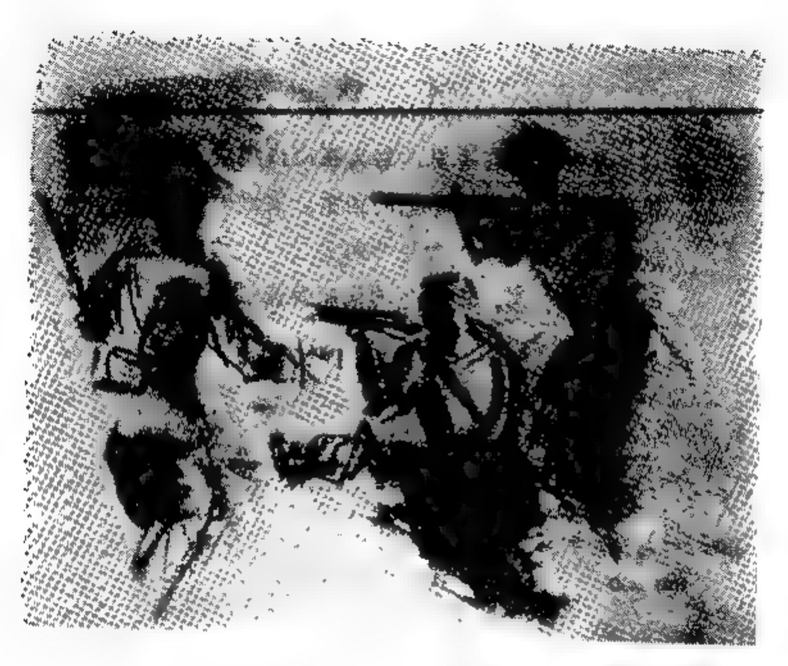
民众的军队凯旋地前进。在每个人的脸上现出一种表情，流露一件思想。这是对于胜利的確信。每个人都知道全世界的眼光在注视他們，他们非常兴奋。同志们，向前进！不到敌人完全溃败，不要停止进军。



Marcia trionfale

前进，弟兄们！

敌人的机关枪弹不停地飞舞。弟兄们在一起战斗。勇敢的战士怀着献身的热诚防卫革命。再没有比这战士的友情更崇高，更使人兴奋的！前进，弟兄们。光荣的未来在前面等候你们。



Fratelli nella lotta

钢 铁

来福枪握在手里，怒火在心内燃烧。他在寻找那些杀害他的弟兄的凶手。震颤的钢铁一般的筋肉里含着一种战斗的力量。这力量会摧毁敌人的营垒，而给他的同胞带来胜利。



L'acciaio

冲　　锋

这里是一群战士。不歇的机关枪的声音使他们不得不躲在障碍物后面。等待似乎是没有终结的。然而进攻的时候终于到了，大家向前冲锋。前面的人倒了，后面的仍旧继续着向前进。



Ariete

铁路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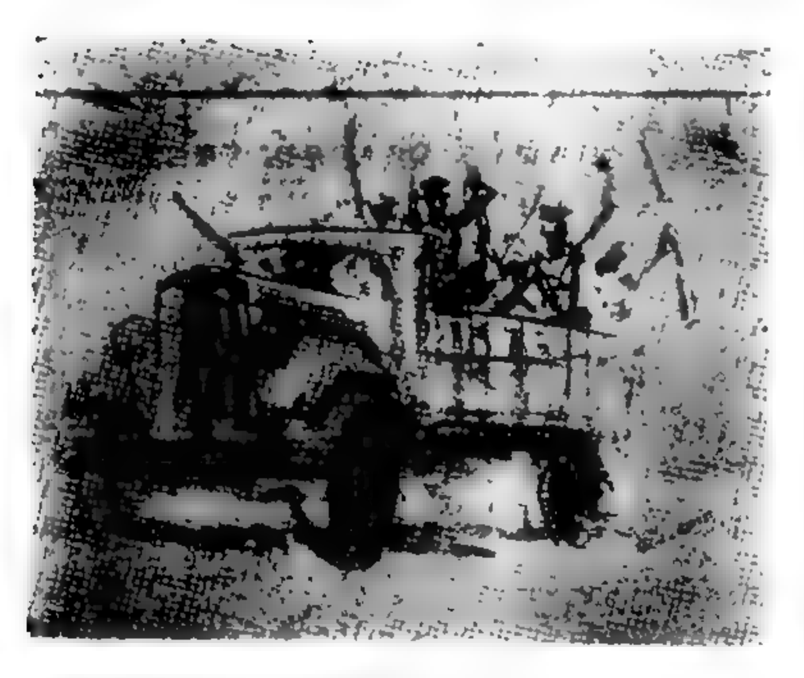
他整天拿着铲子工作，站在火车头中加煤。他过的是这样一种单调的日子。枪声一响，“铁马”不动了。他放下铲子拿起步枪去防卫自由。



Il ferroviere

迎着朝阳前进

看！他们出发了。他们多么快乐地去参加战斗。也许死就在前面等候他们。然而他们是不知道惧怕的。枪刺在卡车上灿烂地发亮。战士举起拳头欢呼，迎着朝阳前进。



Pugni in ariu

战 壕 里

敌人败退以后，前线非常平静。紧张的空气松弛了。每个战壕里响起同样的口号：“我们一定要胜利！”每个战士举起手高声欢呼。



Commen tari

最后的拥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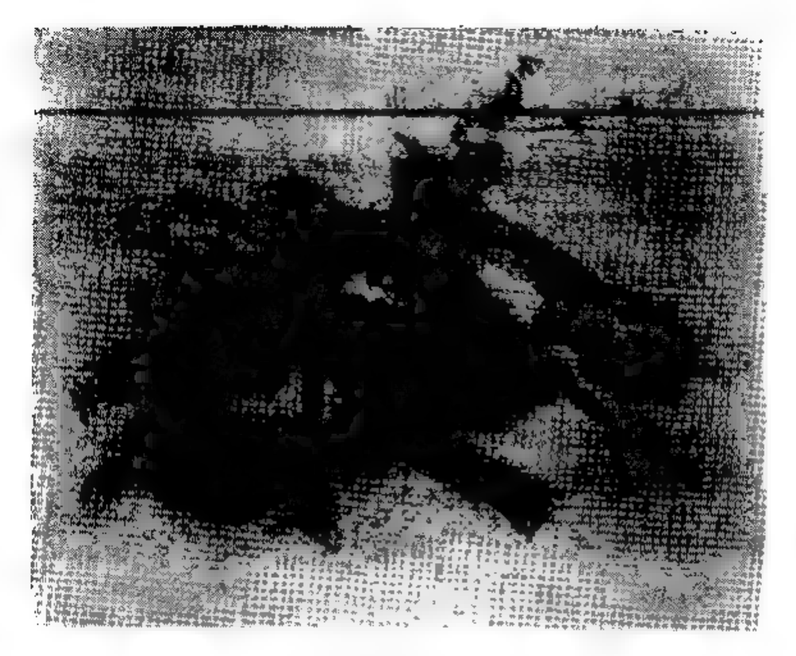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小村镇里。在平静的时候他们共同度过了那些快乐的日子。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他们拿起枪一同去防卫他们的自由。在战场上他们是不可分离的伙伴。一颗子弹打进了朋友的心。他举起被烈日晒焦了的手臂将那朋友的垂死的身子放在担架上，最后一次地紧握着那朋友的手。



L'ultimo abbraccio

我们的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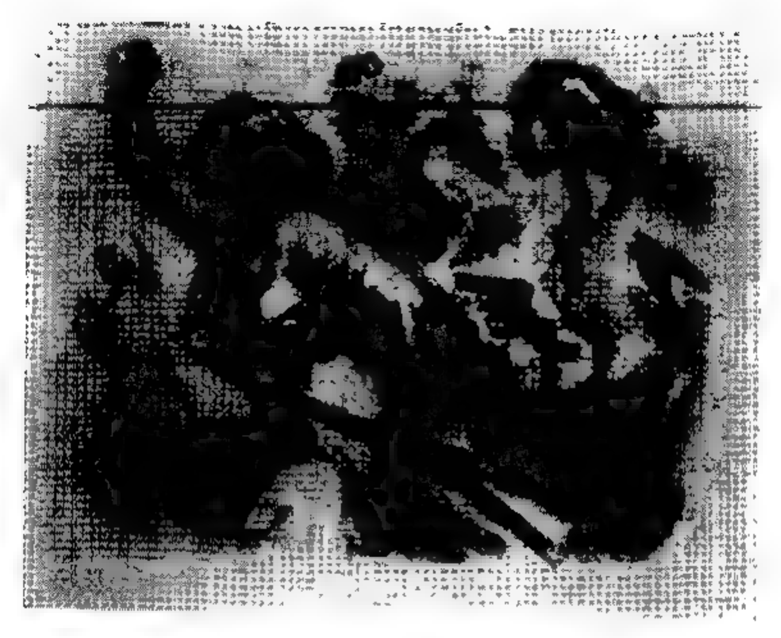
死不过是一个假象。在那些倒下去的勇士的胸膛里还有心在跳动。这是伟大的人民的心，在这心里还活着战死者的永生的历史。



Mascheramento

复　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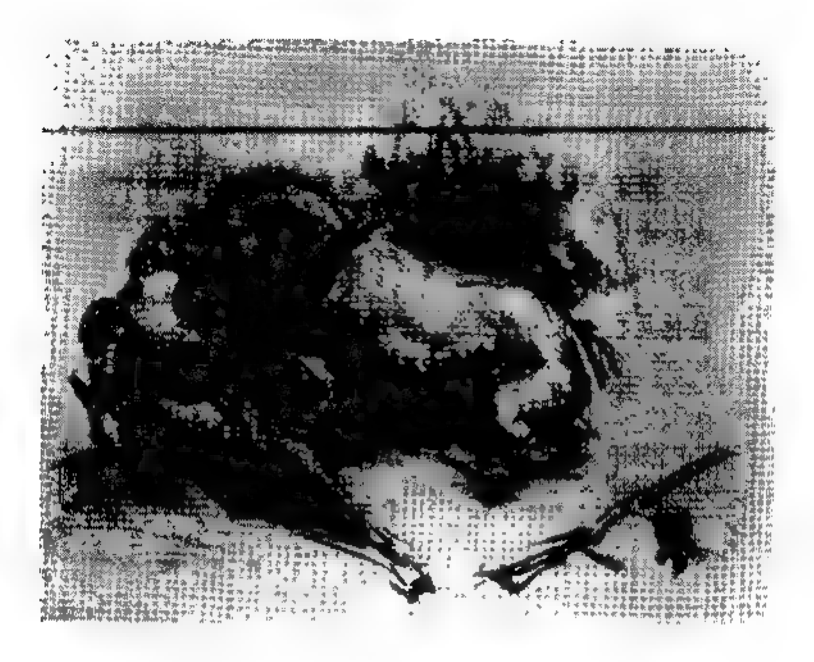
前面的同伴倒了下去。后面的人从变冷了的手中接过枪来。他们骄傲地踏着大步前进，高声叫着：我们给你们报仇！



Lo vide cadere

死　马

可怜的畜牲！……中了弹，躺在血泊里，这景象使得每个善良的心痛苦。闭上眼睛罢，你尽了你的职责了。你也是为革命而死的。



Il sacrificio d'un cavallo

战　　士

昂着头，执着枪，坚定地望着前方，这强健的身躯充满着战斗的热情。革命的战士是不知道畏怯的。他明白他是为正义而战斗；他相信他是在争取无产阶级的自由。



Lottarore

她知道怎样去死

只有十六岁的年纪，还是一个娇弱的女子。街头的呐喊惊醒了她的好梦。“到障碍物那边去！”她也要响应这个号召。她拿了一把手枪跟随着年长的同伴去参加战争。她看见一些人流着血倒下了。但是她依旧勇敢地向前进。她不怕，因为她知道怎样去死。



Essa seppe come morire

野　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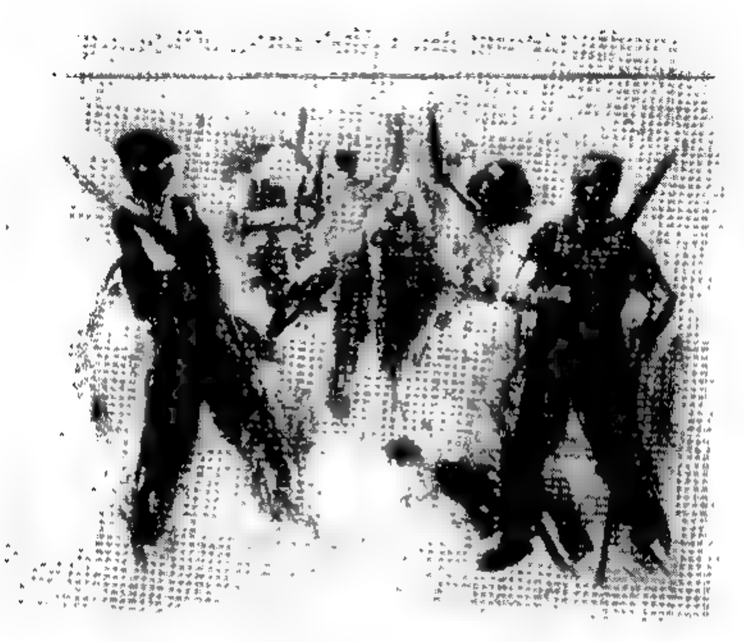
整个早晨枪声就没有停止。是激烈的战斗，是紧张与不安的时刻。如今敌人败退了。饥渴的声音在肚里叫起来。拿出黑的饼子，还有面包和一把米……。努力进餐罢，同志。你们应该保持身体强健，以更大的精力参加斗争，必须把法西斯带赶出我们的自由的土地。



Esigenze della vita

激 战 后

枪声消失了。人民在庆祝胜利。这是快乐的时刻。笑声，歌声在空中飘荡。血的战场，从叛徒手中夺来的战利品……如今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心中只成了过去的回忆。眼前有的只是光明。



Dopo la battaglia

播　种　者

纯洁的战士，你是真正的革命的拥护者，用你的棕色的胳膊撒下自由的种子，你会看见一代新的勇敢的劳动者产生，那便是为着新的理想服务的人，那便是保持革命的成就的人！



Guerriero

一 少 女

六月十九日的事变把她从少女的幻梦中唤醒了。她抛弃了针线和少女的游戏，热心地观察着争自由的斗争的发展。她终于投身在这斗争中间，成了一个英勇的斗士。现在她的脸上带着微笑，她已经用坚定的手执着枪防卫过革命了。



Gioventù

枪 骑 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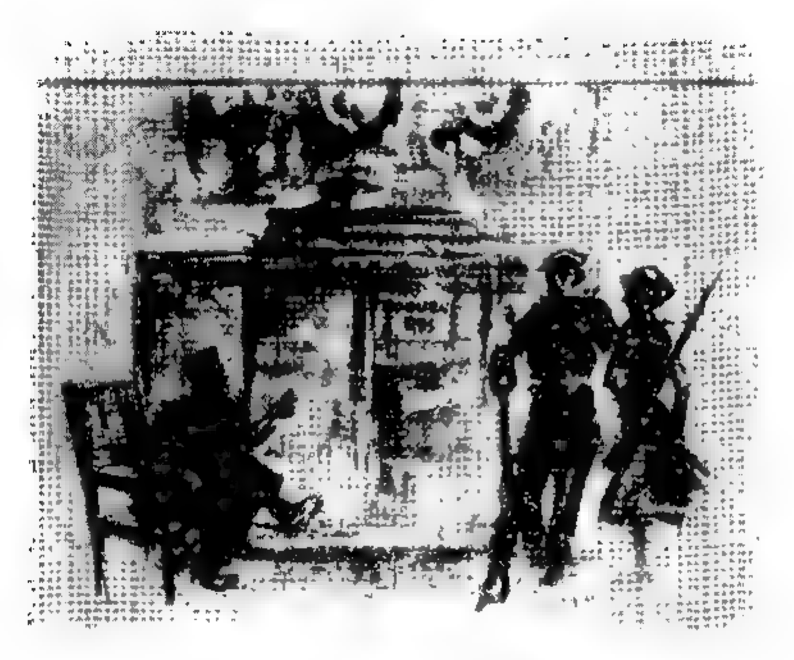
君主时代的遗迹。在那狂奔似的前进中，呈出铁的纪律与尚武的精神。没有统帅，也没有最高的命令，这是从热诚和信仰中产生出来的纪律。这是一个推翻了黑暗污秽的过去的民族的进军。



I lancieri

革命的防卫者

他们拿着武器攻陷了法西斯蒂的营垒，占领了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城堡。这美丽的近代的宫殿在劳动者的眼前发出夺目的光彩。这是他们用了莫大的代价争来的权利。他们现在要拿同样的武器来保卫它！



Guardiani della rivoluzione

休 战 中

长久的，疲劳的斗争的时刻。敌人炮火下的紧张和不安的时刻。于是平静的时候来了。在这时候志愿兵才可以观察他们的工作的成绩。一个世界在火焰与灰烬中死去了。这是净化一切的火焰，这是新时代的先驱。



Tregua

休　息

早晨的战争十分剧烈。现在是休息的时候了。但是休息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他还要回到战地去。那时他将以新的精力来争取新的胜利。



Riposo

“不给他们通过！”

不给他们通过！只要她的血管里还有一滴血，他们便不能够通过。她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她看轻自己的生命，她愿意牺牲它来争取同胞的幸福和自由。从前执针穿线的娇嫩的手如今却举起了杀人的武器：“不给他们通过。决不！”



"No pasaran!"

一 个 英 雄

一个无名的英雄。宽额，方颚，坚定的眼光，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是勇敢，智慧，毅力的表现。这是西班牙革命战士的典型。



Un eroe

出　　发

卡车的喇叭响着，它要把战士们载到前线去。离别的时候到了，每个战士都有亲爱的人留在后方。这也许就是诀别。战士们脸上的微笑里或许隐隐含着痛苦。但是他们依旧振起精神举手高叫着："同志们，敬礼！"



La partenza

流　亡

一群穿制服的人来占据了我们的村庄。他们烧毁了一切。我们的房屋，田地，收获都被包围在火焰里，街上到处都是死尸。……但是我不久就要回来。我要保护我的祖先的血汗所灌溉的土地，我要战死在这地方，不让它白白落在仇敌的手里。



Profugi

激战中

战地上躺满了勇士的身体。枪弹不断地四处飞舞。志愿兵和看护热心地奔走。没有一些危险能够阻挠他们的决心。他们准备牺牲性命来救护受伤待死的战士。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祝福你们，你们是西班牙革命的两个象征。



Nal i l mezzo d'una battaglia

受伤的战士

受伤的战士躺在病床上，梦魇压迫他，一些可怖的幻象折磨他，他的精力竭尽了。他昏迷的挣扎着，嚷着，要回到战场上去。医院里的看护在他的旁边照料，像母亲一般的温柔，姊妹一般的爱护，她尽力安慰他，想减轻他的痛楚。



Il delirio d'un guerriere

觉　醒

青春战胜了疾病。痛楚消失了，创伤治愈了。一种更强烈的新的求生的欲望搅动了这个战士的心灵。他怀着衷心的感激望着年轻的看护。她在那些痛苦的时间里那么关切地照应过他，就像是他的一个姊妹。他们两人同时微笑。他们的心兴奋地跳动着，因为一种更崇高，更善良的新的生活将在他们两人中间开始。



Risveglio

英勇的志愿兵

热情鼓舞着他。信念是他的指导。他没有一点惧怕地投身在激战里。他的眼里放射出信仰的光辉，他相信他的理想终于会得到胜利。英勇的志愿兵！你是真正的革命的英雄。



Miliziano anonimo

新的曙光

穿过残破的屋顶，阳光射进了古旧的寺院。黑暗的建筑里充满着净化一切的光辉。阴暗惨痛的国土现在被灿烂的阳光照亮了。这是暗示着希望的新的曙光，它驱走了那些可怖的梦魇。



L'aurora nuova

收　　获

新的文明之强健的劳动者，革命之英勇的防卫者，你的镰刀（同时是武器和工具）就是新社会的象征。同志，祝你成功。



Raccolta



纳粹杀人工厂

——奥斯威辛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一九五一年三月由平明出版社初版，同年五月再版。

前　　记

我们都知道德国纳粹匪徒曾经在奥斯威辛屠杀了四五百万和平的人民，并且拿他们的头发织成床毯，拿他们的身体火化成灰，拿他们的脂肪制造肥皂。这个册子里的二十二张图片便是这种史无前例的罪行的证据。它们永远活着，永远在向世界人民控诉法西斯匪徒的罪行①。

我到过奥斯威辛，我走遍了整个集中营和毁灭营。我看过三万二千个欧洲女人的头发，我踏过泥地上的烧剩的骨粒。我参观了谋杀几百万人的博物馆，我站在焚尸所的废墟上，望过布惹秦加的一片荒凉。

我也写过《奥斯威辛的故事》。

然而这二十二张图片比文字更真实，而且更有力量。

它们告诉我们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和平的力量战胜战争。不管希特勒和他的党徒在波兰组织了四个大毁灭营，三个大集中营带毁灭营，四十四个小集中营，十五个输送营和无数的劳动营，用种种方法屠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焚尸炉中烧毁了将近千万人的尸体，但是结果希特勒自己的尸体也烧

① 只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行可以跟它相比。

毁在柏林的一个地下室里面，一部分的纳粹领袖被绞死在纽伦堡的绞架上，连曾经到过奥斯威辛视察的纳粹特务头子希姆莱也不得不服毒自尽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没有毁灭和平，倒是和平的力量毁灭了它。纳粹并不曾灭亡波兰，他反倒促成了波兰的新生。

所以在一本在波兰的古城克拉科出版的关于奥斯威辛的画册上，波兰的人民就对全世界说：

> 当纳粹的侵略者发动战争攻击别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居然相信并且也要世人相信，他们在斯拉夫国家的土地上遇到的只是一些没有勇气、没有意志的顺从的人民——一些天生的奴隶……
>
> 他们大大地失望了！
>
> 纳粹的野兽在苏联的广大的领土上受到致命的重伤以后，不得不撤退，并且避开那些表现了热爱自由、热爱祖国的无比的例子的各国人民。
>
> 枪杀，饥饿，疫病，不能想象的酷刑以及比什么都可怕的，奥斯威辛和布慈集加的毒气房，这一切都是纳粹用来毁灭所有的波兰人，犹太人和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的，用来威吓全世界人民，消灭那些手执武器用各种方法跟纳粹战斗的勇士们的热情和锐气的。
>
> 他们不惜用一切的代价来恢复波兰的秩序。然而他们估计错了。
>
> 对于民族自由和社会独立的热爱变成了群众的口

号，这种热爱得到了胜利。

在纳粹占领的整个时期中，自由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拚死战斗一直在进行着，而且越来越激烈。然而法西斯主义终于失败了。这个胜利是用战死者的血换来的，这中间也有着奥斯威辛和布蔼森加的殉道者的血。

让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的证据保留下来，一方面当作这次战胜的一个纪念，另一方面作为对于全人类的一个警告……。

是的，这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警告。在法西斯主义不曾完全消灭之前，这种罪行还是会发生的。并且奥斯威辛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党卫军的一个大头目奥斯瓦特·波尔已经在几个月以前被西德美国占领军释放了。难道用他来组织新的奥斯威辛么？

“人们，你们要警惕！”①

巴　金 1951年2月12日。

---

① 借用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烈士的话，见《在绞架下写的报告》。

关于奥斯威辛和布惹秦加

奥斯威辛(Oświecim)集中营成立于一九四〇年春季，起初规模很小，只有十六幢平房，四幢两层楼房，后来才逐渐扩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集中营兼毁灭营。毁灭营建筑在离奥斯威辛三公里的布惹秦加(Brzezinka)的沼地上。布惹秦加毁灭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附属机关，它是后来添设的，因此它又被称为"奥斯威辛第二"。

奥斯威辛是一个潮湿的盆地。它那满是沙粒和小石子的地面就一直没有干过。它四周有好些鱼池，水是死的，里面充满了腐烂的东西，时常发出恶臭来。根据布列斯劳大学教授棐克尔的化验报告，这里的水连用来漱一次口也不行。这是一个传染疟疾和伤寒症的好地方。布惹秦加的地理环境也不比奥斯威辛好一点。有人说布惹秦加原是一个养马的地方。但我看那里的潮湿有毒的空气对马也不适合。房屋是在一九四二年新建的，以后又陆续扩充了几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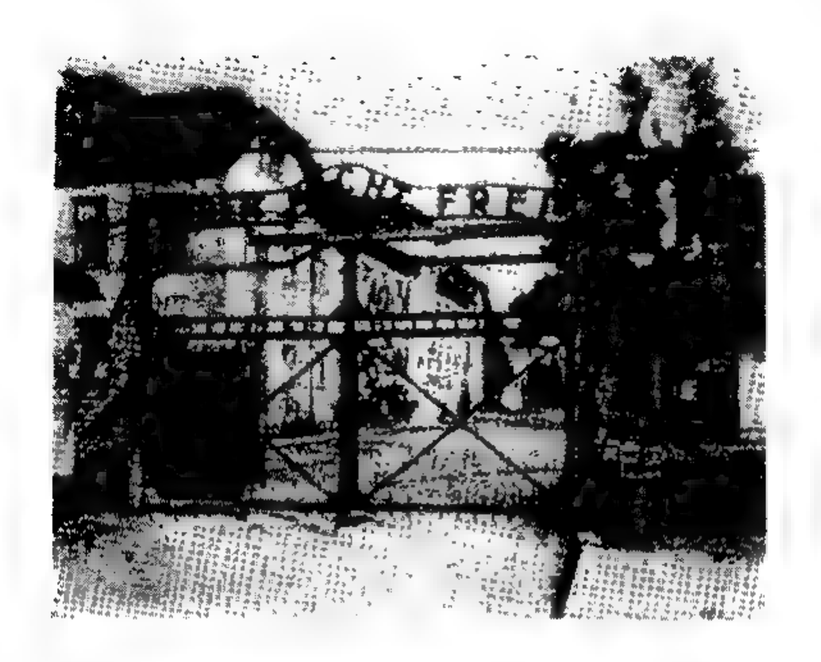
可是整个毁灭营如今就只剩了一些破烂的监房。那许多条铁轨，那堂皇的门面完全看不见了。第一座旧式焚尸所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改做了防空洞。第四焚尸所在同年十月七日烧掉了。第二和第三焚尸所的设备在同年十一月被纳粹拆卸

来搬走了，建筑物也已被炸毁。第五焚尸所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的夜里纳粹撤退时烧光，连墙壁也炸掉了。

奥斯威辛集中营本部现在由波兰政府改做了国立博物馆，这就是纳粹暴行的博物馆。而布悲秦加毁灭营，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杀人工厂，今天却只剩下一片荒芜的泥地。

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门口那一行德国字是“劳动使人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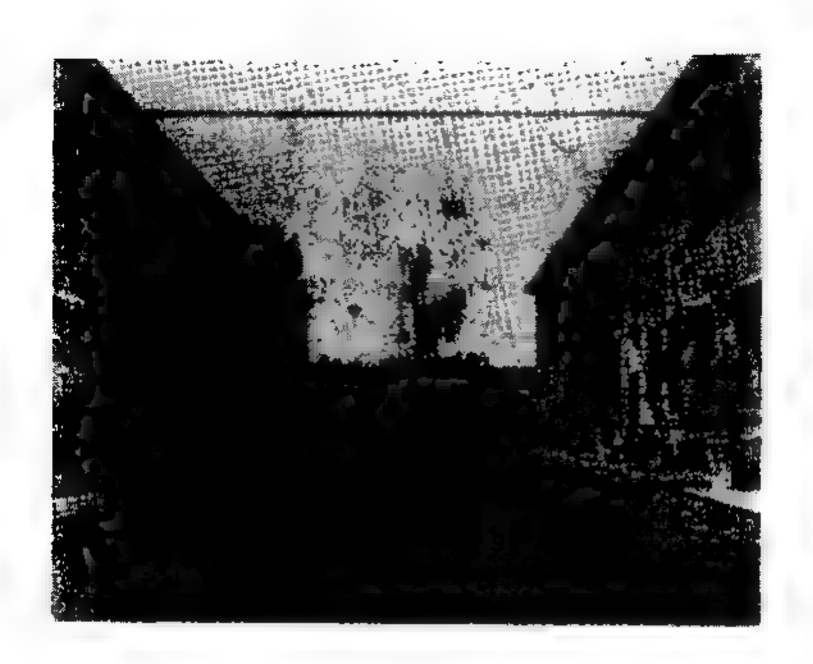
的确，从外表上看，这里好像是机关职员的宿舍，或者中产阶级的舒适的住宅。二十八幢红砖砌的两层的楼房全带着和平的外貌，墙头有牌子写明房屋的号码。它们现在已经成为纳粹暴行的博物馆了。博物馆的名字是“几百万人的毁灭”，因为纳粹匪徒们在这里杀死了四五百万的犹太人，波兰人，吉卜赛人，苏联的战俘和欧洲各国的进步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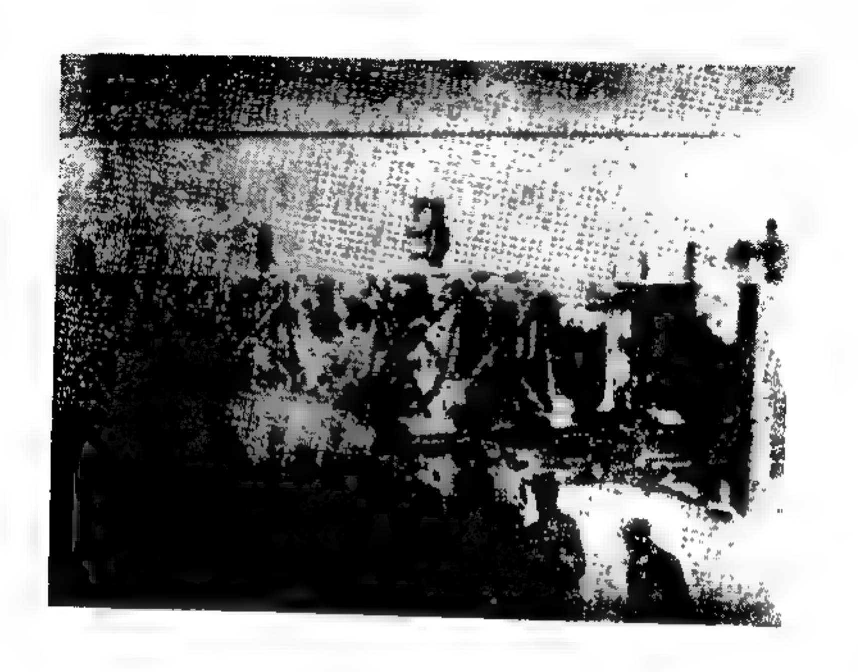
双层的电网上通着高度的电流，谁触到它们，就会死亡。柱子有四公尺高，两道网中间有一公尺的距离。沿着电网，耸立着一些瞭望塔。塔里面不分日夜都有纳粹党卫军看守着。他们准备随时开机关枪射杀那些企图逃走的囚人。



这是“死墙”，在十号房和十一号房中间的天井里。在那软木板前纳粹曾经枪杀了二万六千个囚人。被判死刑的人两手给纳粹匪徒们用有刺的铁丝缚得紧紧的，直到刺陷进肉里，面向着死墙，由刽子手从后面朝他们的头打进枪弹去。



囚人组织的乐队在奏乐，无数穿条纹囚衣的人，缩着头朝各处走去。这是劳动的囚人的队伍。这是一九四三年纳粹自己摄的照片。



这是纳粹党卫军的门格勒医生摄的照片。在那个时候这四个男孩还活着。现在他们都已经死去。可是从那四对眼睛里还射出来饥饿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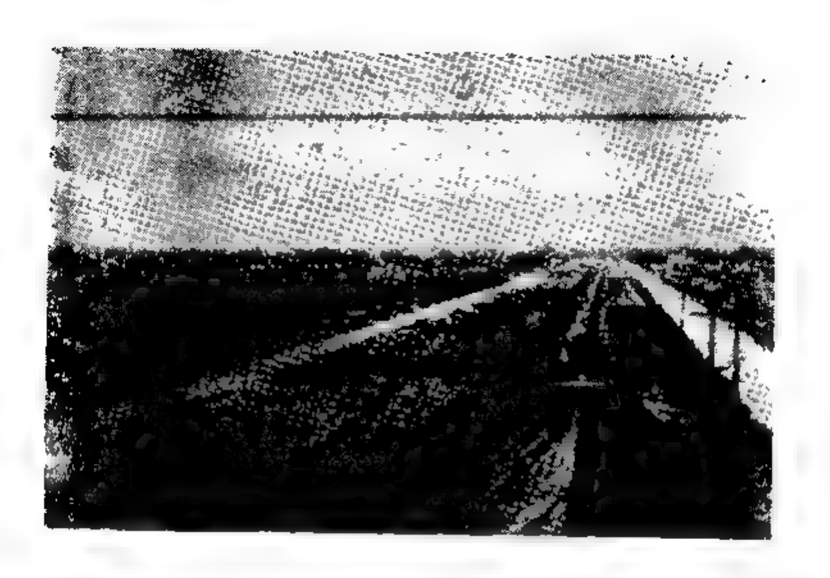
这个一九一四年生的波兰女人(第四四八四四号)本来体重一百六十五磅，她在营里住了一年半以后，被苏联军队救出来，在波兰红十字医院中养了几个月，还只有五十五磅的体重。



德国特务头子，纳粹党卫军领袖希姆莱，视察奥斯威辛集中营。他后来在纳粹德国战败投降以后，服毒自尽了。然而他在脱帽揩汗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这一天。



占地一七五海克脱的布蕙森加毁灭营(局部)。这就是所谓"希姆莱城"。也就是真正的杀人工厂和它的监房。布蕙森加毁灭营还是全世界最大的杀人工厂。



许多条魔手似的铁轨通过毁灭营的大门一直向各个焚尸所伸过去。有许多人是从别的城市一直运到焚尸所去的。



这是毁灭营里的女监房，也就是女囚人等死的地方。这里住一千人，没有亮光，不通空气，地是潮湿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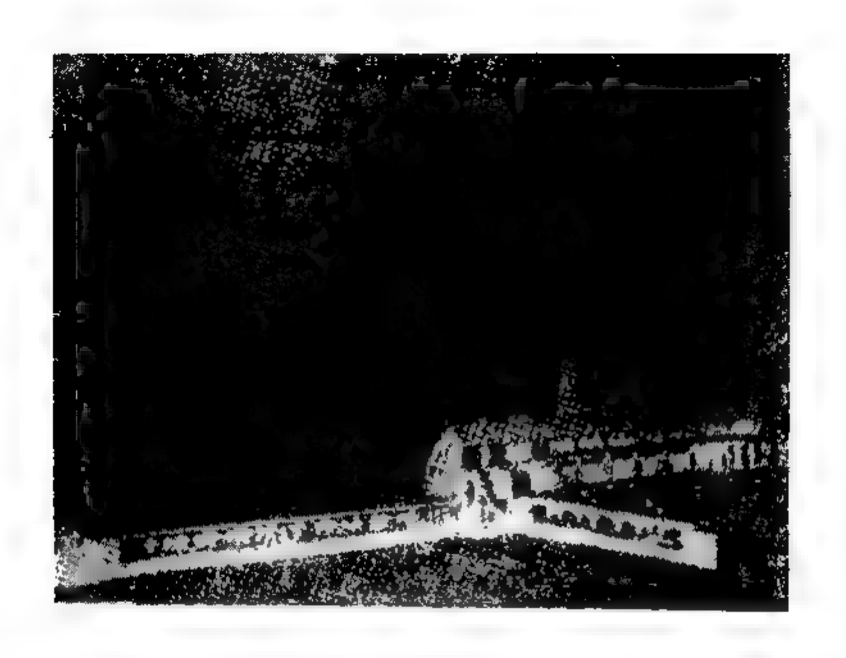


这是毁灭营里的男监，住五百四十个囚人。看照片，似乎并不太可怕。事实上这是一个传染各种病症的好地方。而且这里一样地没有光，不通气，没有地板，人们称它为马房型的监房。



这是毒气房的模型。包含着毒气房和焚尸炉的焚尸所是建筑在地底下的。焚尸所一共有旧式和新式的建筑物五处。现在全烧尽炸光了。今天在这世界最大的毁灭营里就只有一片荒凉。

纳粹匪徒要囚人相信这是“浴室”。他们强迫两千个囚人挤在二百五十方码的地方。毒气房里的天花板上装得有淋浴的“莲蓬”。但是另外开了四个特别的洞孔。门一关上，房里的空气也被抽出去了。毒气(氰化氢)就从那四个洞孔里放进来。毒死这一房间的人最初需要二十五分钟，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就缩短为十分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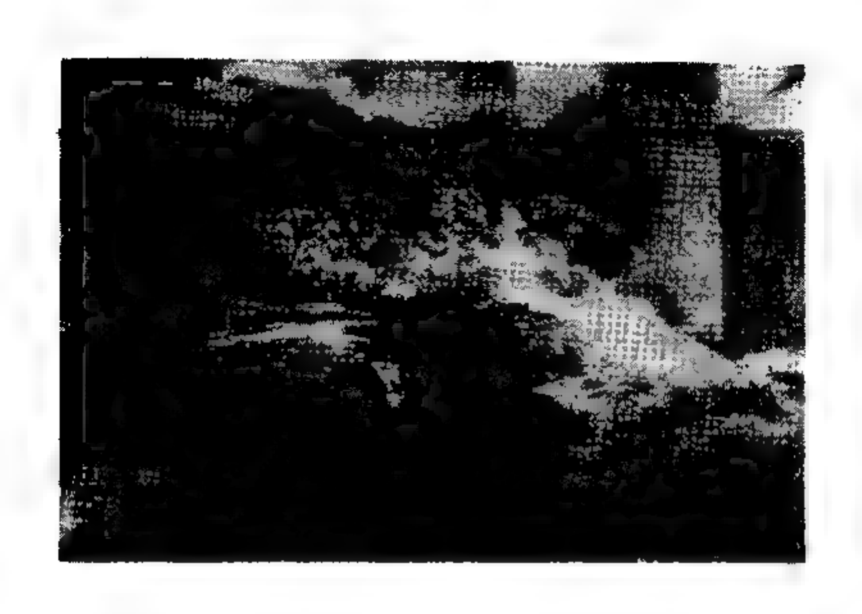
这是一张新式焚尸炉的照片。在十五个炉子里每天可以烧掉三千二百具死尸。四个新式焚尸所每天可以烧掉一万二千人。据说最多的时候全部焚尸炉日夜不停地工作，每天可以烧掉二万四千人。



这是一个希腊囚人大卫·席木勒维奇(David Shmulevich)在一九四四年八月里偷摄的照片。全部焚尸炉每天最多可以烧掉二万四千人，而毒气房每天却毒死了四万人。来不及的时候纳粹匪徒就在冷僻的空地上挖大坑，把尸首堆在坑里焚去。这就是在坑里焚尸的情形。据说纳粹匪徒发见这个办法比较省钱，便放弃了添造焚尸所的计划。



这是贮藏女人头发的仓库。每个女人进营里来最先就得剪掉头发。这些头发被人成批地送到德国去，给专门的工厂做“床毯”的原料。纳粹撤退时来不及运走的头发一共有七吨。我们在博物馆的陈列室里看见了两吨头发，那是从三万二千个欧洲女人的头上剪下来的。



这是博物馆的另一间陈列室。许多只手提箱凌乱堆在一处，箱盖上还留着用白色笔写下来的欧洲各大城市的名字。它们的主人已经全死在毒气房里面了。



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排长方形的木台上堆着无数的假手假腿，木台前有一道很低的铁丝栏干，我们伸出手去，也许可以摸到这些曾经跟活人连在一起的东西，在纳粹匪徒的铁腕下连残废的人也无法苟全性命。



这是F.雅兹威也次基(Franciszek Jazwiecki)画的囚人图。衣服上的号码代替了囚人的姓名。一个用黑墨水写的简写字母表示着囚人的国籍。从这个字母“F”看来，他应该是一个法国人。可惜的是，在这里看不出三角形的颜色。我们知道在营里政治犯用红色的三角形，娼妓和变态者用黑色，职业犯人用绿色，同性恋爱者用粉红色，教士用紫色，吉卜赛人用绛红色，犹太人则在三角形上面加一根黄条。



这是 F.T.米席科夫斯基(Fr. Tadeusz Myszkovski)画的囚人图。画家是五九三号的囚人。这个五九一号囚人应该是他的同伴，而且是一个接近了死亡的同伴。那一对饥饿的眼睛比照片上那四个孩子的还可怕。



这是扬·孔斯基—巴拉绥(Jan Komski-Baraś)的作品。据说这种刑罚通常要继续一两个钟头。这应该是一种比较轻的刑罚罢。在营里比这更重更残酷的刑罚实在是太多了。



点名是囚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连那些在劳动的中途死去的囚人也得由同伴们揹回去或者用手推车推回去参加点名。这样的死者是很多的。譬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就有四百三十个囚人死在工作的地方。这惨剧也由一个画家J.布南特胡伯尔(Jerzy Brandhuber)表现在他的一幅画中了。



这是另一个画家 M.科绥催艾尔尼亚克(Mieczyslaw Kościelniak)的作品。一个瘦弱的囚人跪在他的同伴的尸体旁边祷告。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动的情景了。





致树基（代跋）一

树基：

第十七卷的目录看过，我同意你那样编排。其实我已经让步了，你还提到遗漏，我却想动笔删除。提起序跋，我忘不了自己的毛病，优秀的作家惜墨如金，他宁愿留一点时间给读者思考，让读者自己判断。有的人连写序跋也嫌罗嗦，不声不响用书中人的遭遇去打动读者。也有人不喜欢一本书的前言后记对读者的干扰。

我年轻时候就爱唠叨，一开头便反来复去讲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理解我的用意。翻译一篇短文我也要加些讲解或说明，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大半是多余，所以容忍它们我自己感到痛苦。朋友说："为了把你走过的路程记录下来，就需要保留它们。""真有这必要么？"我常常这样想。我写了几十年，想了几十年，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沉默胜过哀号？我知道力量并不来自言多，文章写得长绝非胜利。我还有一位作文老师，那就是我的二叔，二十年代初期每天晚上我和三哥到他的书斋听他讲解《春秋左传》，他得意地宣传所谓"春秋笔法"。当时我似乎一窍不通，今天我却也懂得只要瞄准箭垛，一个字更能诛心，用不着那些旁敲侧击的吱吱喳喳。我又

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何必搬运辞藻，浪费时间！

请原谅，我又暴露了自己的矛盾。我既"同意"，又"让步"；既"沉默"，又"哀号"；不能"容忍"，又想"一字诛心"。中国人爱谈"中国特色"，那么"春秋笔法"也应当是"中国特色"吧。无论如何，更多的文字，更少的内容，一大堆空话。白纸上写满黑字，我就这样浪费了六十年的生命，现在才明白编印全集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惩罚。我真愿意我不曾写过那么多的文章！听见人谈起我的作品，我的确有愧对读者的感觉。

巴　金 1990年6月13日。

还有，你决定把那三本小画册编入第十七卷，我也同意，篇幅的问题有时也要照顾到。三本画册中对《纳粹杀人工厂》我看用不着多作解释，不过对两位西班牙画家的画我倒想加一点说明。我指的是《西班牙的血》和《西班牙的曙光》，关于这两位画家的生平和艺术成就我一无所知，当时西班牙内战十分激烈，我翻印他们的作品，只是因为受到艺术魅力的感染，用这些画作武器来打击纳粹——法西斯。

我翻印的第一本画册是西班牙北部加里西亚省画家加斯特劳的《受难的加里西亚》①。原书是友人庄重寄赠的，薄薄的一册，共有《祷告》等画十幅。一九三八年初我到广州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就拿它们缩小制版翻印出来。原画只有标题，没有说明，我改用了一个书名：《西班牙的血》。

① Castelo, "GALICIA MATIR".

后来我因事回上海，见到友人陆圣泉，他在编辑半月刊《少年读物》，想转载加斯特劳的画，不过他提了一个意见：最好加点说明，否则年轻读者不容易理解。我就给每幅画写了短短的解说，写得短，因为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对不对并无把握。其实我当时也不会考虑对不对，只要我能用它做武器，写出来，印出来再说。

《西班牙的血》我在上海重版了不止一次，因为广州印的书刚刚由印刷厂送来，日军就打进市区，我从广东逃到广西，然后从桂林赴金华，转温州去上海。在上海住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写完了《秋》，看见这小说印出来，在租界的烟纸店里出售，我便搭太古轮船去海防，然后乘滇越路火车去河口转昆明，身边只带了一本《秋》。

在上海的两年中我又得到一本加斯特劳的画册，还是反映加里西亚人灾难的，共有《看以后谁还敢举起拳头》等十幅画。当时我刚刚重印了《西班牙的血》，便把这一册也加上我写的解说，用《西班牙的苦难》作书名出版。那些日子在上海"孤岛"印刷厂生意清淡，印书不难，我印这两本画册，用较好的道林纸印，每种印一千，我留一百册或者多一点送人，其余的就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批发部卖出去，收回本钱印别的书。

加斯特劳的画我就只翻印过这两本。后来在一九四八年我又把它们合并成一册，加上意大利文序和标题，改名《西班牙的血》("IL SANGUE DI SPAGNA")，重印了一版，印数可能只有四五百，是寄出去，托美国旧金山的华侨朋友钟时在外国散布的。

除加斯特劳的画册外，在上海我还翻印过另一画家幸门(Sim)的水彩画若干幅。幸门的画册是钟时寄给我的，他的画和加斯特劳的不同，加斯特劳描绘一场决死的战斗，法西斯恶魔怎样凶残地屠杀人民。幸门则告诉人："革命也有快乐的时刻，微笑的面容，还有生命和青春。"我喜欢幸门的画，我也分两次把它们全印出来，前一本是《西班牙的黎明》，后一本叫《西班牙的曙光》。一九四八年也出版过合订本，我只保留了一个名字：《西班牙的曙光》("L'AURORA DI SPAGNA")，但也在书前加了意大利文的献辞，是从原书翻译过来的。

建国后我的兄弟李采臣创办平明出版社，我给他帮忙担任过该社总编辑，为平明出版社编过两本画册，一是《纳粹杀人工厂》，另一册便是《西班牙的血》(不用说，加斯特劳的画)。我手边没有新的材料，关于那两位西班牙画家，我至今仍然别无所知，我怀念他们，可是什么也谈不出来。寄赠原书给我的两位朋友庄重和钟时都已远离人世，埋骨他乡，我这里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纪念他们的东西，那么就让这两本画册长留在我的心上吧。

巴　金 1990年8月17日。

致　树　基(代跋)二

树基：

这两天翻看校样，我重读了第十七卷的“代跋”，才明白我的确太老，而且太疲乏了。本卷的目录我看过不止一遍，当时只想到删与不删，或收与不收，我的想法是越少越好，那些过去不曾收入集子的短文，现在也不必全部保留，最好一篇也不收。但是有些做研究工作的朋友不同意，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料，我发表过的文章都是我写作道路上的脚印。我也有陷在泥淖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人们更可以根据我的脚印批判我。我不应该逃避责任。

这一次我不像编辑十卷本《选集》时候那样固执了。考虑了别人的意见，我作了让步，请你替我解决问题，尽可能地把以前扔掉的文章收进去，在序跋方面也不例外。

我的确这样地做了。不过我也有一个失误：我看过目录后没有认真考虑，也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就告诉你：“我同意。”这并不是虚假的同意，这是带有让步的同意。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这一卷以八二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印行的《序跋集》为主，这是我自己编辑的，我本来并未想到编印这样一本书，苏晨同志向我组稿，姜德明同志建议我将过去写的前言

后记收集起来，他还寄来一些序跋的复印件，侄女国煣又替我抄录部分的资料，我匆匆编好集子，工作有点草率，虽然有好些是我自己删掉的，但遗漏的也不少。在《全集》里把遗漏的补上固然是我的心愿，不过那些连我自己都看不惯的空话废话也给收了进去，对读者可能毫无用处。因此编“序跋编”最好以《序跋集》为第一辑，“序跋集补”为第二辑，“集外”为第三辑，留下来的空话废话全收在里面，或者再削除一些，将那些唠唠叨叨的附记、追记、后记以及其它什么记之类全部勾掉，那才干净，那才痛快！

当时我应该这样做，可是我没有做，现在来不及了，我只能在这里告诉读者，也告诉你，我有这样一种意见。过两三年我们再来考虑吧，今天不必作什么改动了。

芾　甘 1991年2月7日。